

目 录

· 政令法规 ·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李铁映同志在听取山东省及曲阜市文物工作汇报时的讲话〉的通知》文物发〔1996〕79号

李铁映同志在听取山东省及曲阜市文物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公布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粤府函〔1996〕162号..... (4)

· 研究与争鸣 ·

二千年前的广州.....麦英豪 (5)

浅谈唐墓昆仑俑的历史背景.....阮应祺 (9)

南雄盆地红层的分层与地质年代.....庄子圣 (13)

东兴石器与西樵山石器的比较.....蔡奕芝 (15)

浅谈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战略.....张光雄 (18)

谈我馆资料室的读者工作.....萧湄燕 (23)

居巢 居廉.....陈 滢 (25)

· 随笔 ·

丹青绘南粤 科技显风流

——记广东省社会发展成就展·历史与现实画卷.....肖洽龙 (32)

讲解员语言训练漫谈.....张光华 (33)

佛山市博物馆档案工作业务建设的启示.....杜群英 (35)

· 文物保护 ·

石湾陶瓷在马来西亚.....沈江海 (36)

浅谈汕头旧城改造与文物史迹的保护.....杨木芳 (37)

佛山的新区建设和旧城区文物工作实践.....吴庭璋 黄蜀媛 (39)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第二期 (总二期)

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广东省文化厅

主办

编辑部：广州东山培正一横路八号

电话：八七一八五七一〇 邮编：510080

· 考古纪实 ·

- 黄埔军校校本部的建立及其遗址发掘·····黎显衡 (40)
新会北门古窑场初探·····李锡鹏 (44)
茂名 梅县 河源相继发现恐龙蛋化石·····邱立诚 张松 (45)
普宁发掘牛公山遗址·····雪彬 (45)
封开杏花苦稔岗考古复查、发掘纪要·····冯孟钦等 (45)
和平县发现商周时期古墓葬·····杨廷强 陈子昂 (47)
连州被毁汉墓清理后记·····吴海贵 (47)

· 译文 ·

- 利益与遗产
——从国外艺术品拍卖看博物馆的得失与对策·····陈军科 (49)

· 先进事迹 ·

- 生死置之度外 文物在我心中
——记文物卫士谢新炎·····谢帝水 (52)

· 消息 ·

- (53) 新会猪 岭出土东晋器物 (53) 南澳发现抗战胜利纪念碑石 (54)
南海市博物馆举办南海人民革命斗争史展览 (54) 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
表彰会在桂林召开广东谢新炎被授予“文物卫士”光荣称号 (54) 五华县修
复长乐学宫大成殿 (55) 湛江市“八五”期间共筹集逾千万元维修保护文物
古迹 (55) 湛江市召开会议采取措施落实“四有”和馆藏文物清库建档工作
(56) 佛山博物馆举办“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夏令营 (56) 雷州市博物馆收藏
1枚金代铜官印

封面 孙中山故居 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供稿

内页

封底

主编：

薛连山

副主编

邹佩阳

苏桂芬

本期编辑：

邹伟初

封面设计：

广州市美术馆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李铁映同志在听取山东省及曲阜市文物工作汇报时的讲话》的通知

文物发[1996]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文物局、文管会，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将李铁映同志在听取山东省及曲阜市文物工作汇报时的讲话印发给你们。

199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到山东省视察贯彻落实西安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听取了山东省及曲阜市负责同志关于本地区开展文物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铁映同志在讲话中结合山东省文物工作的具体情况，对文物保护单位建设、长期规划、文物法规建设和文物安全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铁映同志指出，文物保护工作的综合性、长期性的特点，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文物工作面临着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迫切需要政府文化、教育、计划、城建、财政、公安、海关、工商等部门相互配合，加强协作。他要求各级政府设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作为综合协调机构，从高层次上综合协调文物保护工作。他强调各级政府要把文物工作的“五纳入”列入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

铁映同志的重要讲话是继去年西安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后，对文物工作的又一次重要指示，对新时期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请你们认真学习，在工作中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李铁映同志在听取山东省 及曲阜市文物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我这是第二次登上泰山，十年前曾登过一次，这次看到变化很大，令人振奋。曲阜是第三次来，到了国务院工作以后是第二次来，每次来，重要的地方都要看一下，百看不厌，越看越感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我这次抽了点时间，同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同志一起来，一方面是再来领略一下中华文化的精华，一方面是想具体地看看西安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以后，山东省对会议精神的落实的情况，看看山东省这几年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些什么新的经验和成就，也是想让文彬同志来抓点，进一步推动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来之前，我专门同谷牧同志谈了一下，说我要到山东去，到曲阜去，问他还有什么意见。不久前，我也专门见了一下匡亚明同志，谈到了孔子研究的问题。凡是接触到的这些老专家或者是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华文化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一致要求把文物保护好，要世代保存，永远保存。

文物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没有文物怎么能表现文化的精华？所以，文物是文化的物化的遗存。这些年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是解放后我国文物保护最好的历史时期，黄金时期，既克服了历史上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偏见，或者是经费不足，或者只是民间的保护一般的保护，没有官方的保护、法律的保护，或者没有充分合理地利用等等，同时也克服了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些“左”的错误。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到，文物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是我们向世界宣传介绍中华文化并引以为自豪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为青少年、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以及对他们进行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在两次文物工作会议上都讲得很清楚了。

这次来，还那是那句话，想借山东之地、孔孟之乡来体味高雅的文化艺术，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粹以及它的深厚的影响。看了这两个地方，特别是昨天看了一下泰山，有很深的感触，不登泰山怎么能知道泰山文化的价值？中国人崇敬高山大河是有特殊文化渊源的。中国人民对泰山的崇敬，不仅仅是从自然开始，从自然的美出发去崇敬它，而是对造化中华文化、中华民族象征意义的崇敬。泰山作为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文景观，才使泰山闻名于天下。所以泰山的独特的价值，在于它的文化遗产。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使泰山在中国有它独特的意义。泰山是圣山，五岳之首。如果纯粹是自然遗产的话，那就可以叫它“神山”。费了这么大劲，重登泰山，也是为了再次领略一下它的文化价值。曲阜，也是享誉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我这次来，你们介绍说，曲阜是神农故都，轩辕生地，少昊之墟。总之，这都使你们深感自豪的，我回去还得学习研究一下。曲阜的工作也是不错的；我看了一下，比六年前有大的发展。今天，结合你们的工作，我讲以下几条，供你们参考。

一、关于文物保护机构的建设。去年，我提出文物工作“五个纳入”，我看你们在这一点上有特色，山东省有文物管理委员会，泰安有泰山管理委员会，曲阜也有文物管理委员会，都是高级别的。泰山管理委员会主任是他们的副市长，曲阜文管会的主任是市长，你们省里是由一位副省长担任的。具体工作由省、市文物局承办。我看这个体制要肯定下来，这个经验要在全国推广。保护文物就是政府的职责，就是各级政府、市长的职责。保护中华文化当然是政府的职责，这不是一般的事情。世界各国保护自己文化中“国宝”级的东西，都是地方官员不容推辞的历史职责，这叫官责、官职。这点经验，我看山东也继承了建国初期的做法，那时不就有管理委员会吗？体现了保护国家文物就是各级政府主要官员的官责、官职。

政府保护文物，国家保护文物，这是所有重大文物的一个基本保护机制和方针，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各级政府内要设置文物管理部门，文物管理部门是一个具体的日常行政管理机构，是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执行、办事机构。文物工作综合性、长期性的特点，给它的事业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文物保护和建设要涉及到计划、财政、城市建设，也涉及到规划等问题，日常的文物保护要涉及到公安、海关等部门，文物的一些利用问题又涉及到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新时期的文物工作要比计划体制下复杂得多，所以，政府设置一个文物管理委员会是必要的。我建议你们全省各市地县、凡是有重要文物的地方，都要建立文物管理委员会。它就是市政府的一个综合协调机构，重大问题都要通过它来协调，如果它还解决不了，就要通过市委、市政府，甚至还要请示上一级，以至得到国家的批准。

二、关于制定长期规划。无论是文物保护、古建维修，管理还是利用，都要有规划。国家建设有国家的规划和计划，文物保护——无论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或者是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以及日常管理，都要有近期计划和长远规划。文物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个全面的关于文物管理、保护的规划。比如泰山，就应当有一个10年、15年的规划。因为它涉及到绿化、植被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而是几十年的问题，一旦破坏，就会多少年也恢复不起来。象孔府、孔庙，一旦破坏就没有了，即使重建了，也就不是原来的了。象你们介绍说，雍正年间孔庙着了一次火，烧毁房屋建筑133间，光绪年间因孔府内宅失火，烧掉前后堂楼，东西配楼，你重建以后就是样子全一样，也是雍正、光绪以后的事情，文物一旦破坏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它的特殊性。在土地政策上，我们说“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就是要保护耕地。文物工作也一样，一定要保护安全，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不允许有任何的疏忽。所以一定要有个很好的规划，不要临时动议。规划在城市建设上、在文物保护上就是一部法，一部建设法，一部大法。一切利用和建设要依法办事，规划就是建设保护法，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这个规划进行。一个城市没有这个法，就会乱七八糟。不能人去政息，不能因人而异。

我建议泰安、曲阜要把整个保护工作纳入到经济建设的规划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有效保护。我们已经搞了一个5年，以至15年的计划、规划，我建议山东省以及各个市地，都要制定一个长远的文物保护规划，而且得到省甚至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比如“三孔”的15年的规划就要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按规划办事，依法办事。这是新时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越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破土动工的项目越多，就越是需要规划，否则就要造成混乱。应当看到，规划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一个详细的计划，是一部法律，一旦得到批准，就要维护它的严肃性，不得违法。

三、关于文物保护法规的建设。在新时期，对一些重要文物单位的保护要单项立法。文物是千差万别的，只靠国家的一部文物法，或者是一个国家文物管理部门颁布的文物管理的细则，是解决不了这些特异性的问题的。山东省搞了文物管理的地方法规，泰安对泰山，曲阜对“三孔”也都要有具体的管理细则。今后，建设、利用、管理中违法的都要依法处理，追究他破坏文物的责任。依法保护文物、依法利用文物，这是新时期最重要的东西。“法”是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权威性的，不会人去政息。最有权威和稳定性的是法。包括曲阜，甚至“三孔”都可以单独地搞一个法，必须要有专项的法，严格地按这个法办。

在新时期，特别要使文物管理工作全面进入法制化。山东省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起步，你们的管理是严格的。今天又看了一下，“三孔”整个的管理是相当是严格的，而且逐渐走上了靠门票收入、靠文物方面其他一些活动的收入来资助文物保护的路子。保护越好就越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利用得合理和恰当，就又会提供更多的保护的物质条件。你们说已经逐步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公布第二批省级 历史名城的批复》

省建委、文化厅：

粤建规字[1996]40号请示收悉。省政府同意韶关、新会、高州、连州、英德、南雄、德庆、棉湖、碣石为我省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望你们督促有关市、县切实做好上述名城、名镇的保护、管理和建设工作，充分利用它们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主题词：文化 文物 批复

抄送：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韶关市、汕尾市、江门市、茂名市、肇庆市、清远市、揭阳市、新会市、高州市、连州市、英德市、陆丰市、南雄县、德庆县、揭西县人民政府。

探索出一条良性循环的路子来，我看很重要。保护不止是国家保护，还有社会保护。国家保护和社会保护是文物保护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当然包括社会上各种团体、组织，也包括群众个人。如果国家保护不与社会保护相结合，也是搞不好的。面临着我国更大的开放形势，国家保护和社会保护，都要通过法律形式。你们在依法保护方面已经探索了一些新的东西，可以继续进一步完善。

四、关于确保文物安全。文物工作的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文物保护首先要做到安全第一，文物不安全，遭到了破坏，还有什么利用问题？还有什么保护问题？历史上大的文物破坏，主要是战乱和火灾，即兵毁和火毁。一些重要的国家级的文物，也会由于盗掘而遭到破坏。今天看的“三孔”保护得很完好。由于有这样的有效保护，才能更好地对外开放，对社会开放，发挥它的效益。如果全国或全省的重要的文物保护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文物工作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总之，把文物永远地保存下去，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职责，历史的职责，只要形成了法律文件，谁也不能改变，也无权改变。曲阜也好，“三孔”也好，不只是属于你这个地方的，而且是属于全国的，从这点讲，我们都是守门人、站岗的，都是受人民的委托，为中华民族将这一文化瑰宝永远地保存下去。

最后，提两点希望。一是你们刚才谈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还有曲阜的神农、轩辕、少昊、商殷等古迹，希望你们能利用已有的这些优势，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服务，为它开绿灯。如果这件事情搞清楚了，至少中国文明史纪年可以提前1000年或1500年。文物局要作为主要参加单位，组织力量，做好工作；二是希望山东省成为文物保护大省，做第一流的工作，在全国带一个头。在保护好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地向全世界开放。这样，不仅大大地宣传了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而且也可以为山东省带来全面开放的新机遇，为山东省全面的经济建设做出新贡献。

谢谢！

一九九六年七月七日

二千年前的广州

广州地区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

麦英豪

今年是广州建城 2210 年。广州城的最早名字在《史记》和《汉书》中称为“番禺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统一岭南后,南海郡的郡治(首府)设在番禺,即今广州市。秦亡,赵佗据有岭南地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作都城。长达 93 年。当时的番禺城有多大?据宋人的记述,说是“周回十里”,按秦汉的里数折算,只有 1.1 至 1.54 平方公里,与 1990 年广州市区的面积(182.26 平方公里)相比较,比它大出 110—160 倍。当时番禺城的人口有多少?没有直接的文献材料记载,但从《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始二年(公元 2 年)西汉人口最殷盛时的统计,南海郡有 19613 户,共 94253 人。是时,南海郡含番禺等 6 县(相当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可见二千年前的番禺城,人口是不会很多的。因为南越国之后相隔 1500 年,到广州的镇海楼(五层楼)兴建之时(明洪武十三年,即 1380 年),广州城的人口也只有 7.5 万人。由于番禺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记》和《汉书》都说它是当时岭南地区唯一的都会,而且“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岭北来这里做生意的大多数都发了财)。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有了地下出土的大量实物史料,更得到充分而具体的说明。

一、广州秦汉考古的四大发现

现代田野考古学在 30 年代进入广州。当时已发掘过几座汉晋年间的古墓,但规模和发掘次数都极有限。广州地区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现的。自 1953 年初以来,考古发掘在广州是连年不断(文化大革命期间例外),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动土施工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市区内和市郊发现了多处重要的古代遗址和大批古墓葬。其中以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和两汉墓群这四大发现为重要(前三者我们简称为“广州的秦汉三宝”)。分别介绍如下:

1. 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位于市区中心的中山四路儿童公园附近,1975 年试掘 400 平方米,1994 年进行了第二次局部的发拙,造船台的结构已基本探明。这处造船工场是建造在河滩的灰黑色沉积的粘土层上(初步鉴定属海相地层)。船场的中心部位有 3 个木质的平行排列的造船台,其结构形状与今天铁路的轨道无异。造船台的东端已挖到尽头,往西

延伸至今马路之下,长度超过 100 米。1 号船台在南,紧贴着成片的木料加工场地,2 号船台居中,3 号船台在北边。这 3 个船台的结构相同,均由两行宽厚平行的大木板组成滑道,滑板宽 60—70 厘米,厚 15—17 厘米,滑板下面用枕木垫承。滑板上平置一对对用来承托船体的木墩,间距的宽窄不等。经鉴定,木墩为材质坚重的格木,以利承托船体;两行滑板因贴着湿泥,采用耐腐蚀的樟木;枕木用质轻富于弹性的杉木。这 3 个不同的部件选用材质性能不同的木材,以适应不同功用的要求,表明当日对木材选用已有很高的鉴认水平。2 号船台每个木墩的底部都有一个小圆凸,插入滑板面的卯眼中,以作定位。这一点很重要,它说明当日这个工场是按规格成批造船的。按现存的宽距推算,此处造船工场可以建造船身宽 5—8 米,载重 25—30 吨的平底木板船。由于船台的两行滑板与承垫的枕木之间不用钉,也无榫卯作固定,两行滑板的宽距可以随需要作移动,因而此处造船工场还可以建造小一些的或大一点的木船,以适应在内河和沿海岸的航行。另外,每个造船台系由二行滑板与木墩组成,因此 3 个台可以并台造船,3 个船台能起到 5 个船台的功用。造船工场遗址的发现,证实秦汉之际番禺(今广州)已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

2. 南越国宫署遗址

位于中山四路忠佑大街,西与秦代造船遗址相距约 40 米。1995 年下半年发现,发掘 400 平方米,已揭出宫署遗址的一小部分,为一个呈斗形的石构水池状建筑。其西、南两边同为斜坡形,各仅揭出长 20 米、东、北的两边都被楼房压着,全貌未详。遗址南边揭出的是一片用砂岩石板精心铺砌的,向北倾斜的斜坡形池面;西边的一片铺石面向东倾斜。两斜坡池面交角相接处砌出一条直线。两边的坡面斜长各为 11 米,全用 5—12 厘米的灰白色砂岩石板呈冰裂纹斗合铺砌,砌作精工。南面池面的铺地石板下,埋有一条木质渠管,可能是用来给池状建筑注水用的。池底全用河卵石和碎石平铺。池内东北角处还有石板叠砌的大型柱状遗迹向西南方向倾倒。显示出池中原有大型建筑尚待揭开。

压在遗址上的土层中出有大批绳纹板瓦、筒瓦、“万岁”瓦当、印花铺地砖、八棱形的石栏杆、石柱等陶、石建

●研究与争鸣●

筑构件和铸铁的门轴套、铁斧、铁凿、错金铁剑、鎏金半两铜钱等物。

在遗址斜坡石地板上发现有部分石刻文字，其中有“蕃”、“阅”、“睨”等字，西坡的石板上刻有“□□北诸郎”等字，同为秦篆，字径约30厘米，这是岭南出土最早的石刻文字。另外，在板瓦中还发现有“公”、“官”等字的戳印，在一块印花铺地砖上压有“左官帑蕃”四字戳印陶文。发掘后，又在遗址周围进行钻探4.6万平方米，初步探查出这个斗形池状建筑约有4000平方米，可能是宫署内一个与蓄水有关的大型石构遗存。中国古代建筑是以高台基的木构架为主要特征，秦汉时期的大型石构建筑尚属首次发现，遗址规模大，又在繁华的市区中心，十分重要。这次发掘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3、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

1983年发现。陵墓构筑在象岗的腹心深处，从岗顶劈开石山，凿出深20米的墓坑，用大小750多块大石砌筑墓室，其上再用沙土分层夯填至顶。石室是仿照墓主生前的前堂后寝形式，布局对称。石室南北全长10.85米，东西最宽12.5米，分前后两部分，由二道石门分隔开。前部3室，后部4室，各有门道互通。7室各有它的使用功能：前部正中是前室，四壁和顶上都会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装饰华丽，象征主人生前的宴乐厅堂。东耳室是宴饮用器的藏所。西耳室是贮存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器及珍玩等物的库房。后部居中是安放墓主棺椁的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陪葬印玺9枚（从所出印玺确认墓主的身份）。东侧室殉葬4个夫人，各有印玺随葬，身份清楚。西侧室埋葬7个殉葬的庖厨隶役及猪、牛、羊祭牲。主室北面是贮放御膳珍肴及各种炊具、容器的库藏。墓门外还有一座大型木构的外藏椁，椁内和南面斜坡墓道上各有1殉人，属墓主的守门卫士。

墓中除15个殉人外，出土的各种随葬珍品1000多件（套），其中以青铜器和玉器最为精彩。中国境内西汉时的金印已发现4枚，有3枚出于南越王墓中，其中的一枚龙钮“文帝行玺”金印，是番禺曾为南越国都城的最权威物证。该墓出土如此丰富的实物史料，对研究秦汉年间岭南地区的开发，城市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历史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发掘后，已在原地建立博物馆。

4、两汉墓群

广州近郊岗峦起伏，在这些大小的山岗中往往是秦汉以来的古代墓葬区。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州清理发掘了大批古墓，其中以两汉时期的墓最多，出土文物也最为丰富。根据1953—1960年的统计，两汉墓分

布在今广州市区内和近郊、远郊的有82个地点。墓葬的年代可以划分为五期，即西汉前期、中期和后期，东汉划分为前、后两期。西汉前期相当于南越王国阶级，我们根据广州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把西汉前期的上限定在秦始皇二十八年统一岭南进军之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南越国之年止，上下延续109年，我们称之为“南越国时期”。南越国的墓主要分布在东北郊，今淘金坑、华侨新村、黄花岗至动物园都发现有南越国的墓群。西郊也有，往往是三、五座或二、三十座墓分布在高低起伏的小山岗上，既有大墓，亦有中小官吏的墓和平民的小墓，但南郊的海珠区至今未见有这时期的墓群发现，实与当时宽阔的珠江河面阻隔有关。从调查发掘得知，在今天的市区内也有南越国的墓发现，墓地的东西相距仅2.25公里，可见当中的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规模确实很小。广州的两汉墓主要分有土坑墓、土坑木椁墓和砖室墓3种。在中国的中原大地，东汉时木椁墓已消失了，但在广州地区一直流行到东汉末年。在木椁墓中，椁室分作上下二层，上层置棺具，下层放随葬物的分层分室结构，在南越国时期已有出现，西汉中期盛行，存在了四百年，这种结构独特的木椁墓当是仿照生人的居处布局而来，即上为人居，下作贮物和圈养牲口的干栏式木构建筑而来，颇具地方特色。到东汉初年广州才有砖室墓出现，凡大型的砖墓都是圆锥形凸顶与券顶相结合，墓砖上常有刻写或模印的纪年文字，年代明确。广州汉墓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无异于一部实物史书，它比较具体的反映此时此地的社会历史发展概貌，帮助我们得以比较形象的、可信的认识过去，这是出土文物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二、两千年前广州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材料来看，在今两广境内还未发现有秦汉以前的城邑，甚至连稍具规模的民居聚落也很少发现，表明先秦时期岭南大地远比中原地区为落后，社会经济发展是缓慢的。到了秦汉时期，岭南正式归入秦帝国和汉帝国的版图，此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进入一个飞跃的新阶段。被《史记》和《汉书》称为岭南一都会的番禺（今广州），成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海路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过去，人们想要了解二千年前广州这段历史的概貌，实在有赖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一篇《南越列传》和班固在《汉书》中作了重要补充的《南粤传》。但《史》、《汉》两传所记的主要是赵氏南越王国的兴亡史事，着重记述它在政治上与汉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至于当时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民情风俗等则极少涉及。近四十年来广州两汉墓的大批发现，秦造船台与南越官署遗址的发掘，特别是象岗南越王墓的发掘，无异于打开了岭南地区的文化宝库。如此丰富

的各类遗物的出土,重要遗迹被揭开,为我们研究二千年前广州以致整个岭南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直接最形象的材料,下面仅就我们已掌握的广州秦汉考古资料结合记载所作的初步研究,归纳为四个方面作一概括的描述。

1、农业

广州是古代南越族人聚居中心,在百越族中,南越人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但在秦统一岭南之前,仍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阶段。秦平南越,五十万秦军留戍,铁农具铁工具及牛马羊等家畜从中原输入,这对岭南的社会生产方面是破天荒的大事。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工具、农具和兵器等 246 件,与之同时的广西贵县罗泊湾 1 号墓出土铁器 25 件,平乐银山岭墓群出土铁器 206 件,还有广州汉墓出土的一批铁器。总的看来,铁器在南越国的农业、手工业等重要生产部门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了。但农具的种类还不多,只见有锄、锤和镰刀,而农耕中代表先进的铁犁牛耕如铁犁铧、齿耙等在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与遗址中都未有发现,可能到武帝灭南越以后,牛耕才被推广到岭南。已发现的粮食作物以稻谷为多见,还有黍、粟、大麻籽和高粱。属蔬果类的,已见有橄榄、梅、酸枣、人面子、花椒、金银花、西瓜、葫芦、桃、李、橘子和荔枝。到了今天这些仍为岭南蔬果的主要品类。广州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较普遍的有屋、仓、井、灶五种模型明器随葬,仓、囷全是高脚屋的干栏式结构,贮粮的仓室下面有木柱支承,使仓台高离地面,以适应南方多雨,地势卑湿的自然条件的要求;陶屋中都塑有舂米簸米的陶俑在进行粮食加工的情形。在一座东汉初年墓中出土的一个陶提筒,尚存半筒高粱,筒盖里面有“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十一个墨书文字,表明当时已用高粱酿酒。与此同时,墓中往往有成群的陶塑猪、狗、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出现。这种仓廩丰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图景,正是从另一个侧面对当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写照。

2、主要手工业

农业与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两千年前广州的手工业门类已相当齐备,制陶、炼铜、冶铁、玻璃、纺织、制漆、玉石牙雕与金银制品等都有一定水平。

①制陶、炼铜、冶铁

广州的制陶工艺是继承前代的印纹陶传统而来,经两汉四百年的发展,在器型、纹饰、胎质、火候、施釉、施制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纹饰方面的几何图形戳印纹和刻划精工的组合纹;各种联罐、小盒、熏炉等越式的器型;灰白胎,质地坚硬,火候在摄氏 1000 度以上和高温的玻璃质青釉等,这些构成了广州汉陶的独特体系。这个陶系影响及于广西、湖南、福建等邻近地区。南越国

官署遗址出土有各种印花的铺地砖,规格特大,为 93×93×15 厘米,砖质坚致,火候也高。同出的“万岁”、云纹等瓦当,还有绳纹、麻点纹的筒瓦、板瓦,陶质的脊饰的窗棂,这些建筑用材也是当时制陶业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在广州东郊的暹岗,相当春秋战国年间的一处遗址出土有越式的青铜短剑和戈,器形纹饰都有地方特点,应为当地所制,也是本地区发现最早有炼铜的实物记录。南越王墓保存的随葬物以铜、陶、铁、玉四类为最大宗,其中铜器的数量居首。如鼎有 36 件,分属中原汉文化的、南方楚文化和当地越文化特点的三个类型。一对越式大铜鼎,大小 3 个成系列的烤炉,8 件一套的勾罐,还有 14 件一套的钮钟,5 件一套的甬钟,11 件越式熏炉等都为本地所铸,表明当日在青铜冶炼方面已有相当的规模。

汉代,广州是否已有冶铁的手工业存在?回答可从南越王墓出土一个越式大铁鼎,重达 26.5 公斤,还有南越国官署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铸铁的木门枢轴套件,得到肯定的答案。同墓出土的各种木作铁工具近百件之多,经化验,多数是用热锻加工和淬火处理的,即利用故铁、废料反复锻打的作法制成。这种落后的生产工艺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已不采用了。很明显,这是因为南越境内缺乏铁矿资源。汉武帝把冶铁,煮盐和铸钱三业收归国有,在全国产铁的郡县设铁官,南海郡不产铁,没有铁官,但番禺(今广州)处近海,产盐,设有盐官,也可以明南越国时虽然已有冶铁的工业存在,但未能形成较具规模的生产水平,铁器主要还要仰给于中原。

玻璃珠在广州汉墓中常有出土,玻璃璧只见于西汉的早期墓中。有 3 个珠串样品经化验,其成份与中国的铅钡玻璃系统有别。相反,与西方的古玻璃相类。南越王墓出土两种玻璃制品十分引人注目。一是镶嵌在铜牌饰中的蓝色平板玻璃,另一是蓝色的玻璃贝和蓝色的玻璃珠串。经取样化验同为大量铅(25—33%)、钡(13—22%)成份,属于中国古玻璃系统。这些特殊用途的玻璃制品属南越国的工官所监制,为当地所产。

②纺织与制漆

丝麻织物在汉墓中不容易保存。南越王墓出土的 1000 件(套)随葬品中,铜器、铁器、玉石器等几乎都是逐件先用丝绢包裹,然后再放入竹筒、漆木盒、箱或麻袋等大容器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整匹的丝绢随葬。可惜全部织物均已炭化。只能在高倍数的放大镜下辨认出有平纹绢、方孔纱、斜纹绮、刺绣以及组织复杂的锦、罗、绉纱和提花锦、绒圈锦等高级织物。有一种超细绢的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为 320×80 根,这是目前已知的汉代平纹绢中经纬密度最高的织物。墓中还出有 2 块青铜印花凸板,花纹图案与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的图样相同,但图案的纹样单位大了一些。在已炭化的织物中

●研究与争鸣●

从放大镜下看到有与之相同的图案,可以认为是南越所产。这2块印花凸板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织物印花工具,它对中国古代印染工艺的研究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南越王墓随葬漆木器物不少,但已朽坏不存,仅一座漆木围屏得以复原。广州两汉墓也有漆器随葬,个别大墓所出的漆器保存较好。其中数量最多的耳环、盘等与马王堆汉墓所见,在器型上无异但纹饰作风有别。还有一种描金图案的漆盘,在别地出土汉代漆器中未见。有的漆器还烙印南越的地名,这些漆器无疑是在南越国的漆器作坊生产的。

③玉、牙雕刻与金银制品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大,品类多,雕镂精工。从总体来看与中原各地所出的汉代玉器无太大的区别,但有的器形如角杯、玉盒、承盘高足杯、龙虎合体带钩等,实为汉玉中的孤品。纹饰的图样有的亦为过去所未见。墓主身穿的“丝缕玉衣”,应为南越自制的。还有3块玉璧,刻划的花纹还未有完成打磨抛光的工序(同墓出土3件铜烤炉,有2件炉体的内范还未清除),它给予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当日操办南越王的丧事是比较仓猝,有些来不及加工完成的器物也用来随葬;另一方面还可认定,在这批汉玉中,有的作工精美的器件如玉璧等是在南越制作的。

象牙和金、银制品都是稀有品,为一般汉墓所少见的。南越王墓出土5支原支象齿,还有计划画填色的牙卮。右夫人的“赵蓝”牙章,象牙算筹以及镶嵌在剑鞘上、屏风上、博局上的象牙饰物。墓中出土一批金、银制品,其中的“文帝行玺”、“泰子”和“右夫人玺”3枚金印,绝不会是汉廷中央授与的,应为南越国自制。至于一批焊珠金花泡,蒜瓣纹银盒,均属于来自海外的舶来品,但银盒上留有后来焊接的附加物,加上墓上出有作为原料用的4块银锭,可以认定,当日南越都城内存还有一个特种工艺品的手工业作坊,是专为王国宫廷制作高级珍玩与特需物品的。

3、水陆交通贸易

秦将赵佗在岭南建立的南越王国,选址番禺(今广州)作为王国的都城,这是非常恰当的。此地位于珠江下游,是东、西、北三江的汇合处,水路四通八达,可远通邻近的郡县,腹地深广。东南为珠江的出海口,占有河港兼海港的优越条件。《史记》中列举汉初全国有19个著名都会,番禺就在其中。《汉书·地理志》说:“(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些中国(指岭北各地)商贾可以由珠江上游顺流而下,“咸汇番禺”;陆路则有秦时修筑的新道,经五岭的谷口,通往岭北的邻近地区。但在古代交通工

具条件的限制下,尤其处于河网地带,利用舟船运输显然比陆路方便得多。一船之载较之一车之载可多至几十倍。广州的两汉墓有牛车、马车模型随葬的绝少,但出土船模多达15件,为全国之冠。这些船模类很多:有适合在一般浅窄河道上撑篙前行的货艇;有作交通用的渡船;有船首系锚,船尾设舵,中部分隔多个舱室行走于江河湖泊间的客货混载航船;有附于水田旁边的农耕运输小艇;更有船上建重楼,设10桨1橹,船板施彩画航行于海上的大型“楼船”。南越王墓出土一个铜提筒,腹部刻有四条规模大、设施完善的大型海船,首尾相接。四船大同小异,船上分立三橹,中悬建鼓,又有了望台(棚台),船头处系一首级,船上各有5个执兵器的武士,头戴羽冠,腰系羽裙,佩短剑,船舱内装满铜鼓。从人物活动情况及船上装备来看,描绘的似为这支船队打了胜仗,大有斩获凯旋而归的威武场面。

番禺(今广州)历来是海外奇珍的集散地。《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说明在秦统一岭南以前,越人与邻近的海外地区早有物品的交换往来,南越王墓出土的非洲象齿,产自西亚的银盒、焊珠金花泡和乳香以及熏炉燃烧用的香料等同属海路输入的舶来品。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分南越地为9郡,又派遣一支船队远航南亚诸国,之后番禺的海外贸易交往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广州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较普遍的有熏炉、串珠,特别是一种外国人模样的奴俑用作随葬,反映出当时海上交通贸易的发达。

4、人文鼎盛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促进的。两千年前的广州,随着岭南大地的开发,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产同样有很大的变化。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

①汉越文化的融汇发展

汉高祖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的诏书中说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因为秦以前南越社会仍未脱离野蛮阶级,生产落后,氏族间因掠夺俘虏而经常发生战争。赵佗主越后,南下的秦军与越人共同开发岭南,推行汉越杂处,尊重越人风俗习惯,任用越人首领为南越的高官,主张汉越通婚等民族和睦政策,促进了汉越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加快了以番禺为中心的岭南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从广州的考古发现亦可以看出当时的“杂处”与融汇。在南越国墓中,许多有鼎、盒、壶、缶一套汉文化陶器与越式的陶器共存;铜器也是汉式和越式同出的。但有少数的墓只有越式器物,在棺位置下有“腰坑”,这些墓主应为越人。广西平乐银山岭

浅谈唐墓昆仑俑的历史背景

阮应祺

在我国古代墓葬中,偶有昆仑人形象陶俑或雕塑物出土,如广州的汉代黑奴俑(《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2期)、洛阳的背魏元邵墓昆仑俑(图1)、西安永泰公主墓、裴氏小娘子墓(图2)、洛阳唐墓、广东高州良德唐墓均有出土(依次见《文物》1964年第1期、《文物》1979年第6期、《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第57图《文物资料丛刊》第6期,1982年)。其中广东高州良德唐墓出土的一件昆仑女人青铜头像(图3),似系杖头雕塑物。该头像卷发下垂,条理分明,两颊微隆,眉心有凹痕,眼大而露,高鼻厚唇,两耳为下垂卷发所掩,仅露耳珠和耳珥。颈作长圆柱体,中空,里面仍残留一段削尖的木棍。其形象很可能是唐代史籍经常提到的南昆仑人。

我国古代同海外昆仑诸国交往源远流长,自汉至清二千年,历代史籍均有记载,虽则称谓各异,记有繁简,但可谓史不绝书。昆仑俑或是昆仑人形象雕塑物,似可称为“涉外历史文物”,是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历史的独特见证物。限于知见,本文仅能参阅一些史籍和时人研究成果,粗浅地谈谈唐代与海外昆仑人的交往情况,以祈能对唐墓出土昆仑俑和雕塑物的历史背景有个粗浅的了解。

一、昆仑人的特征和地望

的瓯越人墓群,随葬物的文化特点亦与此相同。表明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的丧葬习俗。其后,这种现象消失了。广州汉墓出土最早的陶屋建筑模型是越人的平面呈一字形的简单干栏式,其后才有汉文化的曲尺式、三合式和楼阁式出现。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物除了主体的汉文化器物外,还有各种越式铜鼎、铁鼎、铜勾罐、熏炉等;有匈奴文化的牌饰和兽纹金薄片;有骆越文化的铜提筒;有楚文化的铜鼎、铜镜和虎节等;有秦文化的铜蒜口壶、铜镜等;有巴蜀文化的铜釜、铜釜甑,还有来自海外文化的银盒、焊珠金泡。这样丰富的、多种文化因素的遗物共存于墓中,也是对“杂处”融汇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②番禺都会

番禺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统一岭南后置的县。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把它列为岭南的一都会。为什么叫“番禺”?在当时大概是指“南蛮的居处地”的意思。中国古代的华夏族其四邻的少数族人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孟子也把楚人称为“南蛮鴟舌之人。”其

我国古代昆仑(昆仑)一词,有时写作骨仑、堀伦、古龙等等,意指黑色,可喻黑肤之人。就人种而言,则是专指海外以“黑身”或“卷(拳)发黑身”为体貌主要特征的人。唐代史籍有很多记载:

《旧唐书》一九七:“自林邑已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昆仑语音义:“上音昆,下音仑,时欲语使亦曰骨论,南海洲岛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驯服猛兽犀象等。种类数般,即有僧祇、突弥、骨堂、阁蔑等,皆鄙贱人也。”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良为堀伦初至广州,遂使总唤昆仑闯焉。唯下级昆仑,头卷体黑。”

以“卷发黑身”这一特征,查检史籍中出现的海外地名和居民体貌,参照近人有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体知道唐代“昆仑”是指以下一系列国家、地区、部族和居民:

林邑(环王、占婆)——故地在今越南半岛中部以南。其人“拳发色黑。”《旧唐书》卷一九七,以下所引昆仑人体貌资料,据《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通典》、《岭外代答》、《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向达《蛮书校注》、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

后对华夏族以外的人概称为“番人”、“番邦”、“番国”。禺字是地域的意思。赵佗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自称“南蛮大长”,又责备吕后“别异蛮夷”。在当日视番禺为“南蛮的居处地”,看来是并不讳言的。番禺这个地名简称作“蕃”,可从南越王墓出土刻有“蕃禺”或“蕃”字的13件铜器中得到确证。“蕃禺”这个地名在秦汉考古中计有6次出现;1953年广州一座秦墓出土漆盒有“蕃禺”烙印。南越王墓出土36件汉式和越式铜鼎,其中有9件刻写或用漆书“蕃禺”或“蕃”字的。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南越墓的铜鼎,刻有“蕃”字。广州南越国宫署石构建筑的石板上刻有“蕃”字。广州东汉墓的墓砖印有“番禺丞”,香港九龙东汉墓发现“番禺治历”、“大吉番禺”。番禺地名出现频率之高,覆盖范围之广,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心实为罕见,这也正是它在秦汉的四百年中人文鼎盛的一个重要反映。

(作者单位: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研究与争鸣●

丛续编》，并参考费琅着冯承钧《昆仑南海古代航行考》等书，不再一一作注。

波斯——此谓南海波斯，而非中亚波斯。泛指多地，故地在今何处，未有定说，或曰在缅甸，或曰在苏门答腊，或曰在加里曼丹，或曰在爪哇。“其人肌理甚黑，鬃发皆拳。”

骠国、弥臣、大小昆仑部——故地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口以东至泰国之间，国人“面黑而短”。

扶南——或称真腊，故地在今柬埔寨。国人“黑身卷发”。

盘盘——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中，其国大臣“亦曰古龙。古龙者，昆仑音近耳。”

麻逸——亦作摩逸。故地在今菲律宾尼多洛岛和吕宋岛。麻逸“犹言黑人之地。”据近人调查，菲律宾等地近代仍有矮黑人“叫埃塔人，或叫尼格利托人，人数22000—24000，居住在吕宋、尼格罗斯、班乃和若干较小的岛屿。他们的皮肤暗黑，其中有些人就像非洲黑人一样黑，有着……乱蓬蓬的卷发。”（约翰·福尔曼《菲律宾群岛》，1906年·纽约。）“类黑人族是南洋群岛民族里最幽久的一派……其特点如下：身材短小，皮肤极黑，鼻翼宽阔，颧骨突出，头阔而短……南洋群岛的类黑人族除住在马六甲和菲律宾以外，也有人相信别处还有的。”（黄素封《科学的南洋》，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婆利——故地今爪哇东面。其国“俗黑身，朱发而拳。”

罗刹——故地在今爪哇附近。国人“朱发黑身。”

室利佛逝、诃陵——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和马六甲一带，是唐代南海交通线上的枢纽地区。国人“身肤黑漆。”

狮子国——故地在今斯里兰卡（锡兰）。国人“肌肤甚黑。”

大食国——故地在今阿拉伯。国人“男儿色黑多须，鼻大而长，似婆罗门。”“男子鼻高，黑而髯。”

殊奈国——故地在今非洲东岸。“殊奈及甘棠二国，皆昆仑人也。”

拔拔力、磨邻、僧祇——拔拔力，故地在今非洲索马里北部的柏培拉，一说在奔巴岛。磨邻故地在今东非马林迪，“其人黑而性悍。”僧祇，又作层期，昆仑层期，故地在今东非坦桑尼亚的桑给马尔。以上三国约在非洲东部，自然“其人黑”。

综上所述，“昆仑”一词泛指印度支那半岛中部以南、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南端、阿拉伯半岛直至非洲东岸广阔地域上的一系列岛屿和近海国家，即唐代中国同南海、印度洋贸易交通线上、有“卷发黑身”部族人群居住的一系列国家、地区和岛屿。

二、昆仑人来华的主要途径

唐代经济文化发达，国力强盛，门户开放，对外交往

频繁，有不少昆仑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唐代中国。

海道贸易

我国对外交通交往贸易之路，到唐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东南海上之路的重要性和繁荣，开始超过了西北内陆之路。南海郡治广州，则依凭航海技术的发展、地理位置的优越、海外交往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经验，形成了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和海外贸易中心。唐德宗贞元间任宰相的贾耽，写有地理著作和国籍多种，其中《广州通海夷道》（见《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记述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半岛东岸，至马来半岛南端，东南往爪哇，西往苏门答腊，过马六甲海峡，北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往西至波斯湾，沿伊朗西南沿海到伊拉克，溯幼发拉底河到巴格达的上航路，提到国外30多个国家、岛屿、河流的具体名称。这就是比《汉书·地理志》记述从徐闻、合浦启航经南海、印度洋，至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回程的汉代海上交通航道更为发展的唐代同南海、印度洋沿岸昆仑诸国为主的海上交通航路。贾耽能记述这条中国中世纪的主要海外航道，实得益于当时中国同昆仑诸国的交往。史载贾耽“好地理，凡四夷之使和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始终”（《旧唐书》卷一三八）。唐代不少使者、商人、僧人和“四夷之使”，往返于南海、印度洋沿岸诸国，他们丰富的见闻、著述和“乘舶未朝之人”的述说，为没有到过外国的贾耽写出《广州通海夷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统计，《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西行求法的僧人共60人，取贾耽所记海道的33人，超过了取道西北经西域去天竺的人数，（周中坚《古代南海交通中心的变迁》见《海交史研究》，1982年第4期）。也这显示了南海航道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和优越性。

唐朝对经海道前来通商贸易的昆仑诸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和船帕，“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卷七五·文宗大和八谕。）商船只收船脚（下碇之税），货物税值十分之三。朝廷设互市监，广州设市舶司使“掌蕃国交易之事”（《新唐书》卷四八；李肇《国史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〇）。在广州的外商推举“蕃长”或“蕃客大首领”与唐朝官员接洽处理有关贸易交往等事宜。进口货物交税后即可在市场上销售（禁品除外）。外商兀亡，货物由官府代管，等待有“验证”的合法继承人领回。为了贯彻这些鼓励贸易的政策措施，唐朝政府一方面严厉打击利用职权“多务征求”、“率税犹重”、“受贿贪赃的官吏，另一方面注意选派廉洁、不暴征的官员到广州主管对外贸易通商。史载开元、天宝间刘巨鳞、鼓杲相继为南海太守、五府节度使“皆坐赃巨万而死”（《旧唐书》卷九八）。而宋砮、李朝隐、卢奂、李勉、韦正贯、卢奂、孔戣等人，则先后在广州任内

廉洁自持,秉公执法,打击贪利,取消不合理的规定和苛例,发展贸易(《新唐书》卷一二四、一二九、九八、一三一、一九八、一八二、一六三。)

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命官得人的情况下是能够促进海外贸易的。李勉在唐代宗四年(769年)拜岭南节度使时南海诸国商舶“岁至才四五”,由于李勉廉洁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余柁”(《新唐书》卷一三一本传)。盛唐期间,许多昆仑舶、波斯舶和昆仑人来到广州,出现蕃舶云集、环宝山积的繁荣景象。李肇《国外补》下卷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者,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元应《一切经意义》卷十载:“船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谓之舶,昆仑及高丽皆乘之,大者受万斛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一记载南海船舶“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比船多骨论(按,骨论即昆仑的异译)为水匠。”(转引自李季平《唐代昆仑奴考》,《文史》第16辑,1982年11月出版)。日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八年(749年)鉴真和尚等五次东渡日本途中遇风,船漂流到海南岛,被南海郡大都督、广州太守卢奂接到广州,他见到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条史料所说的婆罗门指今印度。波斯似指“南海波斯”,师子国故地在今斯里兰卡,大石国疑即大食国,骨唐亦作骨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将其与僧祇、突弥、阁蔑(吉蔑,故地在今柬埔寨)并列均是昆仑人居住之国。综合上引史料似可看到,唐代同南海、印度洋周围诸国交通贸易的规模是很大的,而且主要是以广州为进出口岸同广义的昆仑诸国的交往贸易;随“蕃舶”进入广州的“四夷之使”、商人、尤其是“水匠”,主要亦是昆仑人,其中应有一些到了唐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由于到达广州的大食人多,唐朝特别在广州辟出一处地方作为他们居留地。

朝贡通好

唐朝很重视同昆仑诸国的通好交往。朝廷有主客、鸿胪寺、典客署、中尚署等部门分别管理诸蕃朝贡事宜。使者入境,始至之州给“边牒”,地方官接见,按品给衣冠,确定入朝人数,传驿送京。使者到达和离开长安,皆设会。参朝之日,给从海路来的使者“祈羊豕”各一头。使者献物,由有关部门详观、定价,以便确定回赠品的数量与质量。使朝者可以请求在长安逗留观光,被授官爵的可以作长时间居留。使者有病,派医治理,给汤药;有丧,给所需费用。使者返国,按品级赐物,发给“过所”(通行证),并按路程远近给人海钱粮,“南天竺、北天竺、波斯、

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逝、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唐会要》卷一百。)太宗、玄宗时,经常邀请在京“诸蕃酋长”和使者宴会,容许他们上书奏书,陈述意见,甚至对于最能显示君主尊严的跪拜礼亦可变通,容许外国使者“平立不拜”(《旧唐书》卷一九八。)。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与海外诸国的平等友好关系。

贞观十年(635年),远处非洲东岸的昆仑国甘棠遣使来朝,唐太宗与群臣总结原因,认为主要是政治安定,“向使中国不安,何缘而至?”(《唐会要》卷九九)据不完全统计,则天垂拱二年至玄宗开元十九年(686—731年)四十五年间林邑国来朝十三次,其余昆仑国也“遣使来朝”远在非洲大陆的殊奈国也于贞观二年(628年)遣使至长安“上方物”(《新唐书》卷二二二。)。有些国家来朝,实际上是派来一个人数很多的“代表团”。例如真腊国王子在玄宗时“率其属二十六来朝”(《新唐书》卷二二二。),“属”如指下属随从,连王子即有二十七人“属”如指属国或城邦,一属来者不止一人,则队伍更大了。往往因为来朝人数多,到广州后只能“择首领、左右二人入朝”(《旧唐书》第四八。)。有些国家前来朝贡通好时,除献“异物名宝”之外,还有把昆仑人作为贡品进献的。元和十年(815年),诃陵国“遣使献僧祇童五人,鸚鵡、伽加鸟并异物名宝。……十三年,遣使进僧祇女二、鸚鵡、玳瑁及生犀等”(《旧唐书》卷一九七。)。室利佛逝国在咸亨、开元间多次遣使朝贡,“献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新唐书》卷二二二。)。如上所述,僧祇即今东非的桑给巴尔,其黑人童男童女经今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的昆仑之圆献于唐朝,进入京师等地。

文化交流

唐代佛教僧侣为了寻求和翻译佛经,足迹到达许多昆仑国。他们走海路时,经常得到昆仑人的帮助。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不空和尚乘坐“昆仑舶”去师子国。临行,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鳞约见蕃客大首领伊习宾说:“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得三藏并弟子舍光慧辩等三十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宋高僧传》·不空传。)。昆仑舶战胜了大黑风,终于把不空等人送到师子国。为了翻译佛经,有些唐代僧人到谭陵、室利佛逝和天竺留学,拜昆仑人为师,刻苦学习昆仑语,“习梵书”,历时数年乃至“十有余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运期、大津、贞固等传。)。最著名的是义净和尚,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未隔两旬,果之佛逝”,在室利佛逝国王资助下前往天竺,求经十年,重返室利佛逝译经,“所将梵本二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义净传。),直到证圣元年(695年)才回国。毕生致力于佛教东

●研究与争鸣●

传的鉴真和尚,在天宝十二载(753年)第六次东渡日本时,随行的二十四人里有一位“昆仑国人”军法力。军法力之名同中外僧人并列,肯定不是奴仆,很可能是经师或翻译,他不仅为唐代中国与昆仑诸国的文化交流,而且为唐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通过海道交往,昆仑之国的艺术如音乐、舞蹈等也同时传入唐代中国。《新唐书》卷二二记载,唐有十四国之乐,其中扶南(今柬埔寨),骠曾(今缅甸)属昆仑国乐。唐德宗贞元间,骠国王派共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来献国乐,并率领艺术人员入长安表演,轰动一时。骠国这次献乐,《新唐书》有十分具体的记载:乐曲十二,乐器三十八,乐工三十五“皆昆仑”(《旧唐书》卷二九)。所献三十八种乐器中,有一种拨弹式云头琵琶,“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新唐书》卷二二二)。

掠卖为奴?

被掠卖到唐代中国为奴的昆仑人,有些来自非洲,更多的是来自南海昆仑诸国。十世纪初,阿拉伯人马斯迪欧曾叙述前此有“运怒船”从桑给巴尔开到中国(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诃陵国、室利佛逝国进献的僧祇男女和僧祇奴,也是来自非洲。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昆仑层期间条记载其国“西南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叫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大食国又把这些从非洲诱擒昆仑人转卖到诃陵、室利佛逝和中国。本来唐朝禁止掠卖外国人为奴,“前后制敕,处分重叠”(《唐会要》卷八六),但法令始终未能执行。天宝间,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遇巨风漂至海南岛,万安郡(今万宁县)大首领冯若芳热情接待。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称,冯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转引自周一良《鉴真和尚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文物》1963年第9期)

三、昆仑人在唐代社会中的行藏形象

来到唐代中国的昆仑人有国王、王子及其妻、城主、官员、使者、译员、商人、水手、僧侣、童、女、侍从、乐工、舞者、游客、奴仆等等,他们的行藏形象,在文献、笔记、传奇、诗歌里面均有反映。

唐代经济发达,海外交往频繁,社会风气侈糜,喜蓄昆仑奴以显示富有和新奇。因此,入唐昆仑人大多数的“社会职业”是当奴仆。宫廷蓄养昆仑奴,在南朝宋已见记载,《宋书·王玄谟传》记载孝武帝“宠一昆仑奴子,常在左右,令以仗击群臣。”入唐,蓄养昆仑奴之风遍及官宦、士人、豪富人家。“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家中有昆仑怒磨勒”义侠勇捷,以飞檐走壁之技,玉成崔生与当朝一品大员家歌舞奴“红绡”的婚恋。一品大怒,“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杖,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

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譬若翅翎,疾同鹰隼,攢乔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裴《传奇》·崔生条。又见《太平广记》卷一九四·昆仑奴条。)。有陶峴者,“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其亲戚任南海郡守,陶峴往访,“郡守喜其远来,赠钱百万及遇古剑,长二尺许,又玉环,径四寸,及海船昆仑奴名摩诃,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钱而贯之,曰‘吾家至宝也’。乃回棹,下白藏,入湘江,每遇水色可爱,则遗剑、环于水,命摩诃取之,以为戏乐”(《甘泽谣》·陶峴条。见《太平广记》附录。)。下层官吏与士庶之家也喜蓄昆仑奴。兴元元年(784年),告密使阎敬立夜出凤翔山,觅太平馆住宿,受到知馆官刘倣接待。刘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尔”(《太平广记》三三九·阎敬立条。),又派东西两槽马各一匹送行。天明至前馆,失奴、马所在,方知刘倣已早死,急回视,唯见“殡宫”左右有木马,“殡宫前有冥器数人”,此冥器数人就是道奴、知远二昆仑奴俑和其厨下“三数婢”俑。此外,昆仑人有的作马童(《博异志》·王晶龄条载王日昌龄诗神诗:“青一疋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云云),有的替人耕田(《太平广记》卷十六·张老条载:因叟张老,命其子寻姐,“到天坛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不过是少数。

在乐舞方面,昆仑人的活动和影响更常见。唐代宫廷有十四国之乐,昆仑国乐占其二。在京的许多“四夷使节”和“蕃长”不仅精通本国乐舞,而且懂得唐人乐舞。太宗贞观七年(633年)演秦王破阵舞,“蛮夷十余种自请率舞,诏许之,久而仍罢。”(《旧唐书》卷二八。)这“蛮夷十余种”,应有昆仑人在内。唐代宫廷和民间广泛流行的太平乐,又称“五方师子舞”,属于昆仑之光。演时,人扮五色师子,按五方位站立,二人持绳秉拂,逗引起舞,一百四十人齐唱“太平乐”,且歌且舞,“持绳者服饰作昆仑像”(《旧唐书》卷二九。)。唐人扮昆仑人,既要注意服饰和肤色,又要把头发弄成卷曲状,方法是“用绳围着,反约发杪,内于绳下。”

在习俗方面也有反映,表现为以“昆仑”一词嘲人肤色黑。此习俗在东晋时已出现,史载孝武帝时,李太后早年“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至唐代此习俗更盛,有崔涯者,以诗闻。曾连续题诗于歌妓院,嘲一妓曰:“虽待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嘲妓李端端曰:“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囟耳假铛。独把象牙梳插胡,昆仑山上月初生。”(《云溪友议》·崔涯条。)。弄得李端端狼狈不堪,只好向崔求情,“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

入唐昆仑人中,有些是旅游者。他们在长安招摇过市,奇装异服,引人注目。张籍有诗咏曰:

南雄盆地“红层”的分层与地质时代

庄子圣

广东南雄及邻近地区广泛分布的“红层”与时代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引起了中外地质学家的关注。如德国人李希霍芬(F·Richofen)及日本人野田势次郎(S·Noda)和饭冢升(N·Oilsuda)均来南雄作过调查。1928年后,我国地质学家冯景兰、朱翔声和陈国达等先后在南雄一带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南雄红层”的命名就是冯景兰先生提出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区域地质测量工作的开展,有不少野外工作队和地质工作者在粤北及南雄一带,进行地质测量和找矿工作。1960年,广东省地质局野外工作队在南雄境内进行地质调查时,首次发现八块脊椎动物化石,后经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周明镇研究鉴定为龟类和恐龙趾骨等化石,这次发现为解决粤北“红层”的分层与时代提供了线索。196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张玉萍、童永生、王存义、张广义等来到南雄进一步开展调查和采集工作,在南雄盆地发掘了大量的不同层位与不同种类的脊椎动物化石。这次工作,为南雄盆地红层时代及其分层问题的解决和我国华南地区的中、新生代地层界线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资料。延至近年也有许多中、外古生物和地质学家来到南雄实地考察。本文就以古生物专家在南雄考察所写的一些资料为引子,并结合本人10多年来对南雄红层进行普查和发掘工作中的一些认识,简述南雄“红层”的分层也地质时代:

一、南雄盆地发育史

南雄盆地位于大庾岭山脉的南麓,是北东——南西走向的狭长盆地。西起曲江县的新小庄,东与信丰盆地相连,长约80公里,宽不超过18公里,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浈江水纵贯盆地中心向西流,南雄盆地处于粤赣穹褶带的中部。盆地中的红色地层在沉积过程中很明显地发生过三次构造运动:

1、燕山运动晚期。在粤北地区形成了许多北东——南西向的断裂凹陷,南雄盆地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早白垩世末期,盆地南北两侧的大庾岭和九连山脉剧烈地上升,在上升的同时,遭到强烈的侵蚀破坏,因此堆积了很厚的砂砾岩层,砾石的成分与周围的老地层相同,磨圆度不良,分选性差,层理不很清楚,很明显地是一种山麓相的堆积。此后,地壳运动趋于稳定,四周的花岗岩在湿热的气候条件下风化成红壤,为湖盆地“红层”的堆积创造了条件。以后,随着季节的变化,使盆地的沉积物也随之改变。在比较干旱时,湖盆地边缘地区的沉积物露出水面,形成龟裂等。

2、白垩纪末的地壳运动。使盆地的南北两侧轻微上升,而东、西两端上升较为剧烈。因此,湖盆地的范围显著地缩小,约为白垩纪时期湖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时,四周的花岗岩仍继续风化,并初搬运到湖盆地中,形成了古新世的厚层泥岩。由于湖水比较稳定,蒸发量较大,因此沉积了较多量的石膏和灰绿色鳞状钙质结核。

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

言语解教秦吉了(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大约似鸚鵡……善效人言语。”),波涛初过郁林州。

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

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

以上所述虽不全面,但应是唐代以昆仑俑或雕塑人墓的葬俗的一般历史背景。至于广东高州良德唐墓出土昆仑女人青铜头像的具体历史背景,这里也略述一下:

唐代高州高凉郡属岭南道,南海节度使领。良德位于广东南部,靠近南海交通线,自贞观二十三年至大历十一年(649年—776年)为高凉郡治所。南朝隋唐间,高凉郡是同南海诸国贸易交往和贩卖“生口”(即奴隶)的地区之一。史载岭南各部落“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新唐书》卷一六三·孔戣传。),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贸易。旧时州郡人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梁书》·王僧儒

传。)。南北朝隋唐墓出土昆仑俑,墓主多为皇族豪门。元邵是北魏孝文帝之孙、丞相清河文献王之子,封常山王。永泰公主是唐中宗的第七女。裴氏小娘子是裴均的孙女,裴均曾任将相十余年,累封郇国公。高州高凉郡良德,曾是冼夫人及其夫家冯氏的统治中心。冼夫人是高凉人,良德曾作高凉郡治所。冼夫人三世孙冯盎,累代为本郡大首领,唐武德间官至上柱国、高州总管、封吴国公,又改封越国公,统辖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即今广东西南部和海南岛,勋位烜赫,富甲一方,“奴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旧唐书》卷一九〇九)。其族人冯子游,贞观年间自高凉入观,竟至“载金一舸自随”。据此,高州良德唐墓中出土昆仑人形象雕塑物是很自然的。同墓出土还有菱形鸾凤纹铜镜、青瓷三注黛砚和铜簪等物,墓主可能是唐代高凉冼冯家族的一位女性成员。这种昆仑女人青铜头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已确认为一级历史文物。

(作者单位:湛江市博物馆)

●研究与争鸣●

随后,由于盆地南北两侧继续缓慢上升,使湖盆地逐渐缩小。同时雨量加多,使植物更加茂盛,因此使沉积物中含有有机质较高,在还原环境下,就形成了灰绿色泥岩和粉砂岩等。

3、在古新世末,较剧烈的地壳运动结束了古新世湖盆地的堆积。盆地南北两侧的上升,造成了湖口一带的倾斜构造。并且在盆地的西北缘发生或继承了北东—南西向的断裂构造,北盆的大庾岭继续上升,南盆则相对下降,为后来河水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构造条件。因此,在盆地的北部沉积了厚层的砂砾石,砾石大小相差悬殊,磨圆度差,并在局部地区见有交错层理,很显然这是一种洪积——河流相的沉积。这层厚层的砂砾岩不整合地沉积在古新世或晚白垩世的地层上面。

二、“红层”的划分

南雄盆地中出露厚达 4000 余米的“红色岩系”是由晚白垩纪——早第三纪不同沉积类型的地层组成的。盆地四周被前震旦纪变质岩系和中生代花岗岩所围绕。按其岩性特征、古生物组合,自上而下可划分为下列 3 个地层单元:

3、丹霞组

2、罗佛寨组

(2)上段

(2)下段

1、南雄群

(一)、南雄群

南雄群又分为园围组和平岭组,不整合于中生代花岗岩之上,是一套厚约 1300—2900 米的陆源碎屑岩系,其厚度由盆地南西向东北方向增大。盆地边缘岩层倾角较大,向中心逐渐变缓,一般 22—14。主要分布于主田、古市、黄坑、乌迳等地。

根据岩性变化和化石组合南雄群可分为三部分:①下部,主要由棕红色、紫红色砂砾岩、含砾砂岩,泥质砂岩夹泥岩组成,化石少,仅在个别地点近顶部层位中见到零星的破碎的蛋化石。②中部,为棕红色砂质泥岩与泥质砂岩互层,夹有灰绿色薄层砂岩,含龟,龟类蛋化石、鸭嘴龙类,鸟臀类蛋化石。③上部,由棕红色砂质泥岩,泥岩及泥质砂岩组成,常夹粗砂岩和砂砾岩,含有蜥蜴类、虚骨龙类、肉食龙类、蜥脚类牙齿、结节龙类、肉食龙类蛋化石、鸟臀类蛋化石及龟鳖类骨片。总的看来,南雄群下部沉积物粗,砾石分选、磨圆度差,表明其沉积距蚀源区不远;往上沉积物变细,有龟裂现象,有机碳(据蛋化石部分围岩分析不及 1%)及盐类含量较低;从化石保存情况看,蛋化石成窝或零星,恐龙肢骨及牙齿保存较差。这些反映了南雄群可能是处于比较温暖而有季节性干燥的气候下形成的,且由洪积逐渐向湖泊沉积过

渡。

(二)罗佛寨组

罗佛寨组又分为上湖组和浓山组,主要分布于修仁—长市以西一线,厚度计 800 余米,与下伏南雄呈现假整合接触,含有丰富的化石。其他层产状平缓,组成一个宽缓的倾斜构造。罗佛寨组依岩性、化石特征可分上、下两段:上段由灰绿色、浅紫色、紫色泥岩、砂岩及细砾岩组成,厚 200 余米,见于湖口、罗佛寨一带,倾角 5—8,含有原始哺乳动物化石及阶齿兽、贫齿兽、龟、鳄及鳄类粪化石等,下段:为褐红色、紫红色泥岩、砂质泥岩,夹砂砾岩,底部有一层厚 2—5 米的灰白色、灰红色砂砾岩。出露厚度达 600 余米,地层倾角一般 10—14。所产化石包括龟类、鳄类、食虫类(种属未定)、髀节类、纯脚类和腹足类等。

(三)丹霞组

丹霞组成带状分布于盆地北侧的狗石,叟里园和杨沥岩一带,主要由暗红色砂砾岩、砂岩、砂质泥岩组成。砂砾岩中的砾石成分复杂,有花岗岩、片岩、千枚岩、砂岩、石英等,分选不佳,大小混杂,最大者可达 0.5 米,多棱角一次棱角状,一般层理不清。出露厚度 100—550 米,且由北东向南西增大,岩层中断裂,扭曲等小构造发育。由于构造与岩性的控制,经长期风化而形成一种奇特的地貌现象——“丹霞地貌”。从丹霞组的岩性特点看来,代表一种山麓相的堆积。

三、地质时代

南雄群:时代为白垩纪晚期。为一套砂砾岩与砂质泥岩及泥质砂岩的沉积。在靠上部的泥岩中产生大量的恐龙蛋、小型恐龙及龟鳖类等化石。

罗佛寨组:时代为古新世。下部为一套紫红色泥岩,上部为灰绿和紫红等杂色泥岩。产有原始哺乳动物 *Amblypoda* 及大量的鳄类、龟鳖类等化石。

丹霞组:在这套地层中由于没有找到化石,所以不能肯定其时代,但从岩性及构造关系看来,其与罗佛寨组应划分两个不同时期,丹霞组可能为始新世晚期或渐新世早期。

1928 年,冯景兰等将南雄群底部之砂岩和复在南雄群下部的砂砾岩层与其上的泥岩层等并没有构造关系;而复在上面的砂砾岩层与其下面的罗佛寨组或南雄群有明显的整合存在,并且多半形成所谓的“丹霞地貌”。所以把南雄群下部的砂砾岩归到南雄群,而上复的砂砾岩称为丹霞组。在没有用化石有定其时代以前,亦称为丹霞组(?)。

南雄盆地的“地层”,包括白垩纪和老第三纪两个时代的沉积物。其中白垩纪时期正处于恐龙风靡于世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恐龙曾在这里生长繁殖,它们死后的遗骸

东兴石器与西樵山石器的比较

蔡奕芝

东兴县原属广东,今归广西。东兴遗址 50 年代末出土了一批石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到这批材料,我不禁想起同是出土大量石器的西樵山遗址。对石器的兴趣促使我对这两处遗址的材料作些比较,试图探讨其石器种类以及所反映的经济类型和相对年代的异同问题。

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是 1959 年春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的,计有石角村的亚善山、马兰基村的马兰嘴山、大围基村的杯较山三处遗址。遗址遗存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蚌器和夹砂陶片。本文以马三嘴山地点的石器为主要材料,整理后以与西樵山遗址石器进行对比。

东兴石器,以打制为主,形体较为粗大、厚重。从器型及用途上看,可分为“螻蛄啄”、砍斫器、尖状器,手斧状石器、两用石器,石网坠等数种。现简述如下:

“螻蛄啄”这是根据其形状近似采螻工具而命名的,其显著特征是顶端较尖,并稍为偏向一边。略呈钩状。据器形和加工方法,可分为五式。

I 式,由砾石尖端的一侧边缘两面加工,另一侧边

缘一面加工而成,标本为 10080,长 14.4 宽 5.3cm。

II 式,砾石的一侧边缘两面加工,另一侧边缘不加工。标本为 0069,长 9.2,宽 4.4cm。

III 式,由砾石尖端的两侧边缘两面加工而成,加工部分基本对称。标本为 0081,长 10.4 宽 6cm。

IV 正式,锥形状,两侧边缘多不加工。标本为 0087,一侧稍有加工,长 10,宽 4.5cm。

V 式,核形,两侧边缘的加工大都遍及整件石器。将本丙 0068,长 8.9,宽 6cm。

刮削器,在较为扁平的砾石边缘加工形成刮削器。从形体看,可分三类:

I 式,圆盘状刮削器。标本丙 0110,周边两面加工,直径 9cm。

II 式,二边刃刮削器。其中一种是一边二面加工,邻近一边采用单面加工而成,标本 0094,长 11,宽 6cm。另一种为二边均为二面加工而成。

III 式,单边刃刮削器,只在一边用二面加工的方法制成,标本丙 0078,长 10.6,宽 4.6cm。

被水冲进南雄湖泊中,埋在湖底历经沧桑,年复一年,变成了今天我们要找的化石,它们对研究脊椎动物的进化、爬行动物的兴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从 1962 年以来,在南雄盆地中发现的恐龙蛋化石 30 多个蛋窝,计有 1000 枚以上的比较完整的蛋化石将近 2 万片碎蛋壳,并且首次在盆地中发现两种恐龙脚印化石,已采集的恐龙蛋化石至少有 14 个类群,约占全世界已知类群的 1/3,而且其原始状态保存非常完美。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近几年新发现的恐龙蛋中,约有 1/6 的蛋化石含有胚胎,这种情况实为世界罕见,这说明南雄晚白垩纪地层中的恐龙蛋化石极为丰富。这对研究恐龙的生殖,详细的划分地层是极好的实物材料。同时,也为研究白垩纪晚期,恐龙突然灭绝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物质资料。

南雄盆地的老第三纪“红层”指的是距今 6500—5500 万年前的古新世和在 3000 万年前的始新世和渐新世地层,其中古新世地层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正是世界各大陆板块剧烈活动,大幅度漂移的时期。因此,必定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中留下许许多多地壳运动的历史证据。此时期也正是高等的哺乳动物刚刚开始大发展的时期,为什么一个兴旺的恐龙世界突然崩贵,而另一个繁盛的哺乳动物世界又

突然出现在地球上呢? 这一问题研究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这一时期地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就显得极为珍贵和重要了。然而世界上存在这一时期的地层,尤其是古新纪早期(6500 万年左右)的地层却是屈指可数。现在古新世地层(罗佛寨组地层)已采集和鉴定的约有 35 个种的古新世哺乳类化石,还有很多是目前无法鉴定的新种,可以说世界上除北美西部以外,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第三纪哺乳动物群的代表,也是亚洲最具代表性的古新世动物群就是在南雄发现的。

到目前为止,南雄“红层”中发现的化石已有 100 多种,其中无脊椎动物化石上百种,包括鳃类,腹足类,介形虫类和轮藻等不同的生物。另外,还有许多脊椎动物。初步统计已超过 50 种,包括哺乳动物中的阶齿兽、贫齿兽爬行动物中的恐龙、蜥蜴类、鳄类、龟鳖类等。

南雄“红层”分布广,厚度大,它不仅限于南雄盆地,而且延续到江西和其它地区。这对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标准层位之一,如今南雄的“罗佛寨组”、“上湖组”、“浓山组”、“大塘组”、“南雄群”已作为地质名词在世界上被正式采用。

(作者单位:南雄市博物馆)

●研究与争鸣●

尖状器、砍斫器，打击方法简单，形状不固定，从其器形和制法上，分别把它们分为二式、三式。

I 式尖状器，一边缘双面加工至顶端，另一边由平整断裂面及自然石料边缘形成，标本丙 0111，长 9.5，宽 5cm。

II 式尖状器，由相邻二边双面加工至顶而形成。标本丙 0077，长 9.8、宽 5.2cm。

I 式砍斫器，标本丙 0103，长 9.7、宽 7.4cm、厚刃，单边二面加工。

II 式砍斫器，边刃，二面加工。标本丙 0.76，长 10.1，宽 7.1cm。

III 式砍斫器，周边二面加工，标本丙 0088，长 9.7，宽 5.3cm。

手斧状石器，由蛋圆形砾石周边的全部或大部两加工，周边较薄，中部隆起。边缘及尖端有使用痕迹，说明此类石器既用于砍斫，也可用于挖掘植物根茎，起砍斫及尖状器的作用。

两用石器，用椭圆形砾石用作石锤，二面中央有凹痕，这是被敲砸时而留下的。这种石器既用于敲砸又用作石砧。将本丙 0126，长 13，宽 6.8。

石网坠，长方形，分二式

I 式，两侧边缘中央有一对凹缺，标本丙 0124，长 9.5，宽 4.2cm。

II 式，两侧边缘二寸凹缺，DM024，长 13.5、厚 3.5cm。

磨制石器

磨制石器数量不多，器形比打制石器小得多，多数是农业生产工具或加工工具，如斧、磷凿，磨盘、杵、石饼和砺石等。石料大都是燧石，也有细砂岩和板岩，取材于附近海床。

石斧，扁长方形，多圆腹圆刃，分长身、短身二种，有肩的较少。标本 DY09 长 8.9，宽 6.3cm 厚 2.6cm 标本 DYG04，长 7.3，宽 6.8，厚 1.5cm。

磨盘与磨杵；砂岩制成，磨盘光滑，微内凹，磨杵两端呈圆形。这种一种舂磨谷壳的农业加工工具。标本 DYG022 磨盘成长 21cm，标本 DY23，磨杵长 18.2cm。

两樵山遗址发现于 1958 年，几十年来，陆续发现石器地点计 20 余处，环山分布。现以 4 号地点为例，分类整理之。

西樵山细石器的原料主要是浅灰色和黑色的燧石，半透明的玛瑙，极少数是霏细岩。从所得资料，可把它们分为石核、石核石器、石片、石片石器几大类。

石核是石片赖以剥落的母体，从石核上可见清楚的石片剥落后留下的疤痕。石片疤多为细长条形。西樵山

石核种类较多，有楔状，锥状，柱状石核，还有带把石核，多台面石核、漏斗状石核。

楔状石核，由台面的一端或相对的两端剥片，核体作扁平状。分三式：

窄身楔状石核，标本 401，台面经过剥片，留有疤痕，由台面向顶端剥片，使核体成楔状。高 3.9，长 3.3，宽 1.9cm。

三角形楔状石核，台面呈三角形，剥片集中于一侧，石核体形成四个三角形。标本 407，台面三角形，不平整，集中于一侧剥片，在顶端形成尖，四面均为三角形。高 2.9，长 2.8，宽 1.5cm。

宽身楔状石核，核体呈扁平三角形，形体较大，锐底呈船底形。标本 444，台面平滑，其中一端有小凹，使整个台面不平整，两侧剥片底呈船底状，高 3.3、长 5，宽 3cm。

柱状石核，核体两端几乎等大，根据形状分为全柱状和扁柱状二种。标本 411，全柱状石核，台面近圆形，底部平面倾斜，核体剥片集中于一侧。标本 417，扁平柱状石核，由台面垂直剥片，石片痕清楚，高 3.7cm。

锥状石核，由台面剥片往中央收起。使顶端形成一尖状，标本 423，锥状核体基本完整，周身剥片，台面倾斜，高 3.9cm。

带把石核，以陡身一侧的侧缘作为工作面按锥状或楔状石核方式剥片，相对一侧则不加修理，使其保留原状，形如把手，用于把握。标本 427，核体扁平，台面光滑，一侧剥落石片，留下两条清楚的石片疤。高 3cm。

多台面石核，几个台面垂直剥片，核体上留下不同走向的疤痕，标本 430。

石核石器，一部分石核在剥下石片后，又被加工成可以使用的生产工具，形成石核石器。西樵山石核石器原料采用燧石、砂岩和石英岩，制法上主要采用石锤敲砸而成。这类石器发现较少，器形简单，如石核刮削器，标本 432，在扁柱状石核的顶端进行第二步加工，由核体正面向背面敲打，形成二个石片疤，长 3.7，宽 2cm。凿形器，锥状石核尖端经过第二步加工而形成，尖端上可见细小的修理疤痕。高 24cm，标本 433。

石锤，形体粗大厚重，有利于打击石器时留下的疤痕。标本 435，核体一棱上，粗糙不平，这就是用之打击石器时留下的疤痕。

石片，即从石核上剥落下来的碎片，一般较薄，背面有脊痕。其中一类细小石片，两侧薄锐，少数的边缘还经第二步加工，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石叶。根据背脊多少的不同，又可分为人字脊、单肖，双肖石片，还有一类石片是更新工作面时剥落的。与前面三类石片相比，后一类石片显得粗厚，原来的工作面留在石片上，剥片疤痕

很清楚。石片石器,石片经第二步加工,形成石片石器,以刮削器为多,其次为尖状器,还有雕刻器,琢背小刀,石铲几类。这几类石器较为少见。

标本 437,圆盘状刮削器,在丰圆盘石片上,加工其周缘,由背面向劈裂面打片或相反,两面加工,台面平整,半锥体可见。还有单边刃刮削器,标本 439;双边刃刮削器,标本 438。

石钻,标本 442,扇形石片,尖端剥片清楚,另一端呈半圆形,且较薄。

尖状器,两边加工长形石片至顶端。

雕刻器,石片细小,近似圆形,尖端右侧进行加工,然后在左侧打去一小石片成屋脊状。

比较西樵山石器与东兴石器,我们可以看到:1、二处遗址均以打制石器为多,根据统计,西樵山打制石器占总数的 93%,东兴贝丘遗址的生产工具打制石器占全部石器的 77.5%。打制石器的种类,则二处遗址有所不同。首先,西樵山遗址中,石核石器较小,石料多是硅质岩,不见砾石石器,而东兴打制石器则全是石核石器,原料主要是扁椭圆形的河砾石,因而在形体上,二处石器的差别一目了然,前者较为细小,后者较粗大厚重。其次,西樵山石器中,石片石器占绝对优势,而东兴石器中却少见或几乎不见石片石器。以打制制作技术上看,西樵山石器多进行第二步加工,有的还制作得相当精细,而东兴石器则不见第二步加工的痕迹,因而显得更为粗糙简单。

2、磨制石器,二处相似,皆为量少,西樵山磨制石器有石斧、石刀等,并出现双肩特点,东兴磨制石器一般比打制石器小,它除与西樵山石器一样出现双肩特点外,还出现穿孔石器。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亦有各自的特征。

3、从二处遗址的出土物看它们所反映的经济生活,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即以渔猎经济为主,兼营原始的锄耕农业。西樵山石器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另有“锄耕农业”,大量石片石器以及各式石斧、石刀的存在,便是证明。细石器随着复合工具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其用途之一是用于镶嵌骨、木工具,西樵山众多的截去一端或两端的齐薄小石片正是作为此用的。另外,还可“把石器嵌入箭杆的裂缝中做成箭进行渔猎”,细石器的这种用途,往往与早期的渔猎经济相联示。从地理环境看,“西樵山及其周围数千年前还是一个河涌纵横,岛丘散布、林木茂盛,沼泽遍布”的地方,这环境适合于渔猎经济类型。同时,西樵山周围一片宽阔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又为农业经济的进行与发展提供了可能。东兴遗址中,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以采、捕鱼和狩猎为主,并兼营农业,这从出土的器物和大量的贝壳、钱私

动物骨骼中可以推知。东兴遗址中发现的典型石器“螻蛄”,用于采螻;石球,可用作狩猎的投索球;石网坠,用于捕鱼坠网。磨制石器虽然不多,但大都是农业生产或加工工具,如斧、磷、凿、磨盘、杵、砺石等。这些遗物表明当时人们从事着渔猎和原始农耕劳作。

4、年代的比较,西樵山文化遗址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其文化遗存包含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不同时期的遗存,甚至延续到青铜时代。4号地点等细石器遗存属早期,其石器的某些器型,打制方法,可从旧石器遗址中找到先例,如修理台面技术和船底形圆头刮削器等,在华南旧石器时代遗存(云南宜良)中就有例子。中晚期以有肩石器遗存为代表,这类遗存常伴出磨光石器,夹砂绳纹陶,甚至几何印纹陶。与此相比,东兴遗址年代上限似乎要稍晚,因为东兴遗址的磨制石器有了穿孔技术;石磨盘,石杵的出现,说明农业较为发达;石网坠的使用,表明捕捞技术也有一定水平。由此可见东兴遗址的经济生活水平比西樵山细石器遗址的要高,其反映的年代上限应稍后,它们同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代表着不同阶段的特征。按贾兰坡先生排列的顺序,过去广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翁源青塘类型(2)南海西樵山类型,(3)东兴贝丘类型。

参考:(1)广东博物馆《广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12期。

(2)同上。

(2)同上。

(4)彭适凡《浅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年12期。

(5)曾骥《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

(6)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1期。

(7)黄慰文《广东南海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考古》1979年4期。

浅论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战略

张建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们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发展区域博物馆事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就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现状,优势和战略,谈谈自己的肤浅之见,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广东经济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成果喜人。目前,珠江三角洲博物馆总数已达30余座,博物馆的布局日趋合理,门类体系逐步形成。纵观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速度快。自1979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新增博物馆十余座;改造重建了广东省博物馆、鸦片战争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洪秀全纪念馆;现正在筹建广东华侨博物馆、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博物馆、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番禺市博物馆、广州荔湾区博物馆、深圳天后博物馆;即将迁徙或改造珠海市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

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不仅数量增长多,而且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以鸦片战争博物馆的发展为例。与十年前相比,鸦片战争博物馆现在管辖的面积已达50余万平方米,扩大了17倍;工作人员230人,增加了15倍;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扩大了近6倍;陈列展览面积2400平方米,增加了6倍;观众每年70—80万,增长了4—5倍;文物藏品数量增加8倍;经济状况也大为改观,原来经费短缺,连发工资都困难,现在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二)改革力度大。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开拓进取,锐意改革,提出了许多新思维、新观念,走出了一条文物事业发展的新路子。

在馆藏品的收藏方面,不再局限于历史的遗物,将充满时代气息,反映现代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代

表性实物收藏入馆。在管理方面,率先在全国引进企业管理模式,推行岗位目标责任制,制订严格的考核制度;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运用物质激励手段,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中层以下干部实行聘任制,实行三工(国家工、合同工、临时工)并存。在经费方面,不是等、靠、要,还是立足于创收,自筹为主。首开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多业助文之先河的佛山市博物馆。早在1988年,佛山市博物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到香港承造海洋公园400多万港元的集古村工程。现在,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在弘扬主旋律的基础上大胆创收,努力增强博物馆的造血功能,促使博物馆副业良性循环。

(三)创业成效高。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珠江三角洲博物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正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涌现出一批优秀和颇具特色的博物馆。如鸦片战争博物馆不仅建筑造型独特、陈列形式新颖,而且宣传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荣膺首批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文博事业蒸蒸日上,游客如鲫,被国家文物局评为94年度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广州博物馆在全国较早实现自收自支,荣获94年度全国优秀地县级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的年观众量多次居广东省首位,经营创收搞得如火如荼;深圳博物馆因地制宜,确定了“综合性、多功能、开放型”的办馆方针,走“博”与“活”之路;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建筑荣获国际建筑设计金奖,文物展品精美绝伦;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建筑群集岭南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是广州市的重要旅游参观点。

但是,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在前进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如不很好地解决,将严重制约着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

(一)多种博物馆观众数量下降。最近,笔者对珠江三角洲部分博物馆的观众作了粗略的了解和统计。如下图示:

珠江三角洲部分博物馆观众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次)

博物馆名称	94	95
广东博物馆	近 100(94 年 9 月开馆)	
广州博物馆	48	34
农讲所纪念馆	12	8.7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16 - 18	16 - 18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14	16
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12	11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25	20
花县洪秀全纪念馆	8	5
佛山市博物馆	88.4	71.7
南海市博物馆	12	16
顺德博物馆	17	12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63	56
中山市博物馆	25	22
鸦片战争博物馆	70	80
东莞市博物馆	5.8	18
深圳博物馆	10	13

从上面 17 所博物馆的观众情况来看,大多数呈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文博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因为观众是博物馆的生命,是博物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失去观众,博物馆就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前进发展的基本动力。

仔细考察珠江三角洲多数博物馆观众呈下降趋势的原因,综合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1)日益增多的旅游景点、人造景观和娱乐设施分流了原属于博物馆的观众。近几年来,珠江三角洲掀起了修造人造景观和旅游景点的热潮,如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广州的“世界大观”、“华夏奇观”和“华夏春秋公园”,番禺的“飞龙梦幻城”,中山的“科幻城”以及其它许多渡假村。这些人造景观和旅游景点,不仅把短线的港、澳、台游客拉过去,而且把相当部分国内观众也拉过去了。(2)博物馆自身宣传不力,处于等客上门的境地。一个不努力向社会宣传自己、推销自己的博物馆是很难获取社会对其价值的认同,也就很难激发观众的参观兴趣。如果等客上门,不主动到社会组织观众,营造观

众市场,就会使观众逐渐流失到其它地方。(3)陈列单一,手法落后,没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感染力较强的陈列展览推出,没有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提供给观众,使博物馆失去吸引力。(4)部分博物馆受周围环境限制,影响观众参观。如广州博物馆地处越秀公园内,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在军营内,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因广州地铁兴建而暂时封路,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没有停车场等等。

(二)文物受到破坏严重。文物是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优秀的文化遗物,是某一时代人类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无言史书,不能再生,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保护和利用好文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特殊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热、开路建桥、经济开发区和旧城改造的兴起,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人们可以发现、发掘大量有价值的文物,也可以造成文物“建设性的毁坏”。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部门和个人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眼前和局部利益,片面强调基本建设的重要地位,置《文物保护法》于不顾,在许多工程开始之前,既不作考古调查,又不履行报批手续,甚至在文物部门出面干涉的情况下,仍强行施工,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毁坏文物的事件屡有发生。特别令人关注和忧虑的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文物——虎门靖远炮台也不能幸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一处真文物,修造一个假古董的现象,这不仅严重地违反了《文物保护法》,而且是对我国文化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文博专业队伍青黄不接。珠江三角洲博物馆虽然有一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敬业乐业、无私奉献的文博工作者战斗在第一线,但是,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文博队伍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博物馆是文化事业单位,典型的清水衙门。面对外部精彩世界的诱惑,博物馆人员不安菲薄待遇,有的跃入商海弄潮,有的出国圆梦,有的到馆外“炒更”,有的借博物馆为跳板,一有机会就另谋高就。当然,博物馆的正常流动是允许的,但速度不能过快,规模不能过大。广州某博物馆在短短二、三年内,宣教部的讲解员大部分变换,这既不利于高素质宣教队伍的建立,也不利于宣教活动的开展,极大地影响了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实现。

博物馆人员的不稳定又直接导致专业队伍的青黄不接,出现了中青年高级专业人员的断层。目前,在珠江三角洲,不论是省级博物馆,还是市县级博物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匮乏问题,成为博物馆事业向高水平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优势

●研究与争鸣●

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的精心经营,已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出现不少困难和阵痛。不过,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因为该地区仍具有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潜力和优势。

第一、文物古迹多、品位高、现实教育意义大。

广东省有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珠江三角洲占 12 处。它们是:林则徐销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三元里平英团旧址、洪秀全故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孙中山故居、黄埔军校旧址、国民党“一大”旧址、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中山纪念碑、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东征烈士墓、中共广东区委旧址、中共“三大”会址、白云楼鲁迅故居、三灶岛“万人坟”遗址、象岗南越王墓、东汉造船遗址、佛山祖庙、南海神庙及西樵山等一大批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物古迹,特别是国家级和省级文级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艺术价值、教育价值和旅游开发利用价值,是高品位的文物古迹。

在如此众多的文物中、近、现代革命文物史迹占绝大部分,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它是珠江三角洲文物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以林则徐销烟池和虎门炮台旧址为例。林则徐销烟池和虎门炮台旧址,记录了一百多年前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的辉煌业绩和广东军民的抗英壮举。虎门销烟,伸张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奏响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气歌,是扬国威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世界禁毒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关天培、陈连升率领的广东军民在虎门炮台与英军浴身奋战,壮烈牺牲,以生命和鲜血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篇章。这些文物史料、文物遗存都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是弘扬民族精神、宣传爱国主义不可多得的好现场、好课堂。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视察鸦片战争博物馆后,就写下了:“希望青年人都到这里来上一堂必不可少的爱国课”。

第二,观众市场前景看好。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扩大,人们不仅具备参观博物馆的经济能力,而且参观博物馆的欲望也不断增强,境外游客不断增多。这些都给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带来巨大的观念市场。珠江三角洲博物馆的观众市场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当地民众。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人口 1000 多万。这些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是博物馆的基本观念。每年四、五、十、十一几个月,珠江三角洲博物馆都要接待大批由学校组织前来参观的大中小學生。

——外来民工。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来民工已达几百万,其中东莞 130 余万,深圳宝安 90 万、珠海 30 万、佛山 125 万、中山 37 万。这些外来民工 80% 是青年人。青年人在紧张工作之余,特别喜好三五成群地游览名胜古迹。他们应是博物馆争取的观众。事实上,外来员工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部分博物馆的基本观众。近两年来,到鸦片战争博物馆参观的外来民工约占总观众人数的三分之一。

——港、澳、台同胞和外国游客。在珠江三角洲,港、澳、台同胞随处可见,外国客人也不少。据统计,“八五”期间,广东接待入境旅游人数达 1.6 亿人次,城市国际旅游人数 3109 万人次。随着港、澳主权回归祖国的日益临近,港、澳民众将成为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巨大的潜在的观众。

——国内其它观众。除上述观念外,还有外地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差、考察、学习的工作人员及旅游爱好者。他们同样是珠江三角洲博物馆观众市场的组成部分。不过,他们零散、不集中、不定时。

第三,地区经济发达。

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省,而且是全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八五”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平均每年以超出 20% 的速度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万元。如佛山市,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 518 亿元,人均 1.6 万元,全市职工人均工资 9056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近 4000 元,全市人均储蓄余额近 15000 元。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动博物馆事业的同步发展,这已经被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史证明。因为博物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各级政府都比较关注博物馆的建设,对博物馆的投入逐渐增大。广东省投资逾百万元的博物馆有 13 所,珠江三角洲占了 12 所。其中华侨博物馆、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博物馆和珠海市新博物馆,投资预算都在 1000 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过亿元。

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使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不断增长,而且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注重生活质量,追求更为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于是,旅游成为人产生活的时尚。作为旅游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博物馆理所当然地是人们旅游的选择目标之一,这无疑会促进博物馆事业的繁荣。

三、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战略

纵观珠江三角洲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现状和优势,我们对它的前途充满信心。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的挑战,更好更大地发挥博物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应采取如下战略:

——名牌战略。

人们参观博物馆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是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欣赏艺术、陶冶情性和娱悦身心的精神享受。这就要求博物馆给观众提供颇具特色的高质量的名牌精神消费品。只要树立人无我有的拳头名牌精神产品,博物馆才能对观众产生巨大的无形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实际上是博物馆的宝贵财富,是一笔可观的无形资产。目前,参观人数较多的博物馆都很注重抓名牌精神产品。如鸦片战争博物馆善于利用林则徐销烟池和虎门炮台旧址这一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大作禁毒和抗英文章,推出生动、形象、富于感染力的“水平一流”的基本陈列;同时,充分利用场地,将虎门销烟与鸦片战争史料形象化,使之成为直观性的构筑物,对观众产生巨大吸引力,以致许多观众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该馆的参观人数每年都能维持在70—80万之间。

当然,要实施名牌战略,必须做到三点。

一是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增加经费投入。广东省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都重视和关心博物馆事业,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财力。但是,与一些兄弟省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如已经建成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耗资1.4亿元,上海市博物馆耗资4亿多元,河南省博物馆投资2亿多元。

二是开展市场调研,拿出高质量的陈列展览。博物馆的精神产品需要观众去参观、消费、接受。任何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都要以观众为中心,展开调查研究,根据时代特性和观众的客观实际需要去推出。如果一味地凭主观推测,要求观众被动地服从陈列,其结果适得其反。陈列展览,不仅不能被观众接受,反而会使观众失去参观博物馆的兴趣。

三是大力宣传、推销博物馆的精神产品。受传统观众影响,许多人把博物馆当作古董收集场,而博物馆也不敢大胆地宣传自己、推销自己,以致观众稀少,门可罗雀。殊不知,宣传是博物馆提高知名度,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之一。博物馆理应象企业那样大力宣传、推销自己的精神产品,使社会真正认识到博物馆的价值。

——人才战略。

博物馆是人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博物馆的一切活动(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等)都必须通过人来实现。人是博物馆的主体。离开了人,博物馆将空具外壳。人是第一位的,而博物馆的人才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建立高素质的文博队伍,博物馆才能抢占市场经济的制高点,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队伍老化,后继乏人,将严重影响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因此,建立一支

思想品德好、业务精、作风硬的文博队伍是博物馆的当务之急。

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已经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逐步着手提高文博队伍的整体素质,努力培养一批距世纪的优秀人才。不过,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人才结构的合理性。博物馆对人才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不仅需要文物考古、陈列保管、科学研究、安全保卫的专家,而且需要宣传教育、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的行家里手,更需要通晓业务、精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而博物馆每方面的人才需要又分不同的层次,从年龄结构上讲,有老、中、青;从职称层次来看,有高、中、初三级。当然,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人才培养的计划、目标和重点。

(二)人才培养的多渠道。重引进、轻培养是珠江三角洲许多博物馆的“通病”,他们对引进的人才缺乏培养、提高的手段。事实上,人才培养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其中岗位培训不失为培养、造就人才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岗位培养,可分馆内岗位培训、馆外岗位培训。馆内岗位培训,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传、帮、带作用,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专业基本功。馆外岗位培训,可以利用高等院校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基地,实施学用结合、馆校结合,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还可选派优秀中青年专业人员到国外进修,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培养高精人才。

(三)人才培养的机制,良好的运行机制,是人才脱颖而出的有力推动剂。博物馆在培养人才的时候,不仅要引进竞争机制,而且要实施物质激励机制,对真正人才在职称评定、房子分配、科研经费、升资晋级及奖金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到实处,鼓励人们成才、成名。

——市场战略。

市场经济大潮将博物馆推向了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物馆必须面向市场、进入市场、开拓市场,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消费心理,提供优秀精神产品,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光顾,努力营造良好的博物馆市场。否则,博物馆就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落伍于时代,被社会淘汰,被观众抛弃。因此,实施市场战略,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要,是博物馆立稳脚根、破浪前进的重要措施之一。

博物馆市场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在:

(一)观众市场。珠江三角洲博物馆有着巨大的诱人的观众市场,但不等于参观珠江三角洲博物馆的观众就很多。关键在,博物馆的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是否能吸引观众。这就要求博物馆开发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提供

●研究与争鸣●

优质服务,让观众乘兴而来,满意而去。

(二)旅游市场。在珠江三角洲,旅游意识已逐渐深入人心,关心旅游、参与旅游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博物馆是旅游的重要资源,在文化旅游中占有当仁不让的重要地位。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可以利用自身的文物优势,根据旅游市场的需求,与旅游部门联合推出各种有特色的旅游活动:文物古迹游、宗教文化游、近代史迹游、现代史迹游、东纵足迹游、名人故居游等等,吸引中外游客参与,为博物馆事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文物市场。珠江三角洲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升值潜力大的文物上,文物收藏逐渐热起来。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应当抓住机遇,利用国家批准设立的文物商店,积极参与文物市场的经营活动。这样,既可增加经济收入,增强自身活力,又可普及文物知识和文物保护意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还可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不过,必须严格管理,以确保文物市场的健康发展。

——产业战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受“文不经商、士不理财”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博物馆仅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当做一个靠财政养活的消费单位,而忽视了它的财富生产和价值创造功能,甚至对博物馆开展的少许经营活动亦颇多微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开始将博物馆当作一种文化产业来看待。因为博物馆创造的是特殊的精神产品,与一般商品一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仍需要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才能为人民所接受。而博物馆的收藏保管、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都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做后盾,博物馆的一切营运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实施文化产业战略,才能为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才能推动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收取门票,是博物馆实施文化产业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人们参观博物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消费。博物馆提供给观众的陈列展览也恰恰是人们所需要的精神消费品。在这里,人们通过购票参观来承认博物馆精神产品的艺术观赏价值,来购买博物馆陈列展览的观赏权。博物馆通过出售这种观赏权,来获取一定的补偿。不过,在市场经济还没有成熟之前,博物馆提供的这种特殊商品总存在价值与使用价值不统一的现象即门票价格太低。

多业助文,是博物馆实施产业战略的又一途径。“为观众服务”是博物馆的根本宗旨。人们到博物馆,不仅仅是参观,还有吃、住、娱、购等方面的需要。博物馆应加强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尽量满足观众的需求。珠江三角洲

博物馆在多业助文方面,开展得颇有成效。但是,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经营模式的小规模、经营手法落后陈旧、经销的商品的单一。今后,珠江三角洲博物馆的文化经营活动应当从小规模、单打一的经营模式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从馆内经营向馆外文化产业实体发展,从服务观众向满足社会需要发展。

——群体战略。

目前,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大多各自为政,各显神通,馆际间的协作和交流不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的群体作用和群体效益的发挥;实际上,珠江三角洲的博物馆各有特色,各有局限。如果能够优势互补,加强横向联系,不仅可以为博物馆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而且可以极大地利用文物资源,形成振兴博物馆事业的巨大合力。

根据互惠互利互补,自由参与的原则,珠江三角洲博物馆可以开展三个方面合作。

(一)业务合作。在陈列展览、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物复制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加强馆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进行文物调剂、合办展览、互换展览,相互宣传,互相促进和提高业务水平。

(二)产业合作。利用博物馆的文物技术、专业人才和文物资源优势,联合成立文物开发总公司,经营文物复制、文物建筑维修、文物咨询鉴定等。成立旅游产品开发总公司,设计生产颇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设立旅游产品和文物复制品市场。

(三)旅游合作。争取成立文物旅行社,开辟文物旅游专线,联手开拓旅游市场,实行点(博物馆)、线(若干博物馆连成一线)、面(有代表性的文物史迹区)结合,以广州为中心,形成四条文物旅游专线、九个文物旅游区。四线是:广州——增城——东莞——深圳;广州——花县——从化;广州——佛山(南海、顺德)——中山——珠海;广州——珠江沿岸——虎门炮台。九区分别是:越秀山象岗史迹区、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区、广州北郊近代史迹区、广州中山路史迹区、南海神庙海上丝绸之路区、珠江口虎门炮台旧址区、翠亨村辛亥革命元老故居区、南海西樵山古文化区、佛山祖庙民俗旅游区。

(作者单位:东莞市鸦片战争博物馆)

肖湄燕

如何充分开发和利用资料室所汇聚的各种信息资源,在博物馆建设中起到辅助和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博物馆资料室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和必须经常研究的课题。

一、特点和定位

博物馆资料与一般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工作程序和管理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要求:它属博物馆内设的图书资料室,所以藏书量少,但专业性突出,就其专业性藏书量而言,要比一般公共中小型图书馆多而全,且质量高;面对的读者主要是馆内工作人员,读者数量少,但又以专业人士为主,层次高;对读者工作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不仅应有横向的专业基础知识方面的信息服务,也要有纵深的最新的专业知识信息服务,又要有交叉的、跨学科的知识信息服务。然而,我馆资料室人员却不是历史、图书或文博专业毕业的,有些还无大学本科学历。

另外与公共图书馆相比,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的功能的针对性更强,其一是为博物馆的收藏、展览和科研三大任务服务。对于新建的我馆而言,资料室的创建和发展,要紧紧跟上飞速发展的其它各部门基础建设的步伐。其二是为特区博物馆办出特色服务。我馆是深圳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不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又是“窗口”,要宣传和宏扬民族文化;还要为本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举办好反映深圳两个文明建设成就的《今日深圳》展。所以除基本陈列的修改任务外,每年还要举办几十个临时陈列。资料室的工作必须与之相适应,甚至经常为筹展而投入一线工作。其三要为培养和造就一支优秀的博物馆专业队伍服务,要为本馆人材培养作出应有贡献。

由此可见,服务应放在我们工作的首位。服务是通过本室的读者工作来实现的,文献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储存等工作,最终是为了传递给读者,要保质、保量、快速地传递信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各种需要,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图书资料室的社会性、学术性和教育性、体现出我们的间接价值。因此,面对繁重工作任务,更应摆正位置,加强使命感、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以用为主”的方针不能变。“读者至上”的原则不能变。

二、基础建设是做好读者工作的前提

为做好读者工作,必须先做好资料室的基础建设工作。基础建设可分为软件和硬件两部分。前者指工作人员的素质,后者是信息储存的数量、形式和结构,而前者是关键。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可我们的现状往往是先揽了“瓷器活”,再去找“金刚钻”。在某些主、客观因素的驱使下,走上了博物馆资料室的工作岗位,面对的却是大多具有较高层次的专业人士,要做好这些读者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单靠满腔的工作热情是绝

对不行的,全资料室工作人员还必须修炼好“内功”。以适应博物馆资料室工作的需要。

博物馆的资料室牵涉到的主要专业为历史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需修炼的“内功”约可分为四个层面;首先要掌握古今中外历史及考古通论、博物馆学中的一般知识。如果缺乏一般的专业基础知识,不仅是一问三不知,而且在信息源面前无从选择,即不存在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

其次,要熟悉各种重要的工具书及其检索方法。如有关古籍的“经”“史”“子”“集”四部和丛书类工具书有600余种。其中较重要和经常使用的约80余种。以“经”部中的“小学”为例,可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类,其重要者近20种。若不熟悉,不但不能对专业人士的研究提供较好的检查服务和对初学者的学习进行指导,就连购置何种工具书都无从下手。

再者,要对主要专业相关的学科有大致的了解。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的深入研究,都必须借鉴与之相关的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与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相关的学科,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民族民俗学、宗教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文物鉴定学、美学、科技发展史等等,还要注意和了解其中与主要专业联系特别紧的一些侧重点,唯有如此,方可明确采掘目标。

又者,为使读者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应该注意和了解本单位主要专业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某些特色,或有突出成就的那些部分。如我馆在经济特区发展史研究、深圳地方史研究、民族民俗研究、本省本市考古发掘和研究,美术创作等方面都较突出,在购书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保证重点,把钱用在刀刃上,又可使藏书具备某些特色,同时也为信息的深加工前期准备。

在公共图书馆内要求具备上述的既有基础的、又有横向的、纵深和交叉的知识,也许只是对高级馆员而言,然而在博物馆资料中,则应视为工作人员做好读者工作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是一件有一定难度的事。我们一方面要提倡那种学无止境的勤奋精神,坚持不断地自学,掌握基础知识,同时吸取新的知识。另一方面还让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图书馆专业的大专学习,并在高级专业人士指使下进行实践,逐渐积累提高。通过学习和实践,

●研究与争鸣●

推动资料室的建设发展,迅速扩充信息量,藏书结构逐渐趋向合理。

譬如,我馆资料室是八十年代初随着本馆的筹建,在零的起点上新创建的,最初只购进一般历史学方面的专业书和工具书,尔后就陆续购进了大部头的如《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丛书以及《世界美术全集》、《世界博物馆》、《中国美术全集》……等中外大型专业图书,还有各种重要的工具书。为了扩大信息量,又订阅了国家级和具有代表性的省级文物博物馆专业性刊物,其中重要者如《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杂志以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博物馆研究》等等,并千方百计地从创刊号开始予以补齐。更扩展到港台书籍、杂志,还大量订购上述的与主要专业相关的其它各学科的书籍。考虑到电气设备维修和计算机应用、维修的需要,购置和订阅了有关强电、弱电和计算机方面的技术书刊。我们还一直比较注重剪报工作,分类归存,并订阅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全国报刊复印资料》中的有关部分,随时介绍和提供给读者。

我们较早就意识到,信息的储存仅以纸张的方式已不能满足需要。针对我馆为综合性博物馆的性质。馆内的陈列除地方性史志展览外,每年需引进许多全国各地的历史、文物、革命传统教育、艺术、自然等方面的展览,这些都是重要的档案资料。因此,凡曾在我馆展出过的重点展览,都以录相、照片等形式保存下来,备以后研究或陈列时查阅。我们还结合反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历史的《今日深圳》展,收集和保存了有关的照片、文字资料,其中有不少深圳旧貌和各个时期中央领导人、外国政要视察、访问深圳的历史性珍贵资料,还有一套改造前的旧村面貌录相带。这些资料无疑已成为本馆和本地区的历史见证,为研究特区发展史提供了方便,同时成为我馆资料室的特色之一,由此,也可满足馆外一些人士的需要,读者范围也从馆内逐步扩大到馆外,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从而也显示了我资料室工作的重要性。

三、文献信息加工是做好读者工作的有效途径

纵观我国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历程,大致走过了一条“以藏为主——藏用并存——以用为主”的道路。“以用为主”不仅是我们的读者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应贯彻落实在行动中。如读者某项研究工作的快慢和质量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前期工作的好坏,即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数量、质量和速度。以时间概念论,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之完成,前期工作约须占去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实践证明,作为一个专业性资料室,再通过我们与读者的共同努力,至少应可以做到把库存的其所需要的文献信息在最短时间内全部提供出来,缺少的部分则可以文献目录形式上读者知道从何处着手查找。

全开架服务是提高检索效率的最基本手段,一般专业性资料室都应能做到这一点。我馆资料室从一开始就施行全开架服务,使读者与书刊直接见面,让其熟悉排架规律和全部藏书内容,从而节约了找书时间,并可使其触类旁通,扩大知识视野。

我们还认识到,要提高为读者服务的质量,加快检索工作的速度,关键须通过各种加工手段,把分散的文献信息集中起来,予以及时报道,揭示文献资源内容。读者通过浏览,只需较少时间和精力就能获取较多信息。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曾作过如下几种文献加工:

其一,剪报的再编辑和新书提要工作。这是指单项的简单加工,如前述,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剪报工作,因为这是获取有关专业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趋势的最新信息之捷径,所以尽管有几年在部分人员半脱产学习人手奇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坚持下来,并分类归存,编写了目录,便于读者查阅。

其二,综合介绍部分库存文献信息。这是指横向的综合加工。如笔者在某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期间,全室人员合作编撰了一册《史学工具书参考书内容简介》,其中分别介绍了库存工具书、古籍及参考书(包括图表)三个部分及其简单的检索方法,为读者了解和充分利用库存文献信息提供了方便。

其三,编辑专题文献目录索引。这是指专业性较强的既有横向又有纵向的综合性深加工。如笔者个人先后编撰山版的《〈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目录索引(1972—1982年)》、《河南省考古文献目录(1949—1984)》、《中国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文献目录》。现在我室同仁正在编写的《深圳香港历史考古文献目录》等书。编这些索引,就是把分散的文献信息收集齐全后,按不同内容(专题)、地区、时间顺序等重新编排的过程,这须建立在年累月特别注重对某一专业文献信息收集的基础之上。

其四,出版有关专业性刊物。如笔者当年在大学系级资料室工作期间,就曾协助办了一份内部发行的《中国东南亚研究通讯》,内设“研究与讨论”、“译文”、“学术信息”、“书评书讯”等栏目,由于基本上集中反映了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和现状的最新信息,所以对有关的专业人士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目前我室也正协助筹办馆刊的工作。

事实证明,上述的几种文献信息加工成果已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和好评。而且我们虽然被局限于某一个单位的资料室,却可通过信息的双向传递,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并以自己的成果服务于全社会,甚至外延至境外,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乐趣所在。“读者第一、服务至上”,凡读者需要,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才是“以用为主”的具体表现。

(作者单位:深圳市博物馆)

居巢·居廉

陈滢

在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广州地区出现了两位杰出的画家居巢和居廉。他们一生致力于描绘岭南田园的花卉、蔬果和草虫，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画作。他们的绘画清新、灵秀而明快，生动地表现了岭南四季常青的大地上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他们的绘画，不但开了近现代“岭南画派”的先河，而且对后世的广东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居巢和居廉生活在19世纪，去今不过百年左右的时间，但在史籍上有关他们的文字材料却是寥寥可数，记载也甚为简单。

清人张鸣珂的《寒松阁谈艺琐录》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成书的，其中仅有一条提及居廉及兄弟：

居古泉廉，番禺人。人物、花卉、翎毛，山水皆称能事，尤长指头画。兄仁（？）亦善绘事，兄女二，均传家学，长名庆，字佩微，广西于晦若侍郎式枚之母也。次字玉微，年十七，无病踰跌而逝。（《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上海，文明书局，1923年）卷二，九页。）

近人邓实为居巢编《今夕庵读画绝句》和《今夕庵题画诗》时，在其后附上一段有关居巢的文字，于辛亥年（1911年）初版刊行：

居巢，号樵巢，一号樵生，番禺人。工诗，善画。花卉草虫尤胜。赋色落墨善于用水，栩栩欲活，为写生家别开生面。兼能山水、书法。规樵南田。有“三绝”之称。吾粤书画大家首推二樵山人，二樵后惟君继起，声誉并重。尺幅兼金，人争购之。一平著作身后多散佚。友人潘君兰史辑为《今夕庵诗钞》，以写本示，余为择其关于题画读画之作刊之。顺德邓实识。（载《美术丛书》（神州国光社，1911年）第二集第三辑。）

近人汪兆镛所辑的《岭南画征略》虽专门辑录广东画家，但关于居巢和居廉的也只有这么几段：

居巢，字梅生，番禺人。颜所居曰“今夕庵”。工花卉草虫，笔致工秀而饶有韵味。工诗词，为画名所掩。著有《昔耶室诗》、《烟语词》。尝与汉军陈良玉入广西张德甫（敬修）按察军幕。所作尤得江山之助。先叔父毅盦先生题其集云：“空山无人，落叶如雨。抱琴独来，静与秋语。脱然溪迳，深林徐步。微闻斧声，樵子何处？溪云半销，忽见疏树。孤鹤在旁，聆此秀合。”番禺冯询题其集有“爱君墨宝重于金”语。巢有读画绝句三十四首，世多传诵。（兆镛：《岭南画征略》卷十，“居巢；弟谦·子燧”条）。

居梅生，自署梅巢。山水花卉皆雅秀。所作草虫尤精，直追宋元人。遗迹极甚少。人得零缣碎锦，宝若拱璧。

梅生尝偕罗六湖游杏林庄，至荫成子满矣。六湖属仿徐承嗣，临水杏花一枝寄意，因集句成浣溪沙一阙。

居谦，字古泉，居隔山乡，自号隔山老人。巢弟。画花卉翎毛草虫，皆称能事，尤长指头画，亦能写真。尝作《二十四番花信图》。杨永衍为题诗，艺苑佳话也。

道光间临川李芸甫聘孟丽堂、宋藉塘来粤教授作花卉。丽堂以意笔挥洒上追白阳，藉塘设色写生，明丽妍秀，粤画遂开二派。杜洛川、邓荫泉，丽堂派也。张鼎铭、宋子熙，藉塘派也。梅生、古泉兄弟出，初犹学藉塘，后乃自成一派，居氏花卉，又开一生面矣。

此外，散见于近、现代其他史籍上有关居巢、居廉两人的记载都是极为简略的介绍性文字，对于他们的生平行状仍然缺乏翔实完整的材料。幸而居巢和居廉一生的足迹不广，又有丰富的绘画和诗词存世。后人依靠有限的史料和他们的行踪及作品，为他们的生平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居巢和居廉是堂兄从弟，广东省番禺县隔山乡（今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一带）人。居氏的祖父居允敬是乾隆时的举人，曾任福建闽清知县。居巢的父亲居棣华曾在广西做县官，居廉的父亲居樟华郡庠生，能诗善画，曾作《白菊诗》百首，在乡里颇有名气。居氏一门，在当地也可以说是书香门弟。

居巢字梅生、号梅巢，又号今夕庵主生于清嘉庆十六年辛未（公元1811年）十月二日，卒于清同治四年乙丑（公元1865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年54岁。居巢自小就受到忍受好的教育，是一个有较为全面的文化艺术素养的文人。他精于诗词、书法和绘画。他的诗词，集结为《今夕庵诗集》、《昔耶诗集》和《烟语词》。居巢的诗词意境清新，富于形象性，在当时颇为人们称许。居巢书法主要是行草，沉着清瘦，质朴自然，自成一格。居巢的绘画则是以花鸟画最为出色。

居巢青、壮年时一直跟随清官吏张敬修（1824—1864年广东东莞人）。张敬修是一个“素善书画”的官僚，居巢与其岁数相近，二人意气十分相投。张敬修先后任广西平乐、柳州、梧州、恩恩等地的知府，后升至广西按察使。居巢一直当张敬修的幕宾，在广西度过数年。在桂期间，居巢得以饱览名称“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使其绘

●研究与争鸣●

画”尤得江山之助”。居巢又结识了桂林李秉绥的环碧园客居的著名画家宋光宝(字藕塘,江苏长洲人)和孟觐乙(字丽堂,江苏阳湖人),宋、孟二人作画重视写生,画风明丽妍秀。这一时期的阅历,对居巢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敬修辞官返粤,居巢亦随之同行。张敬修回到原籍东莞,以重金修筑了邸宅“可园”,“内储书史,外花术”,并聚集了一批文人和书画家在园内,过着优雅闲适的退休生活。居巢在“可园”内居住作画达九年之长,作张敬修的清客。居巢绘画的精品,大多是在“可园”内为张敬修,张嘉谟父子创作的。直到1864年张敬修去世,居巢才回归自己的故乡隔山乡。他回乡之后,与居廉一起修筑了“十香园”,在其内栽花植木,吟诗作画,但不久就病逝(1865年)。

居廉字士刚,号古泉,又号罗浮散人、别署隔山老人,隔山樵子。生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九月二十二日,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享年76岁,居廉的父母早丧,他与姐姐靠做手工和摆卖为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由于他自幼失学,所以没有学习诗文、书法这些中国文人的必修课程。后来比他年长17岁的堂兄居巢收了他做书僮,并教他绘画。他跟随居巢游幕广西,在广西期间曾跟宋光宝、孟觐乙研习绘事。之后,居廉又随居巢和张敬修回粤,在东莞“可园”寓居作画达九年。在居巢的直接指点下,居廉的画艺大进,渐渐也有了名气,与居巢并称“二居”。1864年,居廉随居巢返回家乡隔山乡。居巢去世后,居廉一直在“十香园”内作画,他以卖画为生终身为职业画家,一脉相承了居巢的画风技法。他在当时的广东、广西、福建一带享有盛誉,求画者甚众。光绪元年(1875年)居廉开始授徒,他以师徒制的方式培养了大批的画人,桃李满门,将“居派”的艺术发扬光大。居廉作画课徒的生涯一直延续到他1904年逝世。

居巢、居廉一生是平和稳定清淡单纯的。两人活动的足迹不广阔,除了寓居广西的一段时间之外,基本上是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又主要集中在广州珠江南岸的隔山乡和东莞的可园。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最富饶的地区。这里冬无霜雪,境内水网纵横,良田遍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除了出产粮食之外,这里还有独特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果基鱼塘”等等,各种经济作物相间而植,四季常绿,盛产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桑蚕、塘鱼、蔬菜、茶叶、柴麻等等。

居巢、居廉的家乡隔山乡,在广州城的珠江南岸一带,广州人俗称这里为“河南”。在清代时为番禺县菱塘属乡。这里石径池塘,疏篱人家,抱瓮灌圃,一派田园风光。清人有“珠江南岸晚云晴,处处桑麻间素馨”之诗句,

河南的庄头一带”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百姓“以栽花木为业”,河南因出产大量的花卉,所以又有“花洲”之称。“花田月夜”是清代的羊城八景之一。

居巢、居廉在广州河南修筑的“十香园”座落在大片的素馨之中,该“园”前临河涌,周围有花圃、菜园、鱼池。二居(特别是居廉)亲自在园内叠石植草,灌花时卉,饲禽养鱼,园内草木扶疏,花果繁茂。据居氏的后人回忆,居廉常常于四周及园内的豆棚瓜架下,花叶草丛中观察各种动、植物的生态;夜间则挑灯于园中引诱虫子趋光飞舞,窥探纺织娘如何在夜间鸣叫之状,以搜集作画的素材。从中可见当时十香园的野趣之一斑。

东莞可园是广东四大名园之一。可园内占水栽花、植木养鱼,极富南方建筑特色。园内有绿草环绕的“环丘廊”,有品尝新鲜红荔枝的“攀红小榭”,有绿竹、荷叶簇拥的“双清室”,有观赏荷花游鱼的“曲池”和“湛明桥”,有兰惠吐幽香的“滋树台”,有攀满紫藤和炮仗花的“花之径”,有种满名花异井、花团锦簇的“问花小院”和“花隐园”……等等。

隔山乡,十香园、可园、珠江三角洲怀抱中的这些田园,浑然融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它清新、自然、天趣、柔和、明丽,它是那样深深地滋润着居巢、居廉的心田,影响和决定了他们的气质和画风。

二

居巢和居巢的绘画是从南国碧绿葱茏的大地生发出来的,因而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1、清新野趣的绘画题材

居巢、居廉存世画作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花卉、草虫和蔬果,这些植物和动物,又大都是岭南地区所特有的。

花开四时

珠江三角洲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使各种花卉四时不绝。清代的屈大均有“花到岭南无月令”(《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术语·花不应候”)之语,嵇含又有云:“岭外多花,在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四时不绝的花讯给予居巢、居廉取之不竭的绘画题材。二居一生有很大部分的时间沉浸在赏花、画花里面,岭南形形色色的花卉几乎都被他们收入画中。

据粗略统计,居巢和居廉绘画过花卉近百种,他们留下的画迹,话脱脱是南粤四季的花候记载:春的杜鹃、含笑、月季、玫瑰、夜合、炮仗花、大红花、茶花、兰花、紫荆、黄素馨、木棉花、玉兰、红杏、夹竹桃、红百合、石蒜、向阳花、鹤顶兰、佛桑、珠兰、海棠花、绣球、牵牛花、百合花;夏天的白兰、黄兰、茉莉、红荷、夜合、素馨、栀子花(白婵)、鸡旦花、假水仙、紫薇、黄槐、萱草;秋天的菊、芙蓉、秋海棠花、美人蕉花、虎尾兰、丹桂、桂花、姜花、鸡

冠花、秋兰；冬天的梅花、桃花、梨花、李花、菊、牡丹、茶花、水仙、芍药……

二居（特别是居廉）除了描绘人工种植的各类花卉之外，还描绘了大量在田头山边野生野长的小花小草，如灯笼草花、指甲花、风雨花、野菊花、含羞草花、小蝴蝶花、兔子花、罗裙带花、酸咪草花、红蓼等等。居廉还描绘了不少菜园中的菜花瓜花，如南瓜花、芥兰头花、豆荚花、菜心花等等。

在二居的花卉画之中，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跃动、栖息在花卉之中的小昆虫。如蜜蜂、蝴蝶、蟋蟀、蜻蜓、知了、螽斯、螳螂、草蛉、天牛等等。这些小生灵，或匍伏于晶莹的花蕊花瓣之中，或攀援于茂密的枝叶藤萝里面，或飞舞于翠色欲滴的空气之中。这些小草虫与各式的花卉组成一个灵动新奇的画面。

居巢、居廉描绘的花卉草虫，有许多是从未有人画过的，而他们笔下出现的花卉草虫的数量之多，品种之广，在中国历代的花鸟画中也是罕见的。

居巢、居廉绘画的四时花卉是那么的清新明丽，从它们晶莹的秀色之中，可以领略到南粤田园流光溢彩的风光和沁人心脾的芬芳。居巢、居廉笔下的四时花卉，是那么的神采飞扬，从它们勃勃的生机之中，又可以体味到南粤大地上那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

居巢、居廉绘画的四时花卉又是那么的自然、亲切和温馨。它们形象地展现了南粤人与鲜花融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二居笔下的各式花卉，与当时流传于南粤民间的歌词小调是那么吻合：如粤女的歌云“指甲叶，凤仙花，染成纤爪似红芽”（《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术语·散沫花”）。又如山歌唱的“待郎待到夜合开，夜合花开郎不来，只道夜合花开夜夜合，那知夜合花开夜夜开”，（《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夜合”）。再如诗人咏叹的“佛桑亦是扶桑花，朵朵烧云如海霞。日向蛮娘髻边出，人人插得一枝斜”（《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佛桑”）。“人家尽种芙蓉树，临水枝枝映晓妆”（《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木芙蓉”）。更如“珠娘冰玉金尊凸，茉莉香中攀荔枝”（居巢《荔枝团扇》款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居巢的（中大）竹枝词说的“冬尽人人争花买，水仙头共牡丹芽”、“羊城世界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年华。除夕案头齐供养，香风吹到暖人家”……

香飘四季

珠江三角洲肥沃的土地上物产极为丰富，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河鲜四季不断。广州近郊和东莞一带土地甚肥腴而多膏物，生活在这里的居巢和居廉饶有兴趣地描绘了家乡丰美的出产，生动地表现了广东得天独厚的富饶。

在居巢、居廉的绘画中出现过的岭南水果有金桔、

四季桔、甜桔、果蕉、香橙、甜橙、杨梅、枇杷、杨桃、青梅、三华李、芒果、荔枝、菠萝、西瓜、龙眼、木瓜、番石榴、黄皮、橄榄、香蕉、大蕉、沙梨、红柿、风栗、木菠萝、柚子、佛手、番鬼荔枝……

在居巢、居廉的绘画中出现过的岭南菜蔬有茄子、蕃茄、白菜、菜心、荷兰豆、花生、玉米、芋头、黄瓜、莲藕、莲子、马蹄、菱角、慈菰、辣椒、苦瓜、丝瓜、萝卜、沙葛、姜、菱笋、南瓜、芹菜、大蒜、蘑菇、冬菇……

居巢、居廉还绘画了一些广东人很爱吃的河塘水产，如河蟹、甲鱼、田螺、大头鱼、鱿鱼、桂鱼、鲮鱼等等。

二居笔下的水果蔬菜和河鲜来自花繁果茂、蝉声四起的果基、果园，来自碧波荡漾的池塘、小河，来自田头村边的豆棚瓜架，来自屋前宅后的疏栏篱落。它们全然是南粤随处可见的，为百姓人家日常食用的东西，与广东的地方传统生活习俗息息相关：如金桔、四季桔是南粤人过新年时家家必备的果品，以取“新春大吉”（桔）之意。又如大蒜，是广州人于正月十九日（俗称“天穿日”）挂于门上以“辟恶”作“饗饫请神”的。而鲜鱼是广东人祭灶的物品之一，取“上年有余（鱼）”之意。采莲是五月龙舟竞渡时人们小儿女佩带的。龙眼等果物是粤人于七月望日时互相馈赠，曰“结缘”的。田螺、芋头、柚子、红柿等，是广东人于中秋赏月时所不可缺少的食品，而那苦瓜，南瓜、菜心、白菜之类，是广东的老百姓日常食用的“粗”菜蔬“碧王苦瓜红苋菜，船刚唤卖鲤鱼”……还有那红艳艳的荔枝，黄澄澄的香蕉，青里泛黄的木瓜，橙、绿、黄几色相间的菠萝，红里透绿的三华李，黄中见褐的黄皮，碧绿如翡翠的橄榄，红晕如胭脂的番石榴等等，更是南粤百姓一年到头享之不尽的美味佳果。

像居巢、居廉这样将南粤的蔬果土产大量地入画是前所未有的。二居不但将家乡土产斑斓的外表描绘得维妙维肖，而且将家乡土产丰富的内涵发掘得真切自然。二居笔下的家乡土产凝结着田野的露水，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是那么的清新质朴，亲切近人，独具一种真、野的谐趣。这些土产，既是南粤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给予人们的恩惠，又是勤劳的广东人民劳动的成果。从二居绘画的土产露气十足的物产之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岭南地方文化色彩，体味到一种平民化的趣味和平民化特征。

居巢和居廉那充满野趣和天机的岭南风物画，大大地拓宽了中国绘画的题材范围，拓展了中国绘画的审美领域，另有一种风味和新意。

2、清婉明净的绘画风格

由珠江三角洲的田园培育出来的居巢、居廉绘画，不但在题材上不拘一格，充满野趣和天机，而且在技法上亦是不拘一格，新意盎然。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绘画

●研究与争鸣●

风格。

居巢和居廉描绘的都是家乡田园里的植物和动物，这在中国花鸟画的历史中是无古迹可循的。二居作画，就不可能从临摹仿古人手，而是要从写生着手。

属于“文人”之列的居巢，常常于花叶草间仔细地观察花卉草虫的情态，对景作画。他曾在《含笑花》一画的题辞中直言不讳地说：“予从事写生，颇尚形似，暇时体认得之，或者不谬。”他又在咏高其佩的诗中写道：“且园指墨由天授，凹凸天然态逼真，一笑坡公务高论，不能形似那能神！”此外，居巢在评石涛、王的诗中说：“笔头那识祖师禅，寂照虚空任自然；但觉淋漓元气湿，不知笔墨是云烟。”“众妙门原不二斗，独参造化溯渊源。世尊信有金刚杵，尽快范篱混宋元。”居巢：《今夕庵读画绝句》“一”和“五”。居巢主张把宋人善于深入细致的观察、生动具体的描绘，与元人重视对象神韵的把握，及作者主观情趣的表达融为一体。这样的艺术观决定了二居的艺术面貌。居巢的绘画是建立在写生的基础上的。他对描绘的花卉作过深入的观察。如他在《含笑花图》中这样写道：“夜合入夜正开，名实殊不相副，固当是大含笑。含笑旧有紫、白二种，白为大含笑，紫为小含笑。今世所称独小紫耳，枝叶虽小异而罄口攒心，花形正复相似……（居巢：《今夕庵读画绝句》“一”和“五”。）居巢的绘画，虽然仍由诗、书、画这些文人画的基本因素构成，且意境优美，“书卷味”尚浓，但是其绘画的造型象真，色彩丰富，光色交融，已经是离开了“文人画”的窠臼而自成一格。

而属于“职业画师”的居廉，就更是“写生尤勤”。他“专向大自然里寻求画材，以造化为师”：（高剑父：《居古泉先生的画法》）“每以暇日，挟丹青游野次，追模花鸟草虫、诸生物，得其神似。”（李健儿：《广东现代画人传附编》）。居廉除了对植物、动物的生态习性作潜窥墨记之外，还认剥制标本的方法进行写生。如他常常蓄昆虫于玻璃箱之中，或以针插昆虫钉于壁上对其写画由于居廉重视写生，所以他对各种草木虫鱼的生态特点、生长规律都了然于胸。如他画白苦瓜，知道“白苦瓜出龙山，色嫩味清。胜五羊市上旧种。可作案上清供，熟时宜配鱼是，下酒物也。闻此必须种水边，映照乃成白色，否则旧家碧玉耳。”（居廉：《白苦瓜扇面》款识。）由于居廉重视写生，所以他笔下的一花一草、一虫一鸟都妙契自然，神态活现，极少有古代画家由于缺乏自然科学的知识而在作画时出现的谬误。甚至连那些容易为人忽略的地方居廉也注意到了，如花叶花瓣上不规则的虫口，花叶边沿干枯蜷缩反叠的形态等等，居廉都一一描绘了出来。又如居廉知道“蝶又分春秋两种：置于春花者则翅柔腹大，以初变故也；置于秋花者则翅劲腹瘦，以将老故也。”他还知道螳螂在交尾之后雄的会被雌的吃掉等等。这种种

事例，都可说明居廉写生察物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

由于居巢和居廉的绘画实践是在珠江三角洲的田园上展开的，这片独特的田园给予了他们独特的创作灵感，使他们有独具的慧眼，对自然界的美有自己的发现，从而在绘画的形式和技法方面有新的探索和创造。

珠江三角洲是受着丽日的普照、薰风的吹拂的锦绣之地，这里的景物是那么的清新秀丽，完全迥异于北方那雄浑苍茫的景物。浸透了这一方土地滋润的二居绘画，就缺乏恢宏博大的气势而显得清婉玲珑。二居的画作绝大部分是扇面、斗方之类，大体属于小品画的形式。二居很少画繁密驳杂的东西，他们那面积不大的画面上往往只有单个或三两个的动、植物出现，构图十分单纯。二居作画又多取近景和中景，空间层次并不复杂，然而又是那么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如他们都爱画的“荔枝图”，就只取一串带着叶子的荔枝入画，再加一只飞蝉，背景则是一片空明。画家着力去描绘荔枝和飞蝉，把新鲜红艳的荔枝壳上的潮露，把蝉翼的玲珑通透画得活灵活现。使人从中联想到那红果绿叶、累累团团的荔枝林，联想到那沁人心脾的荔枝的清甜气味，联想到那荔枝林中四处鸣响的蝉声。又如居巢的《大头鱼》，在画右方露出两个硕大的鱼头，就像大特写的镜头一样，画面上那点点的水草画得极为清淡空灵，使人感觉到有广阔的水面任鱼儿游乐。居巢的《鲶鱼》、《双鹭》等画也是以一两只的鱼、禽来表现水面的宽阔和清澈，居巢的这几幅画，以其疏朗的景物，清淡的色墨，生动地再现了珠江三角洲纵横交织的鱼塘、河涌的野趣和生机，再如居廉的《南瓜花》，画面只有一朵南瓜花和几片瓜叶、一株瓜蔓，此外还有一只螳螂攀援在花叶丛中。画面的景物清疏，但却充满了生气：南瓜的花叶枝蔓的气色鲜亮滋润，长势活泼茁壮；螳螂的动态维妙维肖，那富有弹性的触须似乎正在微微曳动。从这小小的画面之中，不难看到乡野的瓜圃菜畦那竞争争绿，花繁叶茂的景像。

居巢和居廉的绘画虽然是小巧玲珑，但是却别有韵味。二居在扇面（主要是折扇）、斗方这些小体裁之中，运用独具的匠心、独特的剪裁和巧妙的构思表达了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二居的绘画在小巧玲珑之中见清新奇趣，在小巧玲珑之中见丰富的内蕴，从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个性特色。

居巢、居廉对乡土自然美的独到表现还体现在他们的绘画技法方面。二居的绘画技法基本上属于工笔设色和没骨一路，然而他们又结合乡土自然生态的特点，作了新颖的创造。

珠江三角洲是四季常绿的地区，这里没有秋冬树叶尽落的景色，更没有积雪的玉叶琼枝的景像，这与中原

和江南地区四季分明的景色是迥然不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不但阳光充足,而且雨水特别丰富,各种的植物常常处于湿润之中。这种独特的自然生态,给予二居独特的创作灵感,从而创立了独特的“撞水”、“撞粉”的绘画技法。

“撞水”法常用于画叶子和枝干,即于叶子和枝干的颜色还很湿润的时候,用净笔蘸水从叶子和枝干的向光面注入,使颜色凝聚于一端或沉积于边上,注水的地方淡而白,成为受光部;而不均匀的撞水干了之后,形成深浅不一的多种层次,及其天然的轮廓线,很自然地表达出阴阳凹凸的变化。颜色的边上留下的那一线较重的水渍,使花叶花枝有湿润的效果。

“撞粉”法多用于画花卉蔬果,就是在颜色未干之际以粉撞入,让粉在颜色上面浮游、凝结。色、粉交融之后,显得润泽松比,使画面一直保留着湿润的感觉。这种技法对表现花卉瓜果的自然形质有特殊的效果。

二居存世的花卉蔬果佳作,都是出色地运用了“撞水”和“撞粉”法的。如居巢的《荔枝图》、《含笑花》、《绣球花》、《特丹花》、《梨花》、《白梅花》、《白绒花》、《酸咪草花》、《杜鹃花》、《木鞭蓉花》、《百合花》、《鸡冠花》、《白瓣花》、《白菊花》、《李花》等等的画作,就是以“撞水”法写枝叶,以“撞粉”法画花朵,花朵枝叶潮湿润泽,如同沐浴在朝露之中,画面清气袭人。居廉作画就更是大量地运用“撞水”和“撞粉”法,如他的《豆荚花》、《绣球花》、《小蝴蝶花》、《白绒花》、《风雨花》、《牵牛花》、《百合花》、《鸡冠花》、《南瓜花》、《太阳花》、《菖蒲》、《石斛兰》、《酸咪草》、《小野菊》、《小蓝花》、《白瓣花》、《紫薇花》、《萱花》、《紫藤花》、《凤仙花》、《山茶花》、《茉莉花》、《灯笼草》等画中的花卉,《岁朝清供》、《西瓜藕片》、《中秋佳果》、《杨桃天牛》、《果蔬》、《红荔》、《白苦瓜》、《佳实图》、《沙梨》、《岭南佳果图》等画中的菜蔬水果,都是巧妙地运用了“撞水”和“撞粉”法绘就的,居廉在一花一瓣、一菜一果的当中,充分发挥水、粉的作用,造成光色交融、清新水灵的画面效果,观之别有情趣。

居巢和居廉的“撞水”、“撞粉”法不但用于画花卉蔬果,而且运用到绘画禽鸟鱼虫和山坡水流等多个方面如居巢的《蜡嘴鸟》、《白鹭》、《青蛙红蓼》,居廉的《红棉鸠》等画,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撞水”、“撞粉”法。画中无论是主体的禽鸟鱼虫,或是背景的山坡水流,都显得那么的明净清澈。

居巢、居廉的作草虫飞蝶时,亦常常用“撞水”、“撞粉”法,如居巢写蝶常在颜色中撞粉,并趁粉水未干时,用笔将画架起,使画面略为倾斜,则粉自聚于一端,干后其色即显得轻松润泽。居廉画虫蝶的翅多以浓淡笔一抹而过,但写到头颈腰腹腿爪等部分,就在颜色未干之时

以粉水注入,使之自然而然成半立体的形状,给人以浑圆的感觉。在写草虫飞蝶的眼睛时,居廉也轻轻注入一点粉,使之圆而有灵光。

居巢、居廉的“撞水”、“撞粉”法是非常有独创性的绘画技法。在中国花鸟画的历史上,自宋人的花卉小品至清代恽南田的花卉画,都不见有二居的这些画法。前人画花、叶,其用粉法皆为抹粉、搽粉、点粉、钩粉,而无“撞粉”;其用水则是与墨色、颜色调和,或作泻染,或作没骨,或作点簇,而不作“撞水”。二居的“撞水”、“撞粉”法在中国花鸟画的历史上有独创的意义。这些技法与“居派”绘画那生动具体的描绘,对物象神韵的把握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成为生机勃勃、清新滋润、灵动妍秀的“居派”绘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二居的“撞水”、“撞粉”法体现了二居自辟蹊径的艺术创新精神,在扩大中国花鸟画的表现手法方面是一个突破。

居巢、居廉开创的“撞水”、“撞粉”法对后来“岭南画派”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该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继承了居氏的这些技法,再把东、西洋绘画的光色渲染融合进来,其画面的色调更为鲜明丰富,视感更为逼真,从而形成“岭南画派”的独特面貌。

居巢、居廉承续了恽南田一路的没骨花卉画法而又有所突破和发展。二居不似一般的画人只学恽南田的皮毛,以设色为工,不是流于纤巧,即误入甜俗。二居学恽南田是得其神韵的。他们既保持了恽南田的清丽妍妙之致,又别出心裁加强了水的份量,从而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清新水灵。如居巢的《牡丹》、《木芙蓉》、《白梅花》,居廉的《月季花》、《牡丹》、《山茶花》、《紫藤花》等等,就是以饱含水份的笔触绘就的,水化于色,色溶于水,水与色融为清新润泽的一体,所绘画的花蕊花瓣因而显得分外水灵生动,如同经过一场春雨洗涤一样。

居巢和居廉的绘画技法离不开一个“水”字,他们以其新颖的与水融合的绘画技法,将那些在广东的雨水、河水、塘水滋润下蓬蓬勃勃生长的植物描绘得活灵活现。二居绘画那独特的水色,构成了一个纯净、明澈的清美境界。

居巢和居廉的绘画具有极为鲜明个性风格——清婉灵动,清澈明净。它在面对自然的基础上,着力将蕴藏在特定的物质材料之中的自然美和乡土风情充分发掘出来。灵动地体现了南方画家对美的感受和理想,体现了南方文化清新、流畅、轻松、明快的特征。

二居绘画以其浓烈的乡土气息卓然自立,在流派迭出的清代花鸟画坛上独树一帜。清新灵秀的二居绘画可与雅逸的“常州画派”、奇崛的八大和石涛花鸟画、恣肆的“扬州画派”以及雄健的“海上画派”并列,成为有清一代花鸟画的杰出代表。

三

居巢和居廉流传下来的画迹大致收藏在粤、港、澳的多个文物博物馆机构和一些私人的手中。居巢的画迹数量不多，而居廉的画迹则是数以百计。

1、居巢存世的画作

居巢享年不长，而且其创作态度比较严谨，以致他留下的画迹并不为多。尽管居巢的遗迹眇眇，但都是审慎构思，精意描绘之作，具有相当的水平。居巢奠定了居派绘画的画风和基本技法，就格调和造诣来说，居巢是高于居廉的。居巢绘画有浓厚的“书卷味”他将家乡田园的勃勃生机与文人画的诗歌意境结合起来，诗、书、画三者融汇为一体，其画作清新文雅，韵味悠长。

2、居廉存世的画作

居廉存世的画迹是相当之丰富的。居廉是个职业画师，以卖画为生，加上他长寿而勤奋，在他一生之中绘画的作品数不胜数。居廉继承了居巢的画风技法，然而却缺乏居巢的文化修养。像诗文、书法这些为文人画家所必备的修养他都是欠缺的，后来他虽有所弥补，但是仍然不甚到家。据说“古泉录古人诗或录梅生诗词于自己的画上，很多错误，很多别字，故梅生常警告不必多题字，这是藏拙之首；古泉早年题字，往往犯此毛病，晚年已极力避免了”从广州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收藏的居廉画迹来看，此说是有根据的。居廉画上的题字不是录古人的诗词，就是录居巢的诗词，而且常常将同一诗词抄在不同的画幅上面。居廉的书法亦显得很弱。总之，居廉的气质与绘画都很明显地缺乏所谓的“书卷气”。但是居廉却有其独特之处；他沉浸于写生作画数十年，他对乡土景物的了解比居巢更为深切，他的画比居巢描绘得更精细，色调更浓郁，形象更鲜活，因而更能雅俗共赏。

居廉一生画了不少的精品，其精品与居巢的佳作可以并驾齐驱，体现“居派”艺术的特色。但居廉到了晚年，由于求画者甚众，他为了加快作画的“速度”和满足顾客（大多是市民阶级的人）的口味而绘制了大批的“行货”。这些“行货”与其创作的精品相比，水平相差十分悬殊。居廉的高足，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文曾说过，居廉70岁之后大量的应酬之作为“客货”（即今天所谓的“行货”），“故诋之者亦多”。从今天流存在粤、港的不少居廉绘画来看，高剑父的话不无道理。

居廉的画迹，为广州、佛山、东莞及香港等地的多个文物博物馆大批地收藏。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为北京的故宫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收藏。而流存在收藏家手中的画迹亦为数不少。居廉存世的画作绝大部分为花卉草虫蔬果画，极少部分为山水、人物画。其绘画的体裁有斗方、

扇面、立幅和长卷等，又以斗方、扇面这些小幅为主，大部分画是以没骨没色方法绘成。

由广州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的居廉画迹是相当丰富的。

在这大批的藏品中，有相当的精品，集中体现了居廉绘画的最高水平。

四

居巢和居廉以他们清新灵秀的绘画树立了“居派”艺术的风貌，而居廉又以一群各有所成的门徒弟子大大扩展了“居派”艺术的影响。

从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居廉就在“十香园”内的“紫梨花馆”设帐授徒。他在其后的几十年间，采取师徒制的方式培养了门徒数十人，私淑弟子近百人。居廉作画课徒的生涯一直延续到他的去世。居廉和他的弟子门徒在清末的同治、光绪年间雄踞广东画坛，形成“居门”一派。

居廉的主要弟子有杨元晖、李鹤年、陈芬、伍德彝、容祖椿、陈鉴、张逸、关惠农、潘玉枢、葛绪堂、葛山堂、郑少甫以及高剑父和陈树人等等。而在居氏家庭之中，跟从居廉学画的有居巢的四弟居仁（子耘）、长女居庆（玉徵）、次女居瑛（佩徵）、子居燧（小梅）、孙居羲（秋海），以及居廉的妻子倚兰、四弟居福（玉泉）、侄居槎（少泉）等等。

伍德彝（1864—1927年）是广州四大巨富伍氏的后代。他少时跟从居廉学画花卉草虫，承传“居派”技法。他家有“万松园”，罗致古玩书画、珍禽怪兽和奇花异草。他常与居门弟子及其他文人墨客在园内作画赏鱼，赋诗酬唱。光绪丙午年（1906年），伍德彝与何剑吾等人在广州河南创办南武中学。伍亲自出任该校的图画教师，其后又受附近几所学校的聘请，兼任图画教席数年。

容祖椿（1827—1942年）是居廉门生之中的佼佼者。他于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无所不晓。其花卉草虫画以写生为基础，清婉妍秀。其山水人物画气格谨严，用笔赋色文雅俊逸。除作画之余，容还精于鉴赏。在20年代中期，容祖椿与陈树人、黎庆恩等人倡导组织“清游会”，该会会员多为诗、书、画家，他们常常到大自然之中去“清游”，获取创作灵感。并在郊野中出示各自的诗画近作互相观赏评论。“清游会”的会员最多时达二百多人，成为一时之盛事。

陈鉴（生卒不详）是居廉甚为赏识入室弟子，他作画笔致蕴藉，恬静秀润。居廉晚年无法应付接踵而来的求画者，就往往由陈鉴代笔作画，居廉自书款识。居廉逝世后，陈鉴挟画东游日本。他的花鸟草虫画很受日本人

欢迎,索画者甚多。从日本归国后,陈鉴出任肇庆中学的图画教席。他曾画《百蝶图》在巴拿马展出,获金牌奖。

张逸(1869—1943)是居廉的又一个著名的弟子。他长于花卉山水,颇得没骨写生法之个中三昧,尤其爱画牡丹花,有“牡丹张”之誉。他曾绘有《百花图》三丈长卷、《牡丹图》二大长卷和《百花画册》。他于书画之外还恣志于诗词文章,旁通金石篆刻。清末广东兴办新学堂,他出任启明中学、八桂中学的国画教师。从中年开始,他专心作画,寄情于山水、花卉足迹遍及五岭之南诸名山。画格雅逸,用笔苍健,迥出时辈。其画作曾入选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

关蕙农(1878—1956)为广东外销画名家关作霖家族的后人。他幼承家学,熟谙西洋画的光阴透视之理。后受业于居廉,又学得勾勒傅色撞粉撞水诸法。他一度致力于美术印刷,任《南华早报》美术印刷部主任。又先后在香港、广州和上海开设“亚洲石印局”。民国初年,他与高剑父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关蕙农把家传的西画技法与居氏的画法共治一炉,尝试以西方的水彩画法描绘中国的仕女画,因而名动一时。他中年以后尝试中西画法一炉共治作画。他用中国的生宣纸和国画颜料,以国画的行笔用水用墨赋色,再参以光阴透视之学。他还将自己的画作以五色版影印,加以说明,订成画册分别赠送给欧美国家的图书馆。

居廉为数不少的门徒弟子承继了“居派”艺术温婉的气格。尽管他们的足迹比居廉广阔,尽管他们经历了民国取代满清王朝的历史变迁,不少人还参与了新式学堂的教学工作(在清末民初,广东的新学堂所聘请的图画教师几乎都出自居廉的门下),但他们在绘画上总的来讲均未出“居派”艺术的窠臼。从他们作画的选材、布局到技法,都显得婉约文弱,而他们的绘画又缺乏二居绘画那种清新蓬勃的生气,缺乏二居绘画那种浓烈的乡土味道。

在居廉的门徒弟子之中,能得其艺术真谛而又突破其窠臼的当推高剑父和陈树人。

高剑父(1879—1951年)于1893年到居廉门下学画。他早年对“居派”的对景写生和撞水撞粉等技法学得相当到家。他19岁时绘画的花卉四屏(分别为白荷、凌霄、瓜花和牡丹)与居廉如出一辙,只是在格局和力度上比老师宏阔一些。

高剑父在居廉门下学习多年,他不但全面学习了“居派”的绘画技法,而且以他特异的资质感悟到“居派”艺术的精髓,高剑父认识到居氏“专向大自然里寻求画材,以造化为师,更运用其独到的写生术,消化古法与自然,使成为自己的血肉,故能自成一家。”(高剑父:《居古

泉先生的画法》)“吾师对艺术一生的用心,是要解放古人的束缚,回到自我表现的境界里,一空依傍,赤裸裸地现出我的真面目,在诗化的造型领域中自由发展。

高剑父离开居廉之后,多次前往日本游学。他在日本先后进入“白马会”、“太平洋画会”及“水彩画研究会”等美术团体学习西洋西法。

高剑父在日本期间认识了孙中山,随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革命的一分子。他回国后参加了一系列出生入死的革命活动;他在广州设立反满清的秘密据点,制造炸弹,组织暗杀队和敢死队……辛亥革命之后,高剑父摒弃一切政治活动,又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创作和教育。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高剑父的居廉那里感悟到的艺术创新精神上升为一种“艺术革命”的精神。高剑父与陈树人、高奇峰一道,树起“改造传统图画”的旗帜。高剑父身体力行,在折衷中外,融汇古今,开发现代题材,扩大国画表现领域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高剑父这位居门的高徒,一反“居派”温婉文秀的画风,而以其雄强恣肆的画风自成一家,创立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名播遐迩的“岭南画派”。

高剑父成名之后,对其早年的启蒙老师居廉大加褒扬。居廉的“师法自然”、“精于写生”、“广泛选材”以至其撞水、撞粉的技法被高剑父弘扬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居派”的绘画衣钵,经过高剑父、高奇峰(他从学于高剑父,间接地师法居廉)兄弟的改造,成为“岭南画派”绘画的重要内容。而高剑父、高奇峰又有大批的学生弟子,其中著名的有方人定、李抚虹、苏卧农、容大块、黎雄才、黄独峰、司徒奇、赵崇正、关山月、何磊、黎葛民、何漆园、黄少强、叶少秉、赵少昂等等。他们在“二高”的指导下,又不同程度接受过“居派”艺术的影响。

居廉之后,代有传人。尽管以后的几代画家不尽拘于师承,各有不同的变易、突破和革新,他们作画的题材更广,门类更多,各自的艺术风格已迥异居氏,然而,但人仍然不难从岭南画坛的流风中看到“居派”艺术所潜植下来的因子。

(作者单位:广州美术馆)

丹青绘南粤 科技显风流

——记“广东省社会发展成就展览·历史与现实画卷”

肖洽龙

1994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社会发展成就展览中,广东馆有一幅长80m、高2m、在5.8×1.8m的展面上不断循环展示的《历史与现实(广东:1840—1994)》画卷以其题材恢宏、主题鲜明、手法新颖、大手笔、大制作而使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为了完成“历史与现实”画卷这一艺术巨作的创作任务,广东画院组成了强有力的设计、编辑、创作小组进行绘制,并根据文字脚本,从博物馆、图书馆、出版物等各个渠道广泛收集文字资料和600多幅形象资料,力求以富有创意的艺术构思,以一流的美术设计,一流的编辑和一流的创作,艺术、典型而又真实,概括地反映150多年来广东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面貌。

“历史与现实”画卷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描绘了近代以来发生或发端于广东,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围绕这些历史事件的重要历史人物,概括广东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面对充满凝重感、沧桑感的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抗英、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抗日战争、广州解放等一个个历史画面,我们犹如在读一部饱含血与泪、荣与辱、爱与恨,同时又是风雷激荡,波澜壮阔、形象生动的广东近代史。随着画面不断循环展示,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毛泽东、叶剑英……等一个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志士仁人和革命先驱的艺术形象相继出现,他们为维护民族尊严,争取民族生存与发展,谋求民族解放,为改良、变革落后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的公平合理,谋求人民的幸福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这是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它催人泪下,令人扼腕,使人感奋和振动。

画卷以浓墨重彩描绘了广东人民在建国4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15年来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计有绿色革命、工业腾飞。信息时代、走向辉煌等方面的内容。当画卷相继展示出通过艺术处理的绿色田野、硕果累累的丰收场景、温室作物、现代代养鸡场、茂名石油城、大亚湾核电站、现代化工业区和生产车间、大型电讯交换系统、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先进的教学、文化传播设施、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以及全省各地美丽壮观的城乡面貌。我们不能不为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乃至抓住历史所赋予的改革开放的机遇,以善于兼收并蓄、溶汇中外文化之精华,敢为天下

先的勇气,先行一步,创办经济特区,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自豪和高兴。

毋庸讳言,画卷以绘画的形式勾勒出了广东历史与现实发展的脉络,是近代以来广东历史与现实的缩影。那些富于艺术感染力的画面犹如一篇不断回响在耳际的南粤历史与现实的诗篇,有凝重悲壮的美,也有雄浑壮丽的美。

“历史与现实”画卷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绘画创作,其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它的高科技含量,在于它是历史——现实、艺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

首先,广东画院的画家们根据历史的、现有的形象资料,扣紧主题进行艺术构思和创作,对所有形象资料进行编辑、套色、绘制等艺术处理,并注意表现形式和各个部分的过渡衔接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具有艺术感染力,所有色彩、图像要尽可能符合电脑制作的形象要求,最后将画面制作成120张转片。广东壹派产品推广、制作有限公司则将120张转片进行电脑图片合成,即按要求进行电子扫描,弥补画作原稿局部的不足之处,使色彩、图像、层次等不要失真。也就是说,通过对图像大小、色彩浓淡的艺术处理使多美化并达到设计要求,最后将所有图像资料按比例合成,存贮在软件上。广东省旅游广告公司则利用先进设备将存贮在软件上的图像用激光打印纸制作出全景图,然后在白色德国产欧特龙软性底材上进行高密度、高清晰度的电脑喷绘,每次可喷40m长,两次就制作成80m×2m的画作。这是一项在广告制作上使用的尖端技术,在风吹、雨淋、日晒的自然环境下可以保持五年画面不变色、图像不变形。至此,“历史与现实”画卷才算制作完成。然而,要使80m×2m的画卷能够循环不停地展示,还必须有相应的机械设备,这一机械设备就是由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专门研制的连环画箱。该画箱宽6m、高2.5m至2.8m、厚1.5m,画卷在箱内作卷绕水平转动,画箱可视画面窗尺寸为5.8m(宽)×1.8m(高),画面从右自左连续单向匀速展放,根据人的视觉效果,展放速度为每分钟8m。连环画箱结构复杂,制作技术难度大,它要求展放过程保持平衡,传动运行均匀可靠,传动部分噪音小,运行画面平整不起皱,且不允许有机械传动设备漏油或脱锈等沾污画面。这种将80m×2m的画作为卷绕转动的展示手段在国内尚属首创,在广告的制作和传播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实

讲解员语言训练漫谈

张光华

讲解是什么?是展览与观众间的纽带和桥梁。这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

由此,我们又称讲解是一门语言艺术。讲解员通过语言把自己对展览对象的表象及其文化内涵的理解传递给观众。好的语言所创造的形象不仅可以弥补观众只从视觉上得到印象的不足,还可以使整个展览获得新的生命。

为此,掌握并正确使用语言技能对于一个讲解员来讲,是其众多职业技能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基本功了。

涉及语言艺术的行业很多,诸如影视、演员、播音员等等。但由于讲解服务对象和操作环境的特殊性,令其对语言的要求和训练方法不尽相同,可这一点容易被忽视。所以,讲解员的语言训练长期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甚至事倍功半。

本文试图从比较客观和直接的角度出发,对讲解员的语言声音训练,语言正音训练和语言艺术化训练三个方面提出训练要求及方法,希望对于讲解员的语言训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语言声音训练

歌唱的练声一直被作为提高语言声音的最有效训练,实际这是个误导。因为从本质上讲语言的发声是自然音,而歌唱的发声是非自然音。用自然音讲话贴近生活。自然、亲切、轻巧、灵活是我们讲解员所需要的语言声音,而非自然音更多的强调音色、音量、声音线条,用这种声音讲话难免会有些装腔作势。因此,用歌唱发声的方法来训练语言发声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对于健康的人来讲,他们的发声器官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他们发声能力和效果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他们各自发声时运用共鸣腔体能力的强弱上。要获得一个好的声音共鸣,使自己的讲话声音宏亮,音色优美,嗓音经久耐用,就必须做一些有意识的训练,也就是语言主要共鸣腔体的运用训练。

语言主要共鸣腔体由口腔共鸣,鼻腔共鸣和胸腔共

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画家的完成的是画作的设计初稿,电脑图片合成的是正规的设计稿,电脑喷绘则是按正规设计稿进行放大,制作成画作,而连环画箱则是把制作好的画作向观众循环展示,一环扣一环,集众家之大成,缺一不可。

从“历史与现实”画卷的绘制过程和展示手段可以看到,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在介入艺术创作过程,正在改变长期沿袭

鸣组成。这些共鸣的形成又都是以声带振动发出的声音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共鸣腔体中发出来的音归类为噪音、咽音、鼻咽音、喉回音和胸音。讲话时这些音在发声器官的协调作用下形成噪音、高位音、低位音,任何语言的音色都有这三部份组成。为此,我们从这三部份谈语言声音的训练。

1、噪音,这是语言声音的核心,并通过气息产生其他几个部位的音。噪音的训练旨在加强声带的闭合力。训练方法十分简单用“a”或“i”交替发短音,但必须注意:

(1)小舌头提起,软腭向两侧绷紧,喉壁向后扩展,舌平放,舌根微压,暴露上齿,口形呈微笑状态。

(2)打开鼻咽腔及喉咙,声音集中点在鼻咽腔,气息的支持点在胸腔,

(3)发短音时无需定调,但必须在感到舒服的音域内发出“a”或“i”,也可以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在练习中要自然,母音要清晰,唇舌软腭,喉结等部位的状态一定要自然而准确。并时时要去体会声带的闭合感。

1、高位音,是由噪音、口咽音和鼻咽音组合而成。以噪音为基础,以口咽音为过渡音,以鼻咽音为主体。高位音顾名思义即讲话时音调在较高位置上进行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的特点是音色明亮,传得远。对于讲解场面比较大,观众较多和需要强调语气时比较实用。高位音的训练方法主要以哼鸣为主。哼鸣是以噪音为基础,在气息的支持下通过口腔后部把音送入鼻腔。在发哼鸣时,双唇自然闭合并要感受微微振动。如果条件允许可在空旷开阔的高处,通过哼鸣突然打开口腔,运用哼鸣找到的鼻腔共鸣位置和感觉向视线的最远处大声喊去,可获得更佳的效果。此时的气息支持点和发噪音时不同,应在腹部。

3、低位音,是以噪音为基础,由噪音、喉咽音和胸音组合而成,胸音是低位音的主体。

训练低位音时“a”母音由高向低滑行。可分二步走,首先在做下滑音时将喉壁向后扩展并扩大喉咽腔下部。

下来的板面加自然光或人工光照明的传统展示手段。要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使人们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和展示效果,它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感受,它告诉我们:科学技术使艺术得到了升华,也使艺术以更加新颖独特的方式进行传播,从而更具魅力和吸引力。所以说,别出心裁的“历史与现实”画卷是历史——现实、艺术与科技的结晶,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品。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 随笔 ●

其次将喉回腔下部延伸扩大到胸腔。一般能做到第一步时声音就会明显的宽厚,圆润也是以应用在讲解中了。

上面独立地讲解了发嗓音、高位音、低位音时运用共鸣腔体训练方法。但实际操作中不能彼此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要相互关连和影响,形成声音的整体。不然的话会把声音割裂得支离破碎不为观众所接受。

二、语言正音训练

对于一个讲解员来讲,只要其具备初中文化程度,作用汉语拼音,拼写任何词句都不会很困难,但要其准确流利地读出这个语句,他们中间不少人却会显得力不从心,常常出现开口音嘴打不开,双唇音嘴皮没力,闭口音又闭合不紧等等。

由此可见,阻碍我们正确,清晰发音的并不是不会拼音,往往是控制读音器官功能发生障碍。所以,下面的语言正音训练并不从常规声母、韵母、声调,拼读方案等方面进行。而是从如何加强发音器官功能训练着手,旨在发展发音器官的柔韧性,增强发音器官肌肉群的协调性,克服由方言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不良发音习惯。

1、张口练习,嘴张开,上下腭打开直到可以放进两只重迭的手指,上下唇放松。开口的动作要柔和,舌头平放,不能后缩或隆起,舌尖自然地在下门齿背。经常做这个练习,可以帮助克服说话嘴紧打不开的毛病。

2、上唇练习,将上唇引到上齿龈处,便全部门齿都能看见,下唇听其自然,口部和面部肌肉要保持平静。这个练习的目的是克服妨碍发音清楚、响亮的“死唇”促进上唇的灵活性。

3、双唇练习,双唇闭拢,向前突出,然后自然地恢复原状。唇形的圆展,对某些字的发音正确与否至关重要。

4、舌头练习,口微微张开,舌头从正常的位置“舌尖在下门齿背抬上去,沿着上腭向后滑卷,然后再回到正常位置。这个练习的目的在于锻炼舌系带和舌头肌肉的灵活性。

另学发音、学说话,是一种“口耳之字”,口耳相传,耳听口说。因此,“耳听”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训练手法,尤其对于成年人学说话显得非常有效。所以,我们要多听、多看广播电视中播音员的讲话,注意其发音腔调,发各种母音的口形和其他发音器官的状态,并进行模仿。

三、语言艺术化训练

讲解员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自己对某个展览的理解和感受都很深,并且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讲解词完美无缺,可说出来却平平淡淡,毫无生气,究其原因,就是讲解语言缺少艺术性。

我们的讲解要使观众不仅理解,而且能真真切切感受展览主题所包容的深刻寓意,就必须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对语言进行必要的艺术化处理,做到“言必有艺”。

那么讲解语言的艺术性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又

应该怎样来把握它呢?概括起来讲就是:语调抑扬顿挫,语气刚柔相济,节奏快慢有板,语意贬褒分明,细说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1、轻重强弱,语言中的轻重强弱,可以说是在每句话里都存在的。加重增强音量可以达到强调的目的,但有时放轻减弱同样也可以突出重点。特别当我们在观众人数多,场面不太安静的时候,语言放轻反而会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起到此时轻声胜重的效果。然而轻重强弱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为了让观众听清楚,就平均对待地把很多词都念得很响,甚至把一些轻声字也不念轻,结果造成主次不清,语意不明,语言机械刻板,重音过多就相互抵消了,等于没有重音,一般来讲重音越少句子就越清楚。讲解词中段落与段落之间,句与句之间以至一句话中词与词之间,都要根据它们在达意方面所起的作用,区别对待把重要的放在首要地位,次要的则只是衬托,根据主次,轻重强弱互相搭配,突出重点。轻与重强与弱是对立的统一。没有轻就显不出重,没有弱,也就比不出强,是相反相成的,只有正确运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2、断连准确疏密有致,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吃,话要一句一句讲。一段话有断有连,中间有些长短不同的停顿,在句与句的衔接上,也是有疏有密。当断不断,就不可能把语意交待清楚,当连不连又会造成破句,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意思。例如:

我知道/他不认识。(他不认识)

我知道他/不认。(我不认识他)

停顿是声音的休止,但不是思想感情的休止,而是感情和思想活动的延续。不然,就会破坏语言的连贯性和统一性。

停顿作用还在于造成一种情节发展的悬念。有时当描述一个英雄人物或一段悲壮的历史,讲解员由于感情的激动或说不下去等等原因,可以出现有机的沉默。例如:

英雄/倒在血泊里。

日本鬼子/怎么能/这样残忍!

这就是心理停顿,运用得好,会使观众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3、快慢缓急,歌曲的曲作者为歌曲规定了节奏和节拍,歌唱者只需按部就班地演唱。但讲解的节奏是要讲解员根据对展览内容的研究和理解,以感情为依据随着内心节奏的变化而变化。展厅气氛、秩序、参观时间和对象等因素都将对讲解的快慢产生影响,但不能决定讲解节奏。

另外,快慢都是相对而言。快不能一个劲地快,慢也不是一个劲地慢,要做到快而不乱,慢而不拖,快里有慢,慢中有快,欲快先慢,欲慢先快,快慢交替,有张有弛才能把握好语言的节奏,避免语言的刻板。

4、刚柔与扬抑,语言的刚柔,表明说话人的态度,语

佛山市博物馆档案工作业务建设的启示

杜群英

十月金秋,佛山市博物馆的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迎来了丰硕成果。

1996年10月23日上午,经销档案局授权,佛山市档案局组织了五位省级评审员,对佛山市博物馆档案综合管理晋升省特级进行评审,评审结果为该馆档案工作在行政管理、基础业务、室库设施、开发利用4大项均达到省特级管理合格分数,总分为97.1分(合格为93分),符合晋升“省特级”管理标准。为此,佛山市文化局召开佛山市博物馆晋升省特级评审颁证会。省文化厅办公室、文物处派人前往参加。佛山市档案局长代表省档案局将档案综合管理“省特级”证书授予佛山市博物馆馆长陈智亮。

佛山市博物馆档案工作业务建设的晋级,标志着全省文化系统档案综合管理水平的突破,它必将对佛山市以至全省文物博物馆系统、全省文化系统业务档案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佛山市博物馆原本没有档案工作的基础,建档仅6个年头,他们在市文化局的领导和市档案局的指导下,经过档案人员的艰苦努力,默默奉献,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有什么经验给人以借鉴和启示的呢?我以为有如下几条:

一、单位领导重视,档案意识强,思想明确。馆长陈智亮是从事文博工作30多年的文物专家(副研究馆员),对文博档案就是博物馆工作的组成部份认识较深,认识到只有把馆的档案工作建设好,把文博单位的业务材料整理管理好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他们以高起点、高标准去建设综合档案室。馆长任档案鉴定小组组长,亲自并指导档案室的档案资料收集,从而丰富本馆的档案收

藏,确保档案质量,提高了档案的利用价值。

二、把档案室真正作为一个内部机构设置,作为馆的第二个保管部,与机构内其他部门平衡。

三、配置了适应工作需要而又水平高素质好的人员管理档案。他们配置具有大学学历和馆员职称的人员当档案室主任,3位档案工作人员中有2位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职称的。

四、把文博档案建设真正作为文博事业建设对待,给予必要的经济投入,保证了档案工作的业务建设。

五、大力开发档案资料的利用。利用本馆档案资料举办了《沉船遗物展》、《佛山胜迹展》、《纪念民办反西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型图片展等,收到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六、佛山市博物馆是地市的二级单位,档案工作晋升为“省特级”管理,与前两年县的二级单位斗门县文化馆档案工作升为“省二级”管理,说明了二级单位档案综合管理建设,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给予应有的重视,经过努力是能够上等级的。

我省的文化文物事业建设这几年来都有长足的进展,但我们的文化档案建设却相对滞后,就连我们省的全国、全省文化先进单位的档案工作建设,也只有一个广州市海珠区文化局的档案综合管理升为“省二级”管理。这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去年底,省文化厅召开了全省文化艺术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档案工作业务建设的步伐。但愿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真抓实干,使我省文化系统的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迅速赶上来。(作者单位:省文化厅档案科)

调的扬抑,则表达语气的声音色彩,语言是通过语调体现出来的。

同样一句话甚至同样一个标点符号运用不同的语调可以产生不同效果。

这是汉墓出土的文物?(柔而刚)——询问

这是汉墓出土的文物?(柔而抑)——疑问

这是汉墓出土的言物?(刚而扬)——反问

这件文物太完美了!(柔而扬)——称赞

大革命失败了!(柔而抑)——沉痛

准确而鲜明的语调,是在正确理解作品与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娓娓而谈的,就不应侃侃而说;当轻言细语的,就不能盛言厉色。明确了语言的目的,又有了深刻的感受,那语言就将是有感而发,就能在这个基点上寻找、选择

准确的语调,把对讲解对象的爱憎褒贬体现出来。

方法是服从于内容的,讲解语言的艺术化处理上有许多可以运用的方法。但只有在你明确了为什么要这样说的前提下,再仔细地研究怎么说,才能收到语言艺术效果,不然的话只能适得其反。

语言,源于生活,植根于深厚的知识土壤。作为一名优秀讲解员就必须认真学习汉语言文学,了解历史,并借鉴音乐、舞蹈,等兄弟艺术表现方法甚至应懂得一种外语会话。这样,即能提高讲解员气质和风度,又能使讲解员言必有旨,言之由衷,言而有形,讲者动情,闻者动心,真正心心相印,使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沟通真正成为通展览与观众的纽带和桥梁。

(作者单位:东莞市博物馆)

● 随笔 ●

“石湾瓦，甲天下”。佛山人以拥有著名的石湾陶瓷而自豪。在马来西亚，能亲眼目睹清代石湾陶瓷就更加自豪。

今年6、7月份我到马来西亚参加宫廷葆春酒的研讨推介活动，两次看到石湾的清代陶瓷瓦脊装饰艺术品，使我异常兴奋和激动。第一次是6月10日，在吉隆坡雪兰莪州看到一栋陈氏书院。从建筑材料、式样、风格都是中国式的，属于珠江三角洲典型的祠堂建筑。尤其是所有的瓦脊均是清代石湾烧制的人物陶脊，倍感亲切。第二次是7月19日，在槟城看到一栋五福书院，规模小于陈氏书院，装饰没有那豪华，但建筑式样、装饰风格基本相同。两处院的瓦脊都是清光绪年间石湾陶塑人物、花鸟装饰，距今约有100年历史，仍保持完美，着实难得，现已被马来西亚政府定为著名历史文物进行保护。它不仅是中马两国人民历史上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为马来西亚人民留给子孙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艺术品。

陈氏书院位于吉隆坡雪兰莪州，建于1897年。由吉隆坡华人领袖陈秀连倡议下，以3500元马币买下地皮和7个铺位，由陈秀连、陈新禧、陈春先生集资合力策划下，开始了陈氏书院的最初步工作，后在吉隆坡矿业巨子陈在田先生拨巨资鼎力支持下，再次精心策划，确定建筑方案，经过10年时间的艰苦奋斗，终于将金碧辉煌、古香古色、雕龙画凤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陈氏书院在吉隆坡建造起来。一时名声大振，在马来西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时马来西亚吉隆坡著名建筑之一。

陈氏书院的建筑式样为珠江三角州的典型祠堂建筑。山门面阔为三开间，施方石檐柱，檐下有石小额坊，上有石雕驼峰。前部为门厅，左右为廊，中间有天井，后为正殿，梁架为抬梁式结构。建筑材料除石件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定制外，其余的一砖一瓦一木全部从中国广东运去。因而装饰风格无一不表现出中国的传统特色。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石湾陶瓷瓦脊装饰，正面山门屋脊、两廊、正殿屋脊共四条陶塑人物瓦脊装饰，山门瓦脊的右边有“光绪丙午”（即公元1906年），左边有“吴奇玉造”各四个字。在陶塑人物装饰上面有石湾制造的陶瓷双龙戏珠。正殿瓦脊的装饰方法同山门。除陈氏书院的正面山门、两廊、耳房临街的檐眉、墙壁和砖柱上也有石湾陶瓷人物装饰。它区别于广州陈家祠和佛山祖庙的装饰方式，别具特色。用陶瓷人物、花鸟装饰檐眉、砖柱和墙壁，在石湾陶

石湾陶瓷在

马来西亚沈江海



瓷制品中并不多见。全部装饰艺术品中有人物造型的约有350多个。这是目前所知，装饰人物最多的古建筑之一。从现有佛山市博物馆保存的10多条瓦脊来看，马来西亚陈氏书院的瓦脊是石湾瓦脊艺术品的较晚制品。奇玉店最早瓦脊艺术品制造于1835年，而马来西亚陈氏书院的瓦脊制成于公元1907年，前后相距71年的历史。从陶瓷人物的神态、表情上看，艺术造型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所以吉隆坡陈氏书院瓦脊是目前石湾陶瓷瓦脊装饰艺术品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槟城的五福书院，建于1896年。现存有前殿和正殿、两廊、中间有天井。梁架为抬梁式结构。保存完好。其建筑式样、装饰风格与吉隆坡陈氏书院基本相同。只是建筑式样稍高大点，看上去较气派点。五福书院前殿共二条陶瓷瓦脊人物装饰，全部瓦脊装饰人物约163人，比陈氏书院瓦脊人物少很多。但人物装饰的个体较大，看上去要清晰、生动些。瓦脊左边“粤东奇玉造”、右边“光绪”年字样。五福书院是广东地区到马来西亚地区的先民们为着教育后代，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创造，为中马的文化交流作了积极的贡献。

“石湾陶瓷业以美观、实用著称，行销于两广及吕宋诸国”。据马来西亚的朋友讲，过去在马来西亚也曾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中国瓷器、石湾陶器，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石湾的陶瓷就已远销马来西亚和东南亚诸国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延伸，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也得到不断的发展，海外谋生的华人急骤增加以及经济地位的显著提高，中小城市的迅速发展，不仅对中国传统木、石、砖、瓦建筑材料需求更多，而对名盛一时的石湾新的豪华装饰陶瓷制品，如花脊、鸱尾、花鸟、护栏等等地就备受欢迎。马来西亚陈氏书院、五福书院的创建，不仅真实地记录着清代马来西亚与佛山石湾陶瓷贸易往来，也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早期创业之艰辛，体现了他们为着教育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胆识和魄力。

附图：图一、马来西亚陈氏书院全景

（作者单位：佛山市博物馆）

浅谈汕头旧城改造与文物史迹的保护

杨木芳

文物是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城市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不可替代的历史实物见证。就汕头开埠的时间不长,但也有四、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从宋末元初,因韩江大量泥沙的长期冲积,在今旧城区西南部即厦岭南面露出“沙汕数道”始,渔民便在这里捕鱼了,史称之“沙汕”。后因冲积逐渐扩大又称“沙汕坪”、“沙汕头”、“沙汕头港”、“汕头埠”,其后发展成今天的汕头市,这一系列的历史沿革与地貌变迁,能遗留下来的文物史迹弥足珍贵,是很值得继承和倍加保护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妥协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清咸丰八年(1858)年被迫开放汕头为通商口岸;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式开埠,称为汕头埠;1921年设立市政厅与澄海县分治,正式称为汕头市。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而开埠建市的汕头,大规模的建设是从二、三十年代才开始的。汕头从一开埠,其经济文化便与西洋密切联系,建筑物的风格也受其强烈影响。小公园一带是汕头埠商业繁华地段,所谓“百载商埠、楼船万国”,盛况空前可想而知。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也曾指出:“汕头是五口通商之外的一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至三十年代中期,汕头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而今,漫步旧城街头,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独特的商业氛围和目睹其建筑物的异国风貌。

伴随汕头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旧城改造迫在眉睫。当然,既然是生活着、发展着的城市就需要现代化建设,以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求。因此,对过去陈旧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加以改造,是必要的。但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一批独具风采的文物史迹和优秀建筑文化遗存如何保护。这一现实的重大课题,不能不使人们深思,汕头是个海滨城市,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还有其独特的个性。以小公园为中心的道路格局,呈蛛网式放射性环状,是近代先进的城镇道路布局,就其城市规划而言。还有连排骑楼式建筑,以三、四层为主,柱头、窗框、大门等细部构件为西欧建筑风格。这些特色建筑和街景,是烙有汕头历史深重印记的个性形象,记录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史实。我国著名建筑师布正伟1994年来汕时专门察看了汕头的建筑。他说:“我走过很多城市,从来没有见过象汕头小公园这样呈放射状的,保护这么完好的旧式建筑。从汕头的骑楼式建筑可以看出,汕头对外交流有

一定的基础和历史。骑楼式建筑与汕头地方的人文气质十分和谐,是环境与建筑完状美融合的一个很好例子,它富有一定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他还幽默地说:“如果汕头的骑楼要推掉,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再来拍一些珍贵的保留照片,也来痛哭流涕一番”。由此可见,建筑专家对旧城中独具特色的建筑和人文史迹景观的保护,是何等的重视。

当前,市区已全面转入旧城改建阶段,对旧建筑物,如何淘劣存精,是个急需认真研讨的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先民们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建设,在汕头这块土地上留下的历史轨迹,也就是旧城中这批负载着汕头优秀文化传统的建筑。祖先留给我们子孙后代这一笔丰厚财富,是形成城市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因素,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关键问题是如何去继承、保护、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价值,是我们这一代人承先启后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看看世界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国文物的保护。如英国伦敦,对旧城区近代的重要建筑都不准拆除,并加以修缮。西德科隆,二次世界大战被毁,战后全部按原规格风貌复建。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政府更是在人力财力上不惜作大量的投入。如法国议会于1987年通过立法,决定拨款50亿法郎,用5年时间大力修缮古建筑,并责成政府每年向议会报告实施情况。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国家对文物保护也相当重视,1982年已制订出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行至今已13个年头。作为著名侨乡,又是对外开放城市的汕头,也不乏其固有的历史遗迹,迄今已公布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10多年来,特区建设突飞猛进,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突出了,不少有代表性的建筑已被拆除,特别是旧城改造,这对矛盾将会更为尖锐。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标志,并不仅仅是大厦高楼的林立和万吨巨轮码头泊位的增加,还应注意保留自己城市原有的特色,才能独具风采,令人刮目。布正伟先生曾指出:“如果全部都是翻新的高楼大厦,会使一座城市失却原有的气氛、气质、气韵,徒留单调和枯燥。”这正是基于这一点,城市的个性和吸引力将会荡然无存。文物古迹有

● 文物保护 ●

着不可低估的社会功能,蕴藏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纽带作用。身居侨乡的汕头,更应弘扬这种凝聚力的优势,激发海内外人士爱国爱乡的热情。而且,文物史迹不可再生,一旦被毁掉,就永远地失去了,留下的,只有历史长久的遗憾。

我们必须努力寻求妥善的“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解决办法。当务之急是保护、抢救旧城中一批特色建筑和重要史迹,使这纳入旧城改造总体规划,并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全面修复,逐步完善各项保护措施。下面就旧城改造中文物史迹的保护、利用等问题提出的几点意见:

(1)“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充分发挥传统建筑艺术的魅力与文物教育功能。①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旧址(省级文保单位),该处是周恩来同志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又是台湾爱国志士邱逢甲在汕头创办新式学校之始的旧址。建议政府拨款,按原貌进行大修,礼堂开辟“旧址”与革命史料陈列。②崎碌炮台(省级文保单位),开辟汕头海防史陈列,与修复后炮台旧址的参观游览连成一体。③将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旧址(市保单位)开辟为“东征军革命史迹陈列馆”。④“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总指军部旧址(市保单位)开辟为“七日红”革命纪念馆。上述四处,均是与我国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旧址。1994年已公布为我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建议近期必须加强旧址保护基础工程的修缮,恢复原有风貌,优化周围环境,利用文物旧址的直观、真实、可信等特点,为全社会提供内容广泛、形式新颖的展览,进行最具感染力、说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使之形成一条参观瞻仰的热线。⑤将存心善堂旧址辟为“潮汕民俗博物馆”,与汕头天后宫、关帝庙、龙尾爷宫组成一处富有地方民俗风格的古建筑特色庙宇游览景点,让游客在观光游览中领略潮汕地区的民俗风情。并以花圃凉亭美化,使之成为市民消闲的好去处。

(2)复兴小公园历来是商业繁华小区,放射性环状的道路格局与骑楼式街景富有浓烈的地方建筑特色。建议保留以小公园为中心的环状带,在至各放射性街口头段,保留南生公司(百货大楼)10号至安平路52号,按建筑物及街景风貌进行修缮,系统带治、开辟200米步行街购物中心,复兴小公园传统商业风貌。这一旧城景观的保留下复兴,既保存了旧城特色,又为我市开发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并与老妈宫、存心善堂旧址等庙宇游览点连成一线,以它们独特风姿,吸引八方游客。

(3)保留开埠重要史迹,开辟外国驻汕领事馆参观

区。旧城区还有一批亟待抢救的文物史迹,如漳潮会馆旧址:是汕头开埠前最早的一幢独具特色建筑物,创建于1854年,为漳洲和潮洲船商贸易场所。太平井是汕头最古老的一口淡水井,汕头未有自来水时为广大市民所汲用。汕头老邮电局是汕头市第一所邮电局。汕头自动电话所是全国9个城市首批使用自动电话之一。外马路天主教楼为宗教传入汕头最早建立的一座传教楼。海关钟楼建于1919年,曾为汕头市标准时间准确报时的钟楼。还有洋商会馆、六邑会馆及其旧戏台、永平酒楼……等以及不少独具一格的民居。1860年英、美、法、德、日、俄、挪威等国家先后来汕头设立领事馆,开办洋行、教会。这批风格各异的建筑物至今犹存,它是汕头历史发展的足迹,记载着帝国主义的洋炮轰开中国清皇朝封闭式国门的历史,也留下了汕头被迫辟为通商口岸而开放崛起的实物见证。上述这批文物,均是旧城区中建筑艺术的精华部分。在沿革史上反映了汕头民族资本主义的繁荣。从文物的角度看,这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应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

1995年6月2日,汕头市委书记许德立在我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上强调:“历史文物是我们的‘传家宝’,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当作一种资源来开发,既可供参观游览,也可以运用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功在当代,惠及后代。要尽快修复、整理,加以保护利用。汕头近代史上有8家领事馆,可搞个外国驻汕领事馆开发区。对已经开发和尚未开发的文物旧址,要有一个宏观的总体规划与现阶段实施计划。希望全社会都来重视,共同保护好这些优秀的文物基地。”许德立书记这一专题讲话,将对我市文物保护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汕头旧城改造中,作为建筑文化的积累,应该是体现汕头历史的连续性以及本地区传统文化的形态,使文物史迹的保护落到实处并得以充分利用,从而形成具有自己城市特色魅力的建筑艺术综合体。关于汕头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风貌的营造,已有规划部门的专家明确提出:“必须有一个总体长远规划和清晰思路,有两个基础值得重视,一是历史文化遗产;一是地形地貌和环境条件。要靠这两个基础去创造出城市的特色。”

历史的价值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过去,更重要的还在于启迪人们展望未来。

(作者单位:汕头市文化局)

佛山的新区建设和旧城区文物保护工作实践

吴庭璋 黄蜀媛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作为保护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一是要保护好名城文物不受破坏,二是要保护好名城的环境风貌,三是要保护和发扬体现名城内涵的历史文化特色,四是切实处理好名城开发建设与保护抢救的关系,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管理好,建设好。

以积极保护的观念处理好名城保护和建设的关系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保护和建设,是有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建筑和传统历史文化特色是名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内涵,而各个历史时期的建设,包括现代化建设则是名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历史上的许多名城之所以湮没了,成了遗址,是因为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停止了发展。停止便意味着走向消亡。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正是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不断扩建改建留存下来的,而每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又必然是在经济腾飞的时期。

改革开放政策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生机。当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方兴未艾,城市现代化建设势在必行。前人创造了名城的昨天,今人也正在创造着名城的今天和明天。历史名城历史文物,对每一代人都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现代化建设,又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内容,增添着新的生机和时代特征。我们的责任是使名城建设一脉相承,为建设一个历史文化特色和时代风韵兼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文化名城而奋斗!

继承性保护,应该更多地体现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其地方文化之精华

佛山是粤剧的故乡,佛山秋色工艺的发源地,石湾陶塑、铸造工艺、中成药均闻名遐迩,著称于世。今天,均在继承保护下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佛山粤剧团连年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佛山民间音乐家代表团两次出访日本,演奏广东音乐和中国古乐。佛山秋色、彩灯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熠熠生辉,佛山狮头风行东南亚,顺德龙舟在国际大赛中赛龙夺锦,佛山剪纸、石湾公仔享誉全世界。佛山铸造工精艺绝,而今更放光彩。历史上,佛山铸出九千斤的铁炮,在鸦片战争中抵御英帝国侵略军,又铸造出重五千斤的北帝铜像雄据祖庙的紫宵宫,今天,佛山铸造出高 1.8 米,长 2.2 米的铜雄狮,安放在某新建市政府大楼前,展示了当

地人民打开山门,振兴经济的气势。象这样大型铜铸狮子,每年都生产 10 多对,落籍大江南北,包括膏、丹、丸、散、茶、油、酒,式式俱备,成为保障人民健康,居家旅行必备的良药。

另辟新区,规划新城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的良策

佛山无秀美的山川,自然景观乏善可陈,其名城风貌主要体现在人文景观上。历史上,佛山是岭南手工业重镇,尤以冶铸、制陶、纺织、成药四大行业久负盛名,区域经济繁荣,造就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与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民居、作坊、会馆、店肆,独特的道路里巷,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庙宇、教堂,有浓厚族权观念的祠堂,都折射出一个时期经济活动和历史文化的特点,理所当然应划定保护区加以保护。问题是这些保护区,大都是旧城建筑密度高,市政设施差,居住人口密集的地区,保护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如单方面强调保护,因保护而限制了改造,使居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会影响了居民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积极性。为此,在有条件并容许更新改造的地段,要允许通过积极开发,加快更新过程,在绝对需要原状保护的地段,应积极采取疏散人口,让保留民居的住户迁入新区,以便将保留民居腾出来修缮,开放陈列参观。故此,不积极开展新区建设则谈不上对旧区人口与住房的合理疏导。

经济的发展带来外来人口的涌入,今天佛山的常住人口是解放初期的 3 倍,还有十几万外来工,旧城区已经无法容纳。建设新城,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道路交通,是佛山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龙头。随着六月底市区八条新建、扩建道路竣工的同时,市政府宣布,又将有八条道路开工兴建。近年,佛山在市区市政道路的建设总量,已相当于建国四十年建设量的总和。根据规划,到本世纪末,市区人均道路广场面积,将由目前的 4.5 平方米,提高到 9.8 平方米,。那时的佛山市区,将形成一个“两轴、三环、混合式道路网结构”。两轴,指的是南北向的佛山大道、汾江路和东西向的季华路、同济路构成的双十字发展主轴;三环,指的是里外三条环路。“一环”将旧城区内“品”字形由清代形成的街坊圈围,对古建筑区起着保护作用。

佛山原是一个手工业的城市,绿化基础并不好。人均绿地面积,1978 年不到 1.4 平方米,1993 年也仅为 3.3 平方米。而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人均公共绿地约 5 平方米,4 个特区城市人均更达到 11.2 平方米。近两年,

黄埔军校校本部的建立及其遗址发掘

黎显衡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

1924年,孙中山总结了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失败教训,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创建一支“将来挽救中国之危亡”,完成建国大业的革命军。他特别选择了两年陈炯明叛变的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以此唤醒群众认识建立革命军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在1917年护法运动和1922年讨伐陈炯明叛军,两次驻节长洲岛,对此处的环境了如指掌。长洲岛位于珠江黄埔水道中央,距广州10多公里,面积6平方公里,当年居民一千余人。岛上山峦起伏,林木葱笼。长

佛山将绿化建设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创建园林城市的目标结合起来,建新区,不忘抓绿化,经过努力,1994年绿化年佛山市区新增绿化面积47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5.2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0.6%,主要的城市绿化景点有季华园、铁军公园、鸿业公园、江湾立交桥地面、新火车站前、城门头下沉式广场和新建道路的花坛、绿岛等。今年市区将继续实施总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佛山大道带状绿地,充实完善唐翠园和中山公园景点,新建南浦园和泥模公园,完成街头绿地的建设,着手开发五峰森林公园、王借岗旅游区,完成东平河滨公园的规划设计,力争到本世纪末,建成园林式城市。

东平河、汾江,是环绕佛山的古水道,既是古城环境形态的标志之一,又是佛山几十万人口的水源。保护水源纳入了《佛山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保护规划》。今年6月,市环保局提出了《汾江河综合整治规划方案》:从1995年到2000年的6年内,整治由沙口至扶西的汾江干流,以及人民桥至镇安的军桥涌,使汾江达到水质、航运、泄洪、纳污的要求,并建河岸风景线。工程方案包括:1、工业污染源治理和控制;2、截污工程。在沿河两岸道路下埋设污水管道,通过污水管网将污水引入处理厂;3、引水冲污工程;4、污水处理厂建设;5、河道及河岸整治工程:拓宽河道,修整驳岸,清淤扩容、两岸绿化。另外,强化有关河道、环境、市政建设方面的管理措施。

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佛山住宅小区建设也上了新台阶。如同济一、二区,在建筑艺术和空间处理、生活设施配套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环境建设更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广泛采用中心式绿地公园组织民居建筑群的配

洲岛、鱼珠、沙路三地隔江相对,三山并峙,地势险要。光绪年间在此三处建有炮台,使用德国克鲁伯的后膛炮,构筑成长洲要塞,控制黄埔港,是海上进入广州市的第二道门户。孙中山选择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便于兴学讲武的长洲岛开办军校,是避开军阀势力对建立革命军的干扰。校舍是利用清末开办的陆军小学旧址,该旧址曾于1922年遭陈炯明叛军炮轰损毁,年久失修,已成废圩。黄埔军校筹备处奉命修葺校舍,披荆斩棘,除秽去污,从前是蛇鼠丛聚之废圩,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

黄埔军校吸取苏俄红军的建军经验,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政治制度,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

置,进一步优化了小区居住环境。建筑的式样也抛弃了单一方盒子式,山墙、山花的处理也富于民族风格,室内装修也趋向高雅和艺术化。短短十年间,新区的住宅小区用地面积313公顷(313万平方米),总共建成10个居住小区,居住建筑面积283万平方米,住房3万多套,12万人喜迁新区。佛山人有了人均12平方米住房面积(1989年人均住房面积为5.2平方米),在珠江三角洲众多的城市中,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数字。佛山居住环境好,几乎是有口皆碑,“筑巢引凤”,成为佛山吸纳人才的重要优势。

从旧城到新区,佛山这座千年古镇,日益显示出一个新型明星城市的风采。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佛山古镇街坊保护规划正在展开,包括修复占地2万平方米的清代名园梁园、保护并修复东华里古街坊建筑群、建设祖庙商业文化广场、兴建华侨博物馆、利用南风古灶筹建陶艺博览区等。保护和修复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古为今用。诚如佛山市委、市政府领导所说,佛山的现代化不是用推土机推出来的,它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佛山要在珠江三角洲九个大、中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从佛山的历史文化中继承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

1995年和1996年,佛山市先后两次作为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综合发展最佳范例之一,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人类住区高级会议。在1996年6月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上,被评为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外电评述:佛山有超前的城市规划,又注意保护历史文物,为后代留下当代人以前的历史空间,从而获得可持续性发展。

(作者单位:佛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结合的教育方针,形成了有铁的纪律,卫国爱民,不怕牺牲,亲爱精诚的校风。军校机构庞大,组织严密,最高领导机构是校本部,由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组成,直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是军校一切方针政策的决策机构,其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办事。校本部校舍是黄埔师生的办公、教学、学习和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

校本部校舍由大门、二门和教学楼组成,座南向北。大门为欧陆式牌坊和左右各一个卫兵室组成,原来陆军小学时期没有此门,后来办黄埔军校才增建的。军校二门为青砖石脚的祠堂式建筑。教学楼是三幢四进两层的砖木结构的房舍,四周有回廊相连。1938年,日机轰炸长洲岛,校本部房舍被夷为平地。日军占据长洲岛后,为储存劫掠来的军事物资,在校本部遗址上建筑了几幢物资仓库。

长洲岛经历了72个春秋,只有珠江涛声不息,青山秀色依旧,军校本部遗址的环境风貌都不断改变,几不可辨。许多怀着敬仰之情欲睹昔日军校风采的人,当入军校旧址时,只看到珠江边的军校大门,若不是门上挂有“陆军军官学校”横匾,很难看出这就是名声显赫的军校旧址。参观者总是要问校长蒋介石办公室在哪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哪里?叶剑英的办公室在哪里?教室、宿舍……在哪里?提出的一串疑问,都希望得到解答。他们知道校本部校舍已不复存在之时,一种失望心情油然而生。海内外的新闻记者发出一篇篇惊叹:《黄埔军校旧址破烂不堪》、《黄埔军校英姿不在,台两记者感慨万分》、《黄埔军校竟会如斯细小、残破,革命军人摇篮难寻昔日风貌》、《景点、军事禁区难划分,怕惹麻烦,游客锐减》,仅看这些标题,不须看内容,亦足以唤起人们痛惜和不理解之心情。

全国政协、省、市政协的郑洞国、宋希谦、杨奎章等知名人士,曾提示关于修复黄埔军校旧址等问题的提案。广东12名省政协委员、文史专家更公开在报纸上呼吁“尽快修复黄埔军校旧址。”广州市、黄埔区有开发长洲旅游区的计划,因困难重重未能实现。《羊城晚报》以《这里有黄埔军校史迹等众多历史人文景观,可惜好事多磨——长洲开发久未切入正题》,指出“前往参观的游客看着那名迹胜景冷落荒芜,无不深表惋惜。”

1994年9月8日,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广州信息》(94)第206期刊载《黄埔军校旧址需要保护和修复》,提出:“海外回来参观的当年军校学生及广东的黄埔同学会认为,尽管不能完整收回黄埔军校,也应把当年的校长住地、教官宿舍、教室、学生宿舍、教务大楼等重建,使黄埔军校旧址有一个大概的容貌,让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省委副书记张帼英、副省长李兰芳看后

都作了批示,支持军校旧址复原维修工作。

1996年5月间,长洲文化旅游风景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决定,以黄埔军校旧址为龙头,带动长洲文化旅游风景区的开发,将重建校本部校舍列为第一期工程。6月16日举行了重建黄埔军校校本部奠基仪式,计划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的11月12日落成剪彩。

重建校本部校舍的准备工作,早在1973年已经展开调查访问,搜集历史照片和文献。参加军校筹建工作的管理部副主任陈适写了校本部旧址问题回忆录,绘画校本部的部处办公室的分布平面图,用纸皮制作了校本部校舍模型。黄埔一期学生王逸常等人亦提供了校本部校舍的历史情况。老工程师关伟良根据历史照片、黄埔师生和教工提供资料,设计了校本部房舍的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当年,部队未将校本部遗址移交文物部门,不能进行考古发掘。

在调查中,发现海军部队1965年重建的军校大门,位置与比例都不准确,从历史照片和1990年11月发掘大门遗址的资料来分析,校门及其围墙是在两棵大榕树(现仍生长)前,重建的大门和围墙却夹于两榕树之间。海军的汽车要穿过校门口到码头,又将门口扩大,使大门高和宽的比例不恰当。1991年,我们按历史原状重建了军校大门和补建两个卫兵室,重现了军校大门昔日的风采。

为重建校本部校舍,我们寻找地下墙基资料作为依据。1996年6月21日,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校本部遗址西轴第一进位置进行发掘,26日发掘结束。此处遗址破坏严重,后期的建筑与原有的房舍建筑墙基叠压,从揭露出来的两条墙基,难窥全貌。7月1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等同志到黄埔军校旧址视察校本部遗址,观看了模型,指示继续进行考古发掘,找出校本部的四角位置,以确定校本部面积。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7月3日再次考古发掘,地点选择校本部遗址南面,此处地面南高北低,有的墙基距地面只有20至40公分,中间没有新建筑,发掘环境比较好。9日发掘结束,解决几个问题。①揭露了校本部中轴第三进和第四进的房舍开间、天井面积不相同。②第三进天井的散水为灰砂砌筑。③第四进的南墙边的散水为水泥建筑,证明是后建的。④揭露出校本部遗址最南边墙基,确定了校本部南北长的尺度。⑤从揭露的墙基测量、校本部房舍偏东20度。

由于发掘时间短,还有几个关键问题未解决。①校本部房舍东西宽的尺度不清楚,西轴第四进房舍的西南角墙基被新建的水兵宿舍叠压,未能查明;东轴虽然沿着南边墙基延伸线寻找东南角位置,在一幢平房前3米处发掘,未到东南角位置,因怕房子会倒塌,不敢再向前

掘进。②西轴第三进房舍的南北长度不清楚。发掘第三进房舍南墙基,至5.8米处已找不到墙基。发掘第三进房舍西墙基至6.7米处,用虚线表示了北墙的位置,认为第三进房舍南北长为6.7米。这样的结果显示了西轴房舍南北长度与中轴房舍南北长度相差甚远,不合理。③已揭露出西轴房子的开间面积,但未揭露出有多少个开间。④没有发掘校本部二门遗址,其面积和方向仍不清楚。

7月11日,广州市文化局请市规划局、省文化厅文物处和黄埔区工程设计院等单位到军校旧址开会,研究重建校本部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按原大重建校本部旧址,不要按比例缩小来重建,为此必须继续发掘,解决上述问题。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因任务重,继续发掘校本部遗址的工作,由市文化局交给麦英豪同志领导的秦汉造船遗址发掘办公室负责。7月13日,发掘办组织业务人员到黄埔军校旧址研究发掘方案,确定要解决的几个问题:①要切实解决校舍的东西宽尺度,校舍的东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已难于寻找,只有继续寻找东南角的位置,以确定校本部的东西宽尺度。②西南角墙基因被水兵宿舍楼叠压,不能发掘,遂将发掘位置移到西轴第一进(即二门后西侧的榕树边),寻找校本部房舍的西墙基,通过找墙基来确定房舍的东西宽尺度。③发掘西轴第三进房舍的北墙基,以解决房舍的南北长度。④解决校本部房舍每一进有几个开间。⑤发掘二门遗址,以解决二门的位置和面积。19日发掘结束,解决如下问题:

①校本部房舍东西宽尺度。在房舍最南边墙基向东继续发掘,估计再掘1至2米,只要不损毁前面的平房基础,平房不会倒塌。结果,向东掘进1.8米,发现一块长宽50公分、厚10公分的花岗岩石块,我们分析了此石就是东南角柱础石。此石与中轴线距离为44.5米,至此解决校本部房舍的东西宽尺度。

②中轴房舍东边和西边的南北向走廊,是单边廊,不是双边廊,修正了原设计。

③校本部房舍的中轴为9开间,东轴和西轴各有5开间;中轴房舍的南北长为10.5米,东轴和西轴房舍的南北长为7.1米,比上次发掘推测的6.7米,长了40公分。每一进房舍,中间的房舍较长,两侧的房舍较短,呈凸形状。由于校本部房舍第一、二、三进相同,与第四进不同,发掘了第三进和第四进房舍的墙基,基本上知道了校本部校舍的规制和面积。发掘的结果与历史照片和历史文献记载相吻合。当年,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于1938年发表《黄埔创始之回忆》,指出:黄埔军校“除去大门,一顺共是四层房子,每层三个宅口,都是楼上下五开间,团转都有回廊走得通。以头一层房子为最好,天

并裹是个大荷花池,左右各一个,顺朝夕而满干。”

④发掘出军校二门的部分墙基、地面,收集了一些红色板瓦、筒瓦和有金玉、寿字花纹图案的瓦当,为重建校本部房舍屋盖使用什么瓦找到依据。

7月24日,市文化局邀请市规划局、黄埔区设计院、广东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陈庆彬等人到市文化局,会审设计院提交的校本部房舍设计平面图。周总工程师提出,若按考古发掘的测绘图,则校本部房舍东侧和西侧没有南北向直通的走廊,与原来的设计图和黄埔师生回忆不符。陈庆彬肯定当年校本部东侧和西侧确有一条南北向直通的走廊,考古资料未能全面揭示原状。

当天下午,陈玉环副局长和麦英豪同志率领发掘办的业务人员到黄埔军校遗址勘查,决定:①清理好遗址南边发掘场地,将余泥运走,摄影和录像取全资料后,将中轴第三进西侧天井的红砖、麻石、散水挖起,留作以后按原状陈列。②仅发掘出东南转角的一块柱础石来确定校本部房舍的东西宽尺度,依据还不足,应继续寻找房舍东墙基,进一步验证校本部房舍的东西宽尺度。③要解决校本部东、西两侧是不是各有一条南北向的走廊。发掘位置选择现进入军校旧址的道路两旁。陈玉环、麦英豪等人离开军校旧址,赶到省文化厅汇报重建黄埔军校校本部问题,说明将贯彻国家文物局关于按原地、原尺度和原面貌来复建校本部的指示。但鉴于当年校本部是偏东20度,若按偏东20度来重建校本部,现环境不允许,拟改为偏东10多度来复建。这个方案得到省文化厅的理解和同意。

7月25日,发掘办在麦英豪同志指导下再次在遗址关键位置发掘,7月27日结束,补充了几个十分重要数据,①找到校本部房舍东墙基确认了上次发掘的校本部东西宽尺宽不变;②找到东廊柱础石,确认校舍东、西各有一条南北向走廊,其宽度为2.3米;③找到东轴第二进房舍各开间的柱础石,再次确认房舍为5开间。

从6月21日至7月27日,历时37天,前后由两单位共进行4次考古发掘,投入大量人力,冒烈日,夜挑灯,发掘面积共计3500平方米,是校本部遗址面积的三分之一。(见1996年9月27日《黄埔军校校本部旧址局部地基发掘图》和发掘现场照片)。解决如下问题:

一、证实校舍第一、二、三进的规制、面积与第四进不同。第一、二、三进的中轴为9开间,东轴和西轴各为5开间。第四进是一列平房,其开间与前三进不同。

二、建筑材料使用问题。地板为红阶砖,天井用花岗岩石板砌壁,散水用砂和青砖砌筑,只有第四进南边墙后的散水用水泥。廊柱的柱础为花岗石础。屋盖用红色瓦当、瓦筒和板瓦。砖基用青砖以“三、七”或“二、四”的规格砌筑,墙基下用条形花岗岩石块铺垫,再往下则为

长 2 米至 3 米左右的杉木桩。整个校舍的地下都是海相沉积层。

三、校本部房舍南北长约 120 公尺(从校门至第四进南边墙基),东西宽 89 公尺(原设计为 76.62 公尺,比实际尺度小 12.38 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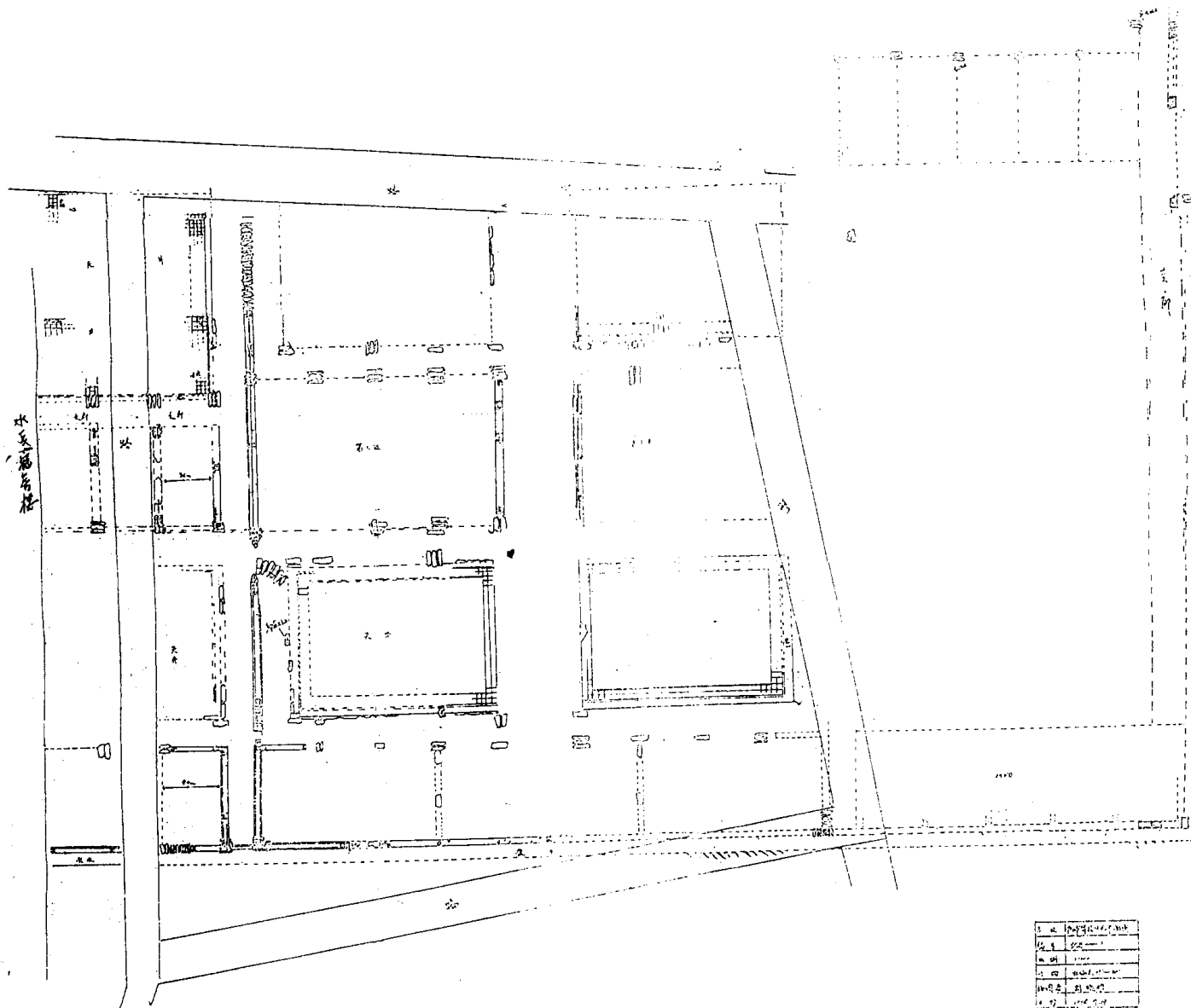
四、校本部房舍座南向北,偏东 20 度,与历史照片吻合。

经过考古发掘,为贯彻国家文物局指示按原地、原

尺度、原貌复建校本部校舍提供了科学依据。

复建校本部工程不管是烈日或下雨,都是分 3 班 24 小时连续施工。室内复原陈列亦夜以继日筹备。复建工程和复原陈列工作都十分紧张而有序进行。将于今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诞辰 130 周年举行隆重落成剪彩仪式,重展黄埔军校英姿以迎游人。

(作者单位: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黄埔军校校本部旧址局部地基发掘图

新会城北门古窑场初探

李锡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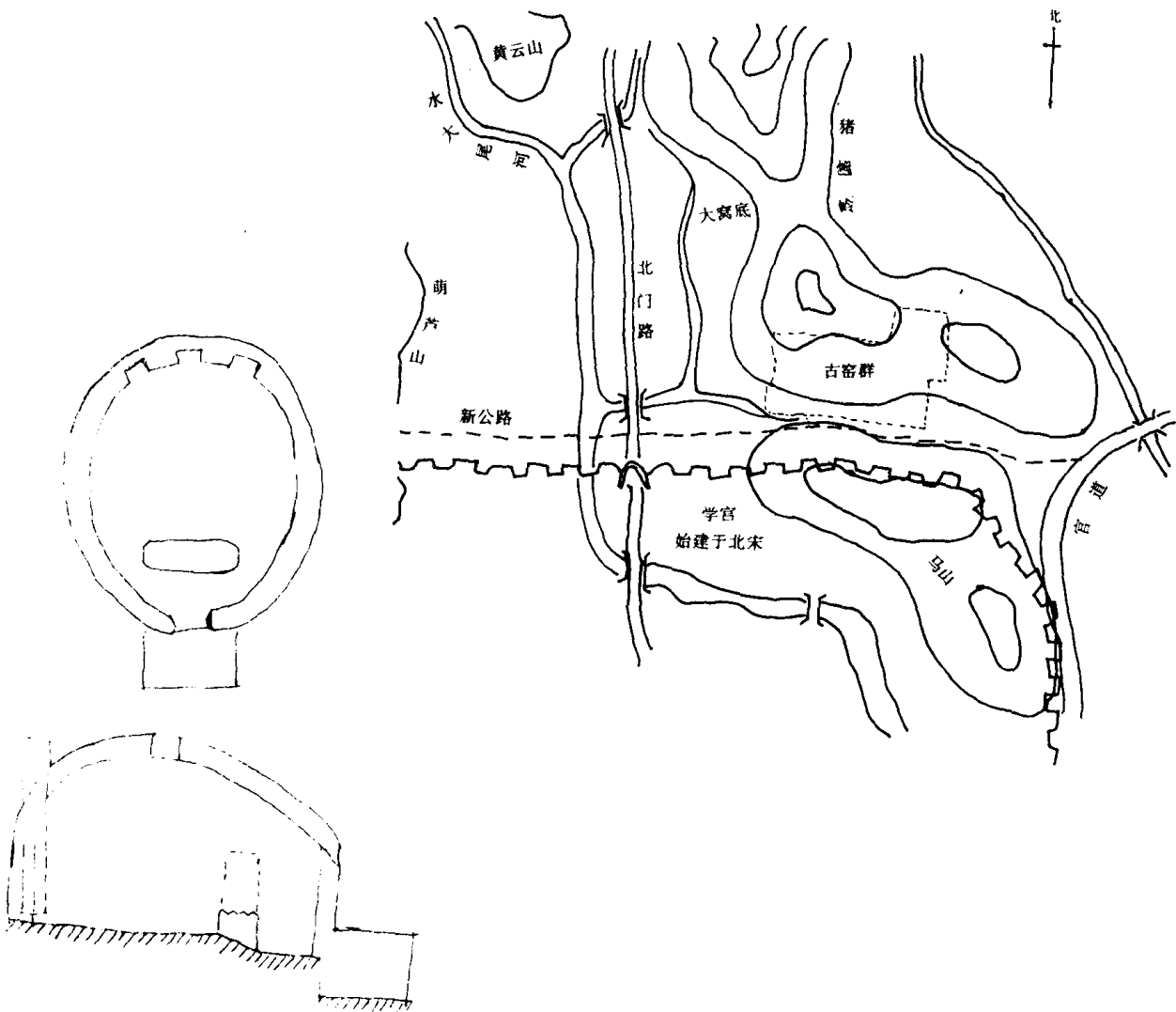
广东新会城北门古窑场的发现是继官冲碗山唐窑发现之后又一新发现,也是新会古代兴盛的手工业作坊又一实物依据。窑场规模庞大,占地一万平方米以上,依山分布,可清楚见到窑址 10 多座,是迄今新会发现最大的古窑场。

南,面对城内马山。旁有河流名北门河,又名水大尾(因潮涨直至河尾)。窑前新开一条环城公路;西面有北门大路,东面有古官道。窑旁河流通潭江出海,给运输带来方便;窑后是山林区,成为燃料补充之所。窑场在城池边,工人作息极方便,这是窑场有此规模的重要条件。

窑场位于会城北门边沿之猪 鬮岭山下,背北向

窑体分布较密集,10 多座窑横列排放。(下转第 57 页)

猪鬮岭窑口示意草图(尺寸不等)



猪鬮岭窑口示意草图(尺寸不等)

茂名、梅县、河源相继发现恐龙化石

邱立诚 张松

继1994年9月间在茂名30万吨乙烯生活区第一栋19层单身宿舍基建工地发现两窝恐龙蛋化石之后,在其东面相邻的第二栋19层单身宿舍基建工地上,于1995年2月26日,又在挖桩孔施工中发现一窝恐龙蛋化石,随后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茂名市博物馆、湛江市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组成发掘队,于3月11日~4月1日进行勘探与发掘。这是迄今为止在茂名市区发现的第10窝恐龙蛋化石。

这窝蛋化石位于第73号桩孔下深11米处。地层堆积可分为8层:第1层为表土,第2~4层为第四层堆积,第5~8层为白垩系晚期堆积。其中第5层为强风化红砂岩,第6层为松软的泥砂层,第7层是中风化红砂岩,第8层是基岩(红砂岩)。恐龙蛋化石即埋藏于强风化红砂岩层中。据观察,白垩系地层是从北向南倾斜。这窝蛋化石与第一栋19层单身宿舍工地发现的两窝蛋化石基本上处于一条由东南向西北的直线上,与其中的第43号桩孔发现的一窝蛋化石相距30多米。从地貌分析,蛋化石地点的南侧不远处当时可能是一处湖泊,在化石地点东南数百米处也可见到出露的白垩系地层,自东向西倾斜。鉴于第一栋19层宿舍工地的蛋化石位于中风化红砂岩层,第二栋19层宿舍工地的蛋化石位于强风化红砂岩层,推测两处化石的年代可能有早晚关系。

这次出土的蛋化石由于多数出土时破碎,部分完整的标本未能保持现场情况,故排列状况不明。只是在蛋化石所在层位找到3个蛋化石印痕。可供观察的蛋化石标本共有10枚个体,均属圆形粗皮蛋,其中5枚略为完整,3枚破损稍大,2枚反存残块。化石因受挤压而略变形,均作扁圆形,长径为120~95毫米,短径为105~85毫米。蛋皮多有脱落,内部结构均为红砂岩。从总体上看,其个体较之第一栋19层宿舍工地所出者略小一些,可能是同属而不同种,这有待作进一步的种属鉴定。

1995年8月,广东723地质大队的地质工作者在梅县白渡镇悦一管理区细坑湖白垩系红层中采集到恐龙蛋化石。其后于12月间,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梅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梅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察队对化石地点进行发掘。化石地点位于205国道东侧的红砂岩断崖上。在一处基本是垂直线的断层中,发现3窝恐龙蛋化石,第一窝位于表土层下2.5米的强风化地层,为长形蛋,共出13枚;第二窝位于深3.5米的中风化岩层,也是长形蛋,有10枚。长形蛋的长径为140毫米,宽径为105~118毫米。第

三窝位于深7.7米的弱风化岩层,为圆形蛋,有30枚,长径为115毫米,短径为110毫米。此外,在此处的北侧与南侧不远的两个地点还发现有恐龙蛋化石的残块,其中南侧相距115米处的一处断面暴露有8枚恐龙蛋残块。这些恐龙蛋化石,内部结构均为红砂岩。梅县恐龙蛋化石的发现,暗示该地区的白垩系红层蕴藏有丰富的恐龙蛋化石,而在一条垂直线的不同深度埋藏三窝恐龙蛋化石,这种现象极为罕见,不仅显示这三窝蛋化石有年代上的早晚,对探讨白垩系晚期恐龙的绝灭问题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1996年3月,河源市博物馆获悉该市啸仙中学邹火荣老师在中学背后的红砂岩石块中系获两枚恐龙蛋化石,随即到现场察看,在已脱层的红砂岩石块上发现7枚恐龙蛋化石。这一发现得到河源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由市政府发出《关于保护恐龙蛋化石的通告》规定“今后凡是在红砂岩地区报建的单位,报建前必须与市文博部取得联系,建设、规划部门才准予办理有关手续”。并由河源市博物馆组织普查队,到各红砂岩地区施工地点进行调查。至6月间,经当地有关部门及群众提供线索以及普查队的艰苦努力,在河源市岩前、石峡、河埔大道一带(包括宏达开发区、风光开发区)以及红石柱村东南山岗和东江河岸胜利管理区等地共发现恐龙蛋化石达16窝,采集蛋化石100多枚。这是广东境内除南雄盆地之外发现恐龙蛋化石最多的地区。在此期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派员前往河源协助工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赵资奎教授也于6月间到河源进行考察,确认河源发现的恐龙蛋化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据初步考察,河源地区的白垩系地层出露面积广阔,主要分布在东江河两岸,从岩前及胜利管理区的情况看,恐龙蛋化石已有相当部分暴露于地表,目前所获的蛋化石地点密集,个体数量多,表示当时恐龙在这一带活动频繁,该地区适宜恐龙下蛋繁殖。因此,河源地区有希望发现更多的白垩纪时期的古生物化石资料。

从已得到的恐龙蛋化石资料观察,这些蛋化石均属圆形蛋,其中有的个体很小,直径仅70~80毫米;有的个体很大,直径达180毫米;多数个体在100~150毫米之间。蛋皮厚薄不同,各窝蛋化石之间的形态特征有一定的差异,证明这10多窝蛋化石应有多个种属。化石的埋藏情况也深浅不一,有的已裸露在地表,有的则在距地表达8米多深,应是年代有年不同的反映。

茂名、梅县、河源发现的恐龙蛋化石,进一步表明广东地区的白垩系地层是研究古生物尤其是恐龙繁衍演化历史的宝贵资源。希望各地重新对白垩系红砂岩地层的

普宁发掘牛伯公山遗址

雪 彬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5年9月中旬至10月下旬,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成的一支考古队,在普宁市文化部门的配合下,对位于该市下架山镇汤坑村牛伯公山古文化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队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邱立诚副研究员为领队,考古学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主任曾骥教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运泉副研究员等专家莅临现场指导。

牛伯公山古文化遗址是普宁市文化部门在8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位于汤坑水库主坝东侧的牛伯山山坡。此次发掘共布设探方12个,面积合计300平方米,含有古人类文化遗物的地层共4层,厚达1.55米。发现人类居住生活的遗迹有柱洞、活动硬面、灰坑、水沟、蓄水池等,文化层含有碳屑、红烧土以及经人类加工使用过的石块和一批陶器、石器。证明这是一处古代人类居住活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生活遗址。

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中有较多生活用具。陶器有釜、尊、罐、壶、豆、钵、杯、大口尊、器盖、器座、支脚等。陶器主要是夹砂陶器与泥质灰陶器,有部份为釉陶器。陶器纹饰,以方格纹为主,还有条纹、菱格纹、篮纹、梯格纹、绳纹、云雷纹组合,十分精致,这是迄今此类文化遗存中首

次发现的拍印组合纹饰。出土遗物中生产工具有石锛、石凿、石锤、砺石和陶纺轮。武器有石戈、石矛、石镞。此外还有石环、玉等装饰品。初步推测,牛伯公山古文化遗址年代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

发掘情况表明,牛伯公山是一处属“浮滨类型”阶段的考古遗存,也是首次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属“浮滨类型”范畴的古人类居住生活遗址,它填补了该类型文化上只有墓葬遗物而未有人类居址遗物的空白。“浮滨类型”文化遗存是指一种以长颈大口尊、釉陶与印纹陶共存和直内无阑石戈、石锛组合为其特征的文化遗存,分布在粤东与闽西南连接成一片的地区。这类遗存早在50年代及60年代野外考古调查时已经发现,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在粤东饶平县浮滨区发掘了21座墓葬,出土了300多件随葬品。此后,在粤东和闽西南陆续发现这类文化遗存的新的出土地点,引起了国内以至东南亚考古学者的关注。牛伯公山古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探讨商周时期粤东地区人类的聚落形态及其文化面貌,对“浮滨类型”文化本身及它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解释及全面研究南方青铜文化均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普宁市文化局)

封开杏花苦稔岗考古复查、发掘纪要

冯孟钦

1996年7月10—12日,根据省文化厅文物处的指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会同市、县专业人员对封开县杏花镇清水村苦稔岗进行了复查,并对一座业已暴露的新石器时代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收集到了一批资料,取得了一定收获。

苦稔岗为位于杏花小盆地西部的长条形山岗,长约500,宽约15米,呈西北—东南走向,东南距镇府所在地约1公里。广信河在山岗西北一端分流。该岗于1982年首先发现文物,已被作为文物分布点记载于《封开县文物志》,且还出土过大石铲。这次复查前,县博物馆同志曾作过多次调查,除最近一次调查发现上述窑址外,历次调查还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曲折纹陶片,锥状鼎足,小石刀,双肩石锛,梯形石锛和梯形小石斧;青铜

器时代的云雷纹、夔纹、水波纹、方格纹陶片及陶豆残件;汉代的小方格纹加“五铢”戳印陶片;唐宋时期的青黑色硬陶片和绿釉碗片,还有可能属于支脚的方柱形红褐色粗砂陶件以及年代未详的石磨轮和陶磨槽。磨轮圆饼状,中间有圆孔,磨槽船形,竖部面呈“V”形,二者应是配套使用的研磨工具。在本次复查中,我们又采集到一批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的遗物,并在山岗西侧的剖面上发现保存有原约80厘米的唐、宋文化层。地表上则随处可见长方形或形状不规则的黑色土范围,是否为墓葬或别的遗迹,还有待于证明。

复查工作结束后,我们便着手清理窑址。窑址位于山岗中部的东北坡,清水村西北边。村道从窑址前面经过。由于雨水冲刷及人为(取土?)破坏,窑址仅存前大部分窑床、

火膛及烟(火)道。窑床高出现代地面,较平,靠火膛一端向火膛倾斜,整体呈椭圆形,残长 200,中宽 132 厘米。窑址依傍山势,西南高,东北低。火膛位于窑址东北一端,低于窑床约 50 厘米。烟道自火膛始,循窑床两边向上、向内延伸,由大而小,形似牛牯的两角。窑床及烟道分别是涂抹厚 1.8 和 1.1 厘米的一层褐黄色粘土,夹石英,较坚硬。在烟道及火膛填土中出土了一些陶片,可辨器类有鼎(腿)5,钵(?)1,罐 1。陶系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共 27 片,其中绳纹 5 片,篮纹 1 片,余素面。夹砂灰陶 7 片,皆素面。不见泥质陶。

另外,在窑址下方 6 平方米的范围内,堆积有厚 40 厘米的红褐色灰土,夹较多炭粒,出土 50 多片陶片,种

类、纹饰、陶系与窑内所出一致。

通过复查,可以确认苦稔岗从新石器时代至唐宋一直有人在活动,而窑址(应不止一处)的存在则证明附近应有的村落遗址分布。这无疑提供了对今后工作有参考价值的重要信息。窑址未见窑壁(只有上述涂抹层),故对该窑原来的形态、结构尚未清楚,有些问题尚值得研究,但它不同于发现于粤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窑址,则是可以肯定的。在粤西地区,这是首次发现,因此,今次发掘,填补了粤西这方面的空白。

参加复查和发掘工作的有陈楚源、姚锦洪、陈瑞南、邓杰、吴海贵和冯孟钦。

(作者单位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平县发现商周时期古墓群

杨廷强 陈子昂

最近,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县博物馆为配合省道忠定线和平段公路改造工程组成了文物发掘工作队。在和平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公路建设单位及时拨出专款,对公路经过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子顶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商周时期古墓群,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

子顶山遗址位于和平县大坝镇水管区司前村子顶山。该山东高西低,山岗平缓紧靠和平河。忠定公路遗址东侧靠山顶的山岗。这次抢救发掘面积 450m²,发现土坑墓 10 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度普通为 3m,宽 1m 左右,深 30—60cm,距表土 10—30cm,方向多东北向西南。墓葬人骨无存,出土陶器、石器随葬品共

计 30 多件。陶器主要有折肩平底罐、折肩凹底罐、陶瓮、夔纹陶罐、大口尊、圈足罐、有流带把壶、鸡形壶、陶钵、碗、豆,其器身表面拍印着方格、细方格、双线方格突点、棱格、蓝、夔、云雷等丰富多彩的花纹。石器主要有短身铤、有段铤、穿孔石铲、石戈、石矛、石镞、残石环等。经鉴定,墓葬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这次出土的双线方格突点纹大口尊、夔纹陶罐和圈足陶罐等器形,在和平县属首次发现,其中夔纹陶罐高 55cm、腹径 53cm,其高大的器形,在粤东地区也属罕见。这些文物的出土,为研究广东东江流域的古代文化面貌以及岭南地区与相邻地区古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作者单位 和平县文化局)

连州汉墓被毁清理后记

吴海贵

一、汉墓被毁过程

1995 年 5 月 6 日,连州市建怡水泥有限公司在连州镇龙嘴竹仔墩进行扩建工程时,于施工中推出两件椁板。14 日,扩建指挥部的施工员、保安员、司机等 8 人,擅自进行挖掘,并挖出了棺木。当挖至基底椁板时,吊起了其中一块,其后探知下面是实土才没有继续挖掘。这次私挖,扰乱了墓室结构,毁坏了棺木,破坏是相当严重的。15 日下午,有一位不愿表明身份的市民将发现古墓的消息打电话告知连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方志办随后转告市文化局。文化局长何少锋即带领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当时未能确认墓的年代,但何局长嘱咐指

挥部的一位成员对现场做好保护工作。

遗憾的是,指挥部的这位成员却没有将此事放在心里,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16 日,参与扩建工程施工的连州市国土局房地产开发公司工地带班员、铲车司机、汽车司机、炊事员等 4 人,对古墓又一次进行私挖,他们用推土机把椁木推开,并将底板全部撬起,在墓底挖出了一件青铜容器。

16 日上午,连州市博物馆退休老馆长黄洪威,在对照有关资料后感到古墓板有可能为西汉时期,即向何局长汇报。何局长随即向市政府报告。副市长文成北知道后,即开会研究,决定组织工作队调查处理此事。下午,

●考古纪实●

工作队到达古墓现场，当即制止了正在进行私挖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对古墓现场进行保护，等候处理。16日晚上，市政府决定成立专案组对私挖古墓事件进行查处，并于17日将情况上报清远市文化局。清远市随即转报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8日，省文管办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会同清远市文化局、博物馆到现场调查考察，后经请示省文物主管部门领导的同意，于22日~24日对被破坏古墓现场进行清理。

发掘清理工作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参加工作的有清远市博物馆，博物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省文管办也派员到场，连州市政府、连州市文化局的有关领导也亲临现场协助处理问题。

二、清理情况

发掘清理情况表明，这座位于山岗近顶部的古墓是一座木椁竖穴单室墓，方向210度。现场仅墓坑底部东侧残留两块已残断的木椁侧板。墓坑前后可见有白膏泥痕迹，后端的白膏泥可见厚50厘米，前端因被破坏，白膏泥厚度不明。基底椁板下面出土的一件青铜器，据现场遗留痕迹判断，可能出自墓底的一个腰坑，腰坑的位置大致可确认在墓坑底部中央。

由于墓室已被全部扰乱，墓室椁板绝大部分被撬起，并多数毁损，这对了解和复原木椁以及棺具结构十分困难，一些细部已难以究明。根据出土的部分椁板推测，整个木椁全长约5.3米，宽约3.3米。椁室内长4.5米（据对第一次私挖者测量，其尺寸基本可信），宽3.14米，高约近3米。前板大致各有4块，宽65~80厘米，厚40~43厘米，长度不明。两侧椁板长3.1米，宽22厘米，厚10~11厘米。基底铺9块底板，每块长3.14米，宽47厘米，厚14~15厘米。面板数量不祥，尺寸为长3.23米，宽47厘米，厚14厘米。另据棺木测量，长2.27米，厚5.5厘米，宽度与高度不明。据连州市林业局专家鉴定，出土的棺木和椁板为杉木树种，估计直径在1.2米以上，生长高度在30米以上，生长龄期在300年以上。此外，从被挖出的堆积中重新清理出一些木质构件，有的尚有榫口，因已残损，未能判断属何种器物。

从墓坑及椁板情况得知，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木椁墓，椁室周边用白膏泥封填，故木椁没有腐朽，是广东境内先秦两汉墓葬中椁板保存较好的一座，具有相当重要的考古价值。腰坑中放置青铜容器（可能是或甗），这是以往资料中罕见的。广东所发现的没有腰坑的墓葬，腰坑中多置一件大陶器（瓮或罐），如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肇庆松山战国墓、封开利羊墩战国西汉墓、广州1025、1026号西汉墓等，腰坑中放置铜器者亦仅小件器物，如封开利羊墩战国墓，腰坑中放置铜刮刀或铜箭镞。连州

这座木椁墓出土的青铜器，直口，高领，圆肩深腹，矮圈足。高30厘米，器腹凸起一周，上饰十分精细的云雷纹，两侧各有一对环耳，上套有活动链环，环首置一拱形提手，提手上亦铸饰云雷纹。足底下有圆形木座，直径31厘米，高4.8厘米，两端有执把，略缺损，青铜器上扣以木盖，形与木座相近，略残损，直径28厘米，高5厘米，中央有圆孔，孔径2.5厘米。执把与底座执把相对应。这件器物虽有破损，仍不失为一件珍贵文物。

据反映，在该墓木椁未暴露之前，墓室上面封土曾有积水的窟洞。又据前述参与私挖此墓者介绍，木椁上部的椁板排列不整齐，已有倒塌现象，棺木亦曾被移位。再者，两批私挖墓穴的人员均未从墓室中找到随葬器物。依此分析，此墓很可能属早期被盗，仅存木椁下腰坑中的一件铜器。

关于该墓的年代，这种木椁墓的型制，在广东主要见于汉代。广州汉墓中，可见与座带腰坑的木椁单室墓，均属西汉前期。连州这座木椁墓的形别与此基本相同，基底椁板亦同为9块。出土的青铜器，其活环及拱形提手的造型风格与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铜鉴上的链环和提手相近。由此推断，连州这座木椁墓年代不会晚于西汉前期，其墓主人身份应有较高的级别。连州在汉代为桂阳县治所在地，这座木椁墓及随葬器物，对研究粤北地区汉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探讨西汉前期南越国长沙国的关系尤为重要。

上述情况显示，龙嘴竹仔墩西汉木椁墓是广东境内较为重要的大型墓葬，而两次私挖使墓葬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至使墓葬形别结构等考古资料已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一起严重破坏古墓葬的违法事件。此事发生后，连州市委、市政府极为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十分细致的调查工作；尽最大努力保护现场；追缴被挖出的青铜器；连州镇公安分局收审了12名参与私挖破坏古墓的人员；经查访摸底，查清了事件真相；确认参与私挖者没有挖出窃取其他文物。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事件中，建怡水泥有限公司扩建工程指挥部有不可推御的责任，正是由于该指挥部领导对施工人员管理不严，文物意识薄弱，法制观念不强，其所属的施工人員不仅不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反而亲自动手对古墓进行私挖破坏。另外，指挥部的个别人，在市文化局领导指出应做好现场保护工作时，置若罔闻、不及时采取措施，至使古墓被第二次私挖，使古墓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严肃法纪，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对建设单位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公安机关也依据有关法规，对参与私挖破坏古墓者给予严肃处理。

（作者单位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利益与遗产

——从国外艺术品拍卖看博物馆的得失与对策

编 译：陈军科

编者按：刊载此文目的是向读者提倡了解国外博物馆工作信息。按照我国现行文物政策规定，馆藏文物是不能拍卖的。

近年来，博物馆在经费方面所遭到的困扰已使得大多数博物馆的负责人为此而大伤脑筋。在纽约、在伦敦、在巴黎，几乎所有博物馆的理事们都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博物馆究竟选择何种方式通过自身摆脱困境。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一个触及神经的敏感问题终于被新闻媒介以公开的方式提出来了：拍卖艺术品，让文物进入市场。然而结果又怎样呢？只要稍加回顾并考察一下这一在当时似乎引起轰动效应的过程，结论便不难得知，而且是饶有兴味的。

1972年，美国《纽约时报》率先发表署名文章，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拟议中的伦敦艺术博物馆各种绘画的出卖。这种出卖看似并不新奇，但艺术家的名声（梵高、卢梭、比毕加索等）因此激起了公众的特别注意。出卖工作先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甚至没有博物馆员工的参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关于这次出卖的文章却几乎淹没了当时各主要报纸的报道，开始简短以后冗长以至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竟占了《时报》的三个版面，细致而详尽。

这种新闻报道的强大冲击并没有必然地改变博物馆的政策，但它却迫使博物馆极大地、公开地表现出它的所谓“离取”政策，即以文物的自由“出卖”和“销售”来换取新的收藏品（只是因为“出卖”和“销售”这两个词听起来太商人味，因此使用了“离取”这个形式上的博物馆系统“内部”代码）并由此引起社会和公众对它的极大兴趣与关注，开始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将博物馆的藏品当作市场商品时它的相对价值。实际上，“离取”一词已经非常普遍地被公从使用，甚至在一些除了这个词不知道任何关于博物馆其它方针的人中间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新闻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博物馆需要法律的监督。在美国纽约州有人向司法部长提议，要使博物馆任命那些被《时报》称作“考虑博物馆的方针和程序的特殊委员”作为馆长级人员以能在出卖中特别是在对付私人买主和卖主，及考虑不作严格限制的遗产的意义时发挥作用。勿庸讳言，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信任和博物馆的职责问题也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伦敦博物馆上述事件在以后的年代里对艺术博物馆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的内部规则在许多主要的博物馆产生了：这种在公众拍卖场所——那里一般是进行私人交易的——所作的出卖活动还是少有为妙。理事会的成员们开始考虑到在这个日益好讼的时代自身的责任，特别在这些事件上对内部成员作指导时保持缄默，而博物馆馆员则努力完善内部机制，使其不仅经得起自身及团体和他们的委托人的责难，也经得起新闻媒介的质疑。

与之相反，在社会上，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变化是有益的，他们强调要对那些艺术财产交易活动进行鼓励，而不必为博物馆是否卷入一些不法行为声誉受到损害而担忧。新闻媒介因此也作了大量工作。出版界一位重要人士在《时报》撰文指出：“大博物馆——而伦敦博物馆是世界最大的之一——是而且应该是保存的机构……。”

“首要的，他们在所有各项工作中，最应该起到的作用是：在成熟的或幼稚的艺术品之间作出判断和选择。如果在求质量的名义下对一个文化杰作作出极大的赞助，而因此必须出卖一件优秀的卢梭作品，这种在艺术中的离取作法是很有害的。”

然而，七十年代的拍卖活动与今天相比却远为逊色。收藏家们的竞相为卢梭的《热带》和梵高的《采橄榄者》付出高达1,500,000美元的买价，令人咋舌。这引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一九七二年伦敦博物馆拍卖活动中最有名的两幅作品是以毕加索、雷诺瓦·摩蒂格列得、朱安·格利丝、波纳德等的六件作品去换取的（大卫·斯密的一件雕塑和戴本珂恩的一幅绘画），即使在当时，这也不能看作一件划算的交易。在早期现代派作品的价格已经膨胀起来的今天，后两件作品，尽管它们的确很重要，它们的要价只不过是前六件市场价的微不足道的部分。从中我们唯一可以总结的教训是：从战略上对博物馆的财产作最大的利用，这是博物馆的根本指导性原则，而且恐怕应该放在一切考虑的首要的地位。

伦敦博物馆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到一定时候，国内所有博物馆将必定去做同样的事”。从当时的观点看来，博物馆象是出格了。事实上，在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博物馆藏品一点一点地出卖之所以不断发生，

是因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膨胀的艺术市场的需求。

七十年代初期的关于文物拍卖事件的公开曝光还带来了文物收藏工作的系列变化。大多数博物馆开始按年例行对收藏品进行筛选，卖掉“次等”作品，瞄准新的“优先收藏品”，或选出一些他们认为公众认可可以出卖的藏品多余部分，这种对艺术的不断侵噬（放弃）引起公众和新闻界极大的关注，后者则始终通过媒介快捷手段不失时机地向前者进行追踪报道。1990年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专题报道了该地区最具影响的博物馆（即巴尔的摩博物馆——译注）出卖馆藏105件艺术品的计划（有趣的是，其中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七十年代伦敦博物馆也卖过）。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则普通的文化新闻。《基督教》报和南方的其他报纸更是不厌其详地登载这类评论文章，借以批评博物馆如何从出卖中获得完全的利益，有的题目干脆不加掩饰地提出“艺术博物馆出卖作品以牟取巨利”。

实际上每个主要的美国艺术博物馆，从波士顿到洛杉矶，从明尼亚波利斯到休斯敦，藏品的出卖都是象其他行业一样通过拍卖场所进行的。博物馆并不介意拍卖都是象其他行业一样通过拍卖所进行的。博物馆并不介意拍卖场主和经纪人分享他们的巨大利益，目的是要在文物市场上维持他们掌握好遗产的高价。但不无忧虑的是，由于拍卖场制造了高价的气氛，在拍卖中，极大多数的博物馆被赶出了竞价市场。

新闻媒介对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关注。他们的焦点落在博物馆的理事们身上。过去几年中，特洛伊艺术院，珂珂让艺术团，辉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及各个其他博物馆的理事们都被当地出版物扫视过，为一件又一件事受到责备。委托人与理事的争执、程序和展览的利益、税务的麻烦甚至收藏品都是新闻界当然的素材：博物馆是公关机构，他们的理事自然就成了公众的聚光点。

像这种不断出卖公共收藏品以牟取利益的事情是很难瞒住观众的，对他们来说，毫无秘密可言。既然博物馆作为卖方总是想尽量提高委托的作品的起价，拍卖行的目录照例要列出博物馆的委托人。所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对公众都必须详尽地公开，因为新闻媒介对此的报道很容易导致他们对事件形成一定的看法，对此从不同方面提出问题，公共博物馆的藏品究竟归谁所有？在新闻界与卖方、代理商和买主间有没有某种形式的合谋呢？

即使这些出卖并非都是糟糕的或无保证的（尽管有人感到许多都是），提出这些问题也有助于公众明了现代文化生活正处在什么样的危害之中。

关系到公众利益的政策性事件是纷纭复杂的。首先，是委托人的信任责任，这些委托人掌握了国家（或本地）的公共遗产。其次，便是公众关于博物馆作为艺术及文化遗产永久保存机构的观点，这种观念受到侵害。博物馆的这种行为还得赞助人和捐献者却步，他们对其赠品或馈赠物的命运从此忧心忡忡。的确，大多数博物馆现在只接受“无约束”赠品，在一些关于捐赠的讨论中，他们总是努力说服捐赠者不要以任何条件或条约来约束博物馆的行为。

博物馆内部也存在一个对艺术藏品的模糊认识，常常将其视为博物馆的主要基础。然而，随着趣味和市场价格的变化，现在它们又是可交换和可出卖的。于是，终极的价值也许并不存在。清整房子，去掉多余的收藏品便与博物馆和研究功能发生了直接冲突，“收集和保存，相对博物馆的其他活动而言，应该而且必须作为最根本的活动。”

如果没有新闻媒介的介入，这种发生在博物馆的当前重大事件，我们会发现有默许（来自艺术界），有忽略（来自整个社会），或者根本不为人所注意。这里有二个典型事例：一个在美国享有一定声誉的艺术博物馆，离取了一幅威廉·米切尔·哈尼特作的美国静物画（并非一流作品），那时公众对十九世纪美国绘画的兴趣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热情，其时，画作在艺术市场上辗转并被一家大的美国博物馆买下。事后不久，作为卖方的艺术博物馆又花了普遍认为过多的钱收买哈尼出卖的与美国静物画相等或稍次的画，因为当时认为这类收藏还很缺乏。换句话说“收集重点”发生了转移。这是突变，人们会说，但为什么呢？另一个规模稍小的综合博物馆出卖了“稍次”（即后期）布莱奎（Braque）的绘画作品，而那之后不久，这位艺术家的后期作品很快便得到评论界的承认，变得家喻户晓。从出卖中得到的钱往往又用来收买其它艺术品，对此种交换博物馆有一甚准确的术语，“以史密斯基金购买”或“交换的史密斯基金”——确信莱奎（Braque）的作品最终要离取，而它也终成了私人收藏品。

同样，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Walker）美术馆去年也出卖了一批作品，其中包括该馆创始者所收集的十九世纪末美国绘画，旨在“建立起馆藏二十世纪艺术。”其中一绘画曾借予明尼阿波利斯学院，该院试图在出买前筹集足够的奖金给拍卖方以使作品得以留在明尼阿波利斯，可是徒劳。人们认为：事实上这些作品留在明尼波利斯，而它们在纽约的出卖至少带来了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身价。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乔纳森·耶得利（Janathan Yardley）关于此事的报道似乎并未引起新闻界多大的惊

奇。他指出：在明尼阿波利斯放弃的藏品中，有一些明显属于社会的遗产，如卖了八百五十万美元的布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Frederick Edwin Church)所作的《湖边之家》(Catskill 的风景)，就是博物馆创始人沃克(T·B·Walker)的最初收藏品。然而，不管怎样，这一报道提请人们注意：博物馆的关注不应是对各种艺术品味的竞争，而应是关于公众的信赖，他们对待遗产的态度和急于了解详情的心情。

在另一方面同样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美国国家艺术院1989年出版的一部颇具特色的《美国绘画作品目录》——可能这是最有名的十九世纪美国绘画的私人收藏集——像往常那样标示了每一作品的来源。这使得公众不得不拒绝这份目录。在艺术作品从高贵的、有名望的家族转移到公众领域的时候，这种标示同样也暗示了地位和身份；而当作品只是在充当一种“离取”对象时，人们就不再想把它出处弄得那么明白。

巨额的资金还带来一系列复杂的财务问题。几年前，美国公共会计证书学院和博物馆系统的负责人进行了一次座谈，向他们指出，按照规定的审计程序，博物馆应将它的艺术收藏品价格与它的建筑和其它设施一起记入帐册。博物馆的理事们对此进行了拒斥。他们的观点是，除了随市场的变化价格不断涨落这样技术上的困难之外，博物馆不应把它们的艺术收藏对象看成固定资产。表面看来确实如此。然而有证据表明，随着特定的艺术作品市场价格的损失，一些艺术品便成了收藏家们优先考虑和刻意追求的焦点。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1990年2月22日迈克尔·金斯利在《时代》上撰文认为，“博物馆是艺术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它们是高价的艺术市场最大的受益者，”为了达到对博物馆财政战略上的职责认真的理解，金斯利写道：“博物馆只能买艺术品，而不能卖出。这是原则。出卖艺术藏品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他们丢掉了反出卖的艺术崇拜，那他们就丧失了艺术精英交给他们的大权。”

金斯利还提出了博物馆取得对失控市场进行控制的建设性方案。但他提议未能估计事实上有多少出卖之事发生，这使得他的文章放了空炮。再说，即使人们看到舆论界对这类事的关注，也缺乏足够的信息。

还有一个观点相反的例子。《纽约时报》以专栏刊出威尔顿·克拉默(Wilton Kramer)的文章，他以赞扬的口吻提及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履行了“纪录博物馆”的角色。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哈利·兰德(Harry Rand)当即撰文表示：“获得一件艺术品只不过是得到了一份现代欣赏趣味及信任的声明。”这份声明可能与当今博物馆

馆长最基本的思想不相符合了。尽管克拉默(Kramer)竭力表示：“在美国艺术博物馆里永久的收藏的确是永久的”，他却并没有认识到，政策只掌管了美国的艺术，而博物馆事实上处理的是美国的作品，以此满足他在特殊领域的目标。

最后一个问题是：新闻媒介在这些事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在美国，报刊在报导这类新闻时是很默契的。随着艺术价值的经常充当公认的资产，象股票、黄金或钻石一样，艺术品也变的越来越富有诱惑力，千金重价使得新闻界的同仁们更加热衷于从事博物馆事业的报道。还不只此，博物馆自身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到市场热力的无意识的共谋中，这种势力改变了整个趋势和利益关系，而新闻界正好充当了此间的掮客。

并非所有的版面主持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定期的文化版面只能在有偿广告或周末副刊里和读者见面，而且经常只是部分地或不正确的。这甚至还不及体育。就体育而言，不管怎样，每一场比赛输赢都见诸每日报端，而对博物馆来说，一幅价值连城的艺术作品或一位轰动的艺术家专题展览、私人珍藏文物或馆际间馆藏文物珍品交流、展出，这些都尚未引起新闻媒介的真正关注。

没有必要对每一事件都作详尽报道，然而有关的文化专栏应该比现在更尽责，更敏感。纽约拍卖和《纽约时报》所作的报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像那一类的侵蚀公共遗产的事全国各地都有发生。那么，谁是这样的文化新闻工作者呢？一般是相当老练和出色的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和收藏家，偶而也有一些相当具有目力的批评家参与。此外，充分掌握信息的公众，对博物馆的影响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今，在贪婪的市场开始侵蚀公众的遗产时，公众需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对那些领导地掌握文化生命的人作出合理的评价，就象在其他事情上期待足够的信息一样。在这个领域，文博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回头一想，可能公众才是“最后的评论员”。

译后

拙文《利益与遗产——从国外艺术品拍卖看博物馆的得失与对策》译自美国学术期刊《干耐研究中心·艺术与传媒》一九九〇年第4期。该中心创办于六十年代初期，设在哥伦比亚大学内，研究人员大多为大学讲师、教授和各专门领域的专家学者。本文原作者汤姆·L·弗莱登海门是华盛顿斯密生研究中心博物馆馆长助理，曾在新闻媒介担任过记者和专栏作家，对媒介热点较为敏感熟悉。该文所提出的问题：如何看待文物拍卖现象，如何处理好文物拍卖及其博物馆与市场的关系，博物馆的职责和任务(根本宗旨)是什么等，作者似乎没有直接

生死置之度外 文物在我心中

——记文物卫士谢新炎

谢帝水

一

1995年11月18日凌晨二时许，几个黑影越过广东惠东县博物馆围墙，窜入博物馆办公大楼，爬上二楼文物库房铁栅门前，伺机作案。异常的响动惊醒了一楼值班室里的文物安全保卫员谢新炎，此时，离库房不远的宿舍区一干部家属也发现二楼上面有黑影晃动，便大呼捉贼！小谢连外衣也顾不上穿，便立刻冲向二楼文物库房，在楼梯处恰好与歹徒相遇。于是，小谢便与歹徒们搏斗起来，从楼上剧烈地拉打至楼下，因寡不敌众被歹徒用铁棍朝头部猛击数棍，顿时鲜血直淌，倒在血泊之中……闻声赶到的博物馆黄副馆长扶起小谢时，他吃力地朝歹徒逃窜的方向，挣扎着边爬边喊“捉贼！”但终因流血过多，小谢又倒了下去……

二

凌晨二时三十分，小谢被送到县中医院急救中心时，全身抽搐，牙关紧闭，口吐濡沫，不省人事。经检查，小谢头部多处被钝器击伤，颅顶骨折、头皮破裂、大脑组织严重挫伤、颅内出现大量血肿。该院外科全体医护人员进行会诊后，认为需立即施行手术。

作答，但其引述的观点却是十分鲜明的：

“博物蒐藏品一点一点地出卖之所以不断发生是因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膨胀的艺术市场的需求。”

“从战略上对博物馆的财产作最大的利用。这是博物馆的根本指导性原则，而且恐怕应该放在一切考虑的首要地位。”

然而，‘博物馆需要法律的监督’，“收集和保存，相对博物馆的其他活动而言，应该而且必须作为最根本的活动。”

这些看法及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当是不言而喻的。特别值得我们感兴趣的是，文中提及并关涉到关于国外博物馆艺术品拍卖情况的事例，一般国内对此都还鲜为人

晚上九时，由该院颅上伤教授曾文柏主持对小谢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开颅、钻孔、血肿清除手术。由于颅骨裂伤严重，小谢术后七天仍昏迷不醒。经CD扫描，颅内血肿有增无减，需紧急进行第二次手术。二十四日晚七时，小谢被再次送往手术室……

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和精心护理，小谢终于在十二天后苏醒过来。

三

受伤后的谢新炎同志，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桂儒当天便亲临医院组织抢救工作，并多次到医院探望小谢，还派专人专车往广州、深圳、汕头等地购买药物；县长李彬南在外地开会听到情况汇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小谢家属表示慰问，散会回来带着慰问金亲自到医院看望了小谢，并与院方一起研讨治疗方案，还专程邀请广州南方医院专家前来会诊。同时要求公安部门组织侦破队伍尽快破案，将罪犯绳之以法；二十三日，县委书记李锡鹏专程到医院看望了仍在昏迷中的小谢，他握着小谢父亲的手说：“你培育了一个好儿子，为保护国家文物，维护正义付出了代价，感谢你！”广东省文化厅人事处文物处、计财处的领导专程

知，在西方却是一次一次被媒介追踪曝光，并激起社会和公众关切与聚焦的新闻热点，如要对未来或已经正在慢慢兴起的国内文化市场作某种揣测和选择，了解并把握这些事情中的更多的细节及其意义，亦当是一件重要工作。这也是译者志趣所在。

由于原文中一些观点和提法明显地不适合我国国情，如涉及个人财产保险和税收等问题，译者在文字上作了删节并对有关材料作了处理。

译者

一九九四年三月

(译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看望小谢。二十四日县宣教卫系统干部职工向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搏斗而英勇负伤的谢新炎同志捐款达46000元。十一月三十日,中共惠东县委、惠东县人民政府发出了向谢新炎同志学习的通知,通知号召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迅速开展一场学习谢新炎同志英勇事迹的活动,学习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和热爱本职、爱岗敬业、努力工作的精神及嫉恶如仇、勇敢坚强、舍生忘死、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四

1971年9月,小谢出生于惠东县革命老区高谭镇农村。童年时,小谢就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有见义勇为精神。读小学三年及时,一次见两个比其年龄大的学生在打架,他即上前劝阻,谁料反被揍了一顿,回到家里,父亲问及他脸上出血何故,他说是小心摔跤摔伤。父亲得知真情后,不但没有骂他,还夸奖了小谢一番。小谢家有位五保老人的邻居,放学回家后,小谢经常帮他干家务活,上街买东西,星期天帮老人拾柴火,因而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小谢在样学习认真,与同学们团结友爱、尊敬老师和长辈、乐于助人,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1991年高中毕业后,被县博物馆招收为临时工。几年来,小谢一直坚守岗位,忠于职守,视国家财产如同自己的眼睛,工作成绩突出。鉴于小谢的工作表现,1995年9月,经博物馆推荐,小谢被吸收为该馆正式职工。

小谢爱馆如家,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1994年春节,馆领导安排他与家人团聚,小谢毅然谢绝说,春节期间,更要加倍警惕,严加防范,还是不去吧!他的母亲1995年7月在一次重病时,家里打来电话叫小谢回去看看,这迟疑了几天才请假回去。他跟家人说:“博物馆里工作任务很重,我走了放心不下。”他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乘车跑了100多公里回到了单位。

五

大脑严重挫伤的小谢,目前伤势稳定,身体正在恢复之中。只是头部不时出现疼痛,左腿踝关节高度呆滞。大家担心的是,后遗症能否在小谢身上完全消失。人们热切盼望着,盼望小谢能早日康复。

(原载1996年5月19日《中国文物报》第2版)

新会城北猪鬃岭出土东晋器物

新会城北门猪鬃岭山坳,1995年因开发而动土,出土了一批东晋文物。

据《新会县志》(乾隆版)载,新会立郡于东晋元熙元年。其先为广州南海郡地,分南海、新宁地置新会郡,辖盆允、新夷、封平三县;隋开皇间易郡为州,更名为冈州,并辖12县地。后又改为新会县至今。在新会附近地区先后发现并出土汉墓和晋器物。先是在江门窖头发现汉墓并出土大批明器,近期又不断在鹤山考古挖掘了一批晋墓,今在会城附近出土这批东晋器,是考证新会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和依据。

出土器物应属陪葬品,但因挖土方是在深夜用机械操作,所以墓形、器物都在当晚被摧毁并运走他地填土方去了。这几件物品是在清晨才被他在泥口下发现拾获,后移交到市博物馆市土器物3件

一、青釉(多格盘),通高3.8厘米,底径17厘米,身径15.8厘米,内圈径.4厘米;内分3格,外分7格,凸底,青釉,露胎全为火红色。

二、青釉勺,通高7.1厘米,身高5.4厘米,足高0.5厘米,实足;口径10.7厘米,底径6.5厘米,露胎为灰白色。部分釉已脱落。

三、香薰上盖。火焰顶,通高7.7厘米,器身园拱形,出戟8个,口径9.8厘米,上部开有4个小园孔,青釉,胎灰白色。

这是一些较为典型的东晋普遍应用的器皿。为研究和了解新会历史的重要文物。

(新会市博物馆 李锡鹏)

南澳发现抗战胜利纪念碑石

近日,武警南澳县中队在清理场地时发现了一块碑石。博物馆接到报告后即派人赴现场察看,只见该碑与10多年前发现的、现已馆藏的2块碑石从外观、规格到字体都极具相似:宽80、高77、厚22厘米。左右边缘薄而后削,上下端平截而中央厚,楷书阴刻,字径4—5厘米,内容是悼念南澳抗日血战牺牲将士的碑文。估计全文分刻于4块形体相同的碑石之上。馆藏的2块排列最后,这次发现的是第二块。除个别字迹破损难辨外,其余都清晰。

根据历史记载和调查,这篇写于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四个月后(1946年1月)的碑记是记载1938年7

●消息●

月发生在南澳岛的潮汕军民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南并以南澳为跳板的一次国土争夺战。以吴耀波营长率领的国民党正规军和以陈汉英副大队长率领的抗日民众自卫团组成的抗日义勇军英勇作战，抗击五倍于我的日本海陆空军的疯狂进攻，取得了辉煌成果，震惊中外。谱写了一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抗日颂歌，对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以当头棒喝，对正在进行的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被誉为“南澳抗战精神”而载入史册。

南澳抗战胜利纪念碑建立于1946年1月，座落在后宅镇金山北麓，50年代初期被毁，碑石散失。近期发现并已征集馆藏这几块纪念碑石对这一段历史提供了生动的证物，是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南海市博物馆举办 《南海人民革命斗争史》展览

为贯彻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宣传和弘扬南海的革命传统，充分发挥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作用，南海市博物馆于1996年“七、一”前夕举办了《南海人民革命斗争史》展览，并将长期对公众开放。

该展览内容共分“近代历史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录像片《光辉的足迹、革命的丰碑》五大部分。展出实物、历史文献、照片、资料等100多件，其中许多展品属首次与观众见面。

该展览运用丰富、翔实的南海地方革命文物资料，生动形象地概述了波澜壮阔的南海近、现代革命斗争史，特别是南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28年浴血奋战的历史。讴歌了那些为了南海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无数南海英烈。这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它必将对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海博物馆 邓芬)

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 表彰会在桂林召开 广东谢新炎被授予“文物卫士” 光荣称号

今年4月4日至6日，国家文物局在广西桂林市

召开全国文物系统安全保卫工作表彰会，表彰近年来在文物安全保卫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省(区、市)、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这是继1989年12月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电话表彰会后的又一次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表彰活动，会议表彰了5个先进省(市、区)文化(文物)厅局，31个先进集体，3名“文物卫士”和331名先进工作者。广东省惠东县博物馆保卫干部谢新炎被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卫士”光荣称号，这是建国以来国家首次向个人授予这一崇高的荣誉称号。我省还有1个先进集体和7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先进集体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保卫科，先进工作者分别是广州市博物馆欧阳炳鸿，广州美术馆孟大昭，深圳市博物馆周英、余开生，佛山市博物馆陈智亮，湛江市博物馆叶彩萍，潮州市博物馆周继生。大会向颁发了奖牌、荣誉证书和奖金。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在会上号召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者向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学习，特别强调要学习“文物卫士”为保卫国家文物敢于与犯罪分子殊死搏斗的无畏精神，为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广东省文化厅文物处 何斌)

五华县修复明代长乐学宫大成殿

广东省重点抢救维修项目五华县长乐学宫大成殿修缮工程，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施工，已于1995年12月上旬胜利竣工。使这座年久失修，濒临倒塌的圣殿，恢复了历史原貌，重显出宏伟壮观的规模。

长乐学宫座落在紫金山下五华中学校园里，始建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历代多有修缮。清同治三年(1864年)洪水崩城，宫破殿塌，六年(1867年)，由乡绅士庶集资重建。原建筑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设有照壁、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东西庑、明伦堂、崇圣殿和尊经阁等，是嘉应州(今梅州市)规模最大的文庙。现仍存大成殿、东西庑、泮池等。因它颇具粤东客家地区明代建筑的地方特色，1989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把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次抢修的大成殿为重檐歇山顶，抬梁与穿斗式混合梁架结构，面阔5间24.64米，进深6间20米，殿高12.25米，建筑面积480多平方米。重建后百多年来，由于风雨侵蚀，已使转角梁架腐朽断折，瓦面塌陷漏雨，斗拱残缺歪斜，木雕脱落损尽，彩绘斑驳褪

色。加上须弥座倾斜移位，月台栏杆无存，墙体裂缝，地面坑洼，面临倒塌的危险。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提出的“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广东省文化厅于1993年把长乐学官大成殿列入重点抢救维修计划。此项工程需款近100万元，省文化厅考虑到五华是个山区贫困县，先后下拨47万元，不足部分由县自筹解决。县政府为抓好这项工程，专门设立了长乐学官修缮委员会，负责修缮全面工作，积极筹集维修资金，得到各单位和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工程由五华一建公司古建维修队承修，1994年10月动工。该公司非常重视这一古建维修工程，为确保质量，除严格挑选技术骨干力量外，还聘华南理工大学古建筑专家邓其生教授为技术顾问。施工期间，多次邀请邓教授亲临现场指导。维修的各项工序，都严格按照维修方案和实测、设计图纸要求进行，做到严格选材，精心施工。他们到江西老林场采购上等老杉木作各项维修木料，并经科学防腐处理；到佛山石湾瓷厂按样定烧仿明勾头、滴水、筒瓦和双龙戏珠等补换件；利用本县丰富的花岗岩石材，组织技术精湛石匠，按照传统工艺，精凿巧凿制作须弥座、抱鼓、望柱、栏杆和铺地砖；按原有规格和风格，精雕细刻木雕、垂花、斗拱等木构件；精心重描分布在各处异彩纷呈的书法、彩绘珍品。为更好地表现历史面貌，做到“修旧如旧”，他们还特别注意旧料回收利用，把所有能回收再用的木桁、檩板、琉璃瓦及工艺构件等都重新用上。这项工程的维修质量，在最近进行验收时，获得参加验收的省、市文物主管部门、县质监站和古建专家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此次维修能严格遵照古建修缮“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进行，符合维修方案和实测、设计图纸要求，复原工艺精细，工程质量优良。

修复好的大成殿，如今甚为壮观：月台栏杆风格古朴，四面红墙厚实，金柱高峻，梁架牢固，正脊双龙戏珠栩栩如生，殿顶琉璃瓦灿烂夺目。正是：修复历史原貌，圣殿重显辉煌。它的修复，不但抢救了一座危在旦夕的历史建筑，还为弘扬历史文化、振兴教育和发展旅游事业提供了一处重要阵地。

(五华县博物馆 李雄坤)

“八五”期间湛江市筹集 逾千万元维修保护文物古迹

广东省湛江市文化部门为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方针，在地方财政拨款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

会各界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共筹集资金1153.5万元，在文化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划和指导监督下，对约占全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六分之一的30处进行了维修保护，其中有古建筑14处，古墓葬1处，革命文物和近代文物13处、近代优秀建筑2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30处文物古迹，包括省级8处（其中的雷祖祠和洲灯塔维修后已申报为国家级保护单位）、市县级22处（其中广济桥和黄学增故居纪念亭等9处经维修已申报为省级保护单位）。投放的1153.5万元维修经费，省财政拨款147.2万元，约占12.5%，地（市）县财政拨款329万元，约占29%，使用文物的单位、社会有关部门和文物所在地群众集资赞助677.3万元，约占58.5%。在发动社会集资维修文物和保护文物的工作中，各文物保护单位的群众文物保护小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物维修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利用，有的已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的在旧址内举办了有关历史事件或人物事迹展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湛江市文管办)

湛江市召开会议采取措施落实 “四有”和馆藏文物登记造册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全省文化文物会议精神，湛江市文化局、湛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1996年7月16日至19日在市博物馆节为期4天的全市文物工作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和安排完成全市各博物馆库房文物清点登记造册和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任务，会议的最后一天，还专门讨论了《湛江市文物志(含市区和各县)》的编纂工作并落实了编写分工。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市)博物馆长和业务骨干18人，市文化局局长、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韩友强到会讲了话，分管文博工作的副局长杨一平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会议总结。根据当前全市文博队伍年轻人多、库房文物清点和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的业务规范化要求高的情况，这次会议带有业务培训的性质，由博物馆馆长阮应祺、副馆长叶彩萍、文物部副主任杨晓东分别围绕上述会议内容讲了业务课和工作规范，并解答了疑难问题，各馆还在会上交流了情况和体会，结合实际进行讨论。大家认为，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要求明确，增强了按时按质完成任务的信心。

会议确定在今年12月底以前，由市文管办组织人员对全市各级博物馆馆藏文物清点登记造册并对市、

●消息●

县两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进行验收。要求各(市)文化文物部门和博物馆,一定要抓紧时间,作好安排,解决经费困难,按质按时完成任务,并通过实践,逐步提高文博干部的业务水平。

会后,市文化局很快从市博物馆和遂溪县博物馆抽调业务人员5人,组成工作小组,从8月5日至12日,到各县(市)文化局、博物馆,协助进一步按照业务规范开展文物清点登记造册和落实文物保护单位“四有”任务。在藏品清点登记建档方面,结合各馆实际情况,初步完成了藏品的鉴选和分类,并参考过去的鉴定意见对全市各馆藏藏品作了定级,初步确定一级品26件、二级品73件、三级品785件作为建档的依据。在“四有”工作方面,主要是对进度和纪录档案作检查,提出改进意见。工作组认为,各县(市)的“四有”工作是有成绩的,尤以雷州市进度比较快、也比较规范;全市170处文物保护单位,已完成“四有”124处,占73%,未完成46处,占27%。已完成“四有”的项目,有一部分记录档案作得不够规范,记录不明确,资料缺项多,有的还未绘出正规的保护范围图,均须尽快补充、修改完善。尚未完成的46处,任务仍很重。工作组根据上述情况同各县(市)文化局、博物馆领导同志座谈,提出建议,提供业务协助。各县(市)均表示一定抓紧时间,安排人员,争取必要经费,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两项任务,为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为落实对本地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的可以移动文物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建立良好的基础。

(湛江市文管办)

佛山市博物馆举办 “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夏令营

为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佛山市博物馆与佛山市八中、市四中在八月六日至八日期间,联合举办了“迎接九七香港回归祖国”的夏令营活动。

活动的开营仪式在广州三元里当年抗英斗争誓师会场——三元古庙前进行,参加夏令营的全体学生和随行人员听取了当年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介绍。接着直达东莞市博物馆及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参观了严禁鸦片走私,抗击外来侵略的展览和位于虎门海口沙角炮台、威远炮台。。在活动中利用晚上的时间举行了有关内容的有奖知识竞赛,同学们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了竞赛活动。

通过这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使营员们不仅加深了

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屈辱,感受到香港被割取的国耻,牢记落后挨打的教训,并领略到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而且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高度热情,都纷纷表示今后要认真学习,为建设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最后夏令营在沙角炮台纪念馆进行了总结、颁奖,并在一片“明天会更好”的嘹亮的歌声中宣布“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夏令营活动的圆满结束。

(佛山市博物馆 黄玉冰)

雷州市博物馆 收藏1枚金代铜官印

1996年4月,雷州市博物馆清理仓库时发现1枚金代铜官印。印面正方形、边长7厘米,厚1.1厘米。印把长方形,高3.5厘米、宽3厘米,厚1.2厘米。全印通高4.5厘米。印文为九叠篆书,文曰:“副提控之印”(见图)。有背款,右刻“贞 五年”。

查《中国历代职官大辞典》,没有“提控”及“副提控”条目。中国正统封建王朝也没有“贞 ”年号。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此印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据《辞海》“贞祐”条注,“贞祐”年号有二:(1)、南诏郑仁祐年号;(2)、金宣宗年号(1213—1217)。又据《金史·古里甲石伦传》(卷一、一)载,贞祐二年(1214年),古里甲石伦任同知太原府事,奏请招集义军,每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二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获得批准。贞祐三年(1215年)九月,设潼关提控总领军马等官(见《金史·宣宗纪》卷一四)。“谋克”、“千户”、“万户”、“副统”、“都统”、“提控”相当于宋代“提辖”(即总兵官),负责统辖军旅、维持治安、亦司管军命及将兵的赏罚。古里甲石伦,金人,以武举登第。金宣宗(元颜)“以其有勇善战,每任用之”,官至昌武军节度使。可见此印应是金代宣宗贞祐五年(1217)所设的“副提控”之印。

此印是1枚难得的金代铜官印,对研究金代职官制度及军队编制提供1件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雷州市博物馆 王增权)

(上接第 44 页)裸露的窑脚壁厚 35—45 厘米不等,窑膛内宽约为 2×3 米,各窑尺大小不一,约为椭圆型,(图 1—3)窑的末端设三通烟道,每个烟道距 40—50 厘米。窑壁烧成火红色。有些红透达 40 厘米以上。后排窑有部份是挖山建成,窑体也略大。窑膛最高点达 2 米,顶部中央开一个约 20×20 厘米的近方形火眼(图 4—6)窑后三个烟道的上端合一穿出窑外。较完整的窑已发现 4 座,只是窑口部分已毁坏。

在这片窑场地表上,尚未发现大量的窑渣。窑场建成动物园已 30 多年,建园时有否清理,已无记载。从实地分析这样大规模的窑场,窑渣应该多。现在我们从地面的探查中,发现只有少量陶瓷碎片和几件象匣钵的陶器窑渣在那里,有待挖掘清理才明白。

这片窑场四周都有陶瓷碎片,但年代与彩色各异,种类不一。在下层一座破窑中因长期被鹿踏踩而露出一件陶器,是青釉三足炉(残)和部份其他陶瓷碎片,(图 7—8)其他窑面也有同类陶片和灰黑色无釉陶片,这些是否该窑场的产品?出土的三足炉是青釉、板耳、有垂帘纹和压印梅花纹。经广东省考古所最后确定为北宋器。这层窑群是否这一时期所毁弃,而窑场的上限年代是何时。1982 年在距窑场西北面 200 米处挖河时出土大批叠在一起的无釉陶碗,定代北宋(现藏新会博物馆),当时考虑是窑场物,但未发现窑。这批碗与该窑是否有联系,这个窑场究竟生产什么,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才清楚。

在附近山中出土不少尚未知窑口的陶器,而这些陶

器是新会特有且奇多,虽型制多样,但一脉相承,完全可以体现出它的演变和延续。(图 9—14)这些陶器部分塑造和展现着唐代建筑独特的模式。这些出土物既有青黄釉,也有素胎器,而胎质基本一致是灰白色,与在窑内出土的三足炉胎质相同。这些陶器是否在当地生产。在窑场的背面大窝底(土名)也出土有类似陶器上盖而尚未烧熟的器皿,而这些碎器并非单独的。因此,很可能是当地生产并就在附近,这成为窑的另一个推理依据。

这样一个大窑群,如何究其兴衰。从新会历史上看,隋唐间最兴盛,当时改名为“冈州”,谓之“境内过千里,山川固奇胜,土地尤膏腴,四民乐其居。”(《新会县志》)这是发展手工业的最好环境,也是制陶业迅速发展时期。从窑体分析,窑型与鹤山凤岗唐窑型制一样,馒头状。因此,这个窑物的上限年代应在宋代前。从窑内出土的器物看,前排窑则毁于宋。而排窑体较大,有挖洞而成的,且窑壁少窑汗,应是后期才开烧,年代晚些。即前排与后窑有间断期。后排窑更有炭窑的属性。

窑场规模庞大,出土器物属工艺器皿,对新会古代制陶业和陶艺发展有研究意义,对冈州治的建置位置可补充依据资料。古窑场已公布为新会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因未能进行考古挖掘,一切依据只作探讨。为此,建议有关部门、专家应给予关注,力求早日实施考古挖掘,使其内涵清楚,解决尚有疑问的学术问题和考证地方史料。

(作者单位:新会市博物馆)